



第七十三届会议

议程项目 131

调查导致达格·哈马舍尔德及其
随行人员罹难的原因和情况

2019年9月12日秘书长给大会主席的信

谨提及大会关于调查 1961 年 9 月 17 日午夜至 18 日凌晨前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及其 SE-BDY 号飞机随行人员罹难的原因和情况的第 72/252 号决议。

根据该决议第 1 段，2018 年，我再次任命穆罕默德·钱德·奥斯曼为知名人士，继续负责审查可能存在的新信息，包括会员国可能提供的信息，以评估其证明价值，确定任何进一步查证或调查应涵盖的范围，并在可能情况下，从已经进行的调查中得出结论。我记得，我之前曾根据大会第 71/260 号决议于 2017 年任命奥斯曼先生为知名人士，并在此之前根据大会第 69/246 号决议任命他为独立专家小组负责人。

大会第 72/252 号决议请我在大会第七十三届会议主要会期结束前向大会口头通报所取得的任何进展，并在大会第七十三届会议结束前向大会报告所取得的任何其他进展。记得我根据知名人士的中期报告于 2018 年 12 月 3 日向大会作了口头通报。现随函附上知名人士的报告副本。

我谨借此机会再次向知名人士深表谢意，并赞扬他工作出色，信念坚定。

知名人士在报告中重申了他在 2017 年报告(A/71/1042)中列出的以往结论。我注意到，知名人士收到了关于坠机可能原因的新信息，掌握了更多相关情况，尤其是在以下方面：(a) 会员国很可能截获了相关通信；(b) 加丹加武装部队或其他方面对秘书长飞机发动可能袭击的能力(包括飞机、机场和跑道)；(c) 该地区有外国准军事人员(包括飞行员)和情报人员。还收到了所谓“Celeste 行动”中提到的关于南非海洋研究所的进一步信息。

* 由于技术原因于 2019 年 10 月 10 日重发。



正如知名人士在报告中所说明的那样，虽然他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但为了查明这起死难事件的真相，显然还需要以新的紧迫性将这项工作继续开展下去。

忆及大会第 72/252 号决议第 5 段鼓励所有可能掌握与达格·哈马舍尔德及其随行人员罹难相关资料的会员国立即任命一名独立的高级别官员，专门负责对本国的情报、安全和国防档案进行内部审查，以确定是否存在相关资料(独立任用人员)。根据这一规定，知名人士就任命独立任用人员问题与 14 个会员国进行了接触。在我向大会作了口头通报之后，在知名人士的建议下，我还就任命独立任用人员问题与某些会员国进行了接触。

我谨感谢各个会员国、独立任用人员以及个人配合知名人士的工作及愿意提供更多资料。

我高兴地注意到，知名人士得出的结论是，总的来说，会员国出色地参与了这项工作，大多数会员国遵守了大会第 72/252 号决议的规定和精神。同时，知名人士还得出结论：(a) 并非所有会员国都任命了一名独立任用人员；(b) 并非所有会员国都进行了彻底搜寻；(c) 独立任用人员需要更多时间；(d) 会员国仍有举证责任，以表明它们已对其档案和记录，包括情报、安全和国防档案进行了全面审查。

我注意到知名人士得出的结论并支持知名人士的建议，即联合国应任命一名独立人士继续按照知名人士的当前授权任务开展工作。我还支持知名人士的建议，即再次敦促可能掌握信息的主要会员国任命或重新任命独立任用人员，以确定其安全、情报和国防档案中是否存在相关信息。在此方面，我支持知名人士的建议，即在做出此类任命或重新任命之前，现有的独立任用人员继续开展他们的工作。正如我以前说过的那样，为查明真相，我们需要确保全面查阅与这一死难事件有关的所有信息。

关于第 72/252 号决议第 4 段，我注意到，知名人士已经并将继续可以不受限制地查阅联合国的所有记录和档案。事实上，知名人士已经查阅了大量此类记录。我还注意到，联合国掌握的联合国刚果行动的所有档案现都已向公众开放，不受任何限制。¹ 此外，我谨通知大会，本着透明原则，联合国开展了全面的解密工作，又解密了数千份与刚果有关的文件。

最后，同时参考第 72/252 号决议第 6 段的规定，我支持知名人士的建议，即联合国继续努力，通过专门的在线资料集，向公众公开达格·哈马舍尔德事件调查的关键文件。通过 1961 年联合国调查委员会、2013 年哈马舍尔德委员会和 2015 年独立专家小组的工作、知名人士 2017 年的报告以及知名人士的本报告，已经收集了大量记录。联合国正在将所有这些文件在网上公开。此外，如果不能通过专门的在线资料集公开，联合国将继续与可能掌握与这一事项有关记录的机构和个人进行接触。

¹ 但 23 份文件除外，根据联合国既定政策，这些文件仍处于“绝密”状态。知名人士审阅了这 23 份档案，并在报告中确认，其中没有一份文件包含与造成这起死难事件的可能原因有关的任何信息，也没有任何其他直接或间接与这起事件相关情况有关的信息。

已经取得的进展使我备受鼓舞，我谨呼吁我们所有人迫切地找寻真相。在这一关键时刻，我们绝不能动摇。找寻 1961 年那个灾难性夜晚所发生的全部真相仍然是我们共同的责任。我们必须要为达格·哈马舍尔德及其随行人员找出全部真相。但我们也要为联合国开展这项工作。我认为这是我们的庄严责任，我会尽我所能支持这项工作。

如上所述，我呼吁大会继续处理此事，同时核可知名人士的报告及其建议。

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签名)

送文函

2019年7月31日根据大会第72/252号决议任命的知名人士给秘书长的信

我谨作为根据大会第72/252号决议任命的知名人士提交报告，说明导致前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及其随行人员罹难的原因和情况。

2018年，很荣幸根据第72/252号决议我再次被任命为知名人士。我谨对再次有机会承担这项重要任务表示感谢。正如我在本报告中所详述的，我还谨对会员国代表、联合国工作人员以及个人所给予的合作深表感谢。同前几年一样，我承认，要是没有那些自由慷慨提供专长和信息的个人所做出的巨大努力，这一进程就无法重新开始，也无法以同样成功的方式进行下去。我在报告中点名向他们表示感谢。我也再次向那些在1961年9月17日午夜至18日凌晨为联合国事业而罹难人员的家属深表敬意。

首先，我注意到，2017年报告的结论是，举证责任已转到会员国，以表明它们已对其保管或掌握的各种记录和档案进行了充分审查。尽管并不是所有关键会员国都履行了这一举证责任，但在本授权任务下也取得了长足进展。跟拼图游戏一样，随着披露和掌握的信息越多，整个事件也就变得越清晰。本来看起来似乎无关的孤立信息现在变成了重要信息；同时，所掌握的信息碎片揭示了要了解事件全貌还缺少哪些信息。

大会第72/252号决议除其他外，敦促所有会员国公布他们所掌握的任何相关记录，鼓励它们确保将事发五十多年后依然保密的任何记录解密，或以其他方式提供这些记录，供审查之用。为推动实现这些目标并遵循该决议的明确规定，我在2018年要求14个会员国各任命一名独立的高级别官员(独立任用人员)，专门负责内部审查本国的情报、安全和国防档案。我的授权任务的大部分工作涉及与会员国及其独立任用人员互动，这一进程大体上取得了成功。虽然我在报告中全面细致介绍了这些国家的互动情况，还在附件中用一个表格列出了各国任命独立任用人员情况，但本函还是会讨论与14个会员国中一些国家的互动情况。

根据第72/252号决议的要求，我请每个独立任用人员提供一份报告，概述其搜寻结果以及所需的任何保密安排。根据要求的保密级别作出了双方均可接受的安排；但我能够确认，未隐瞒任何关于坠毁原因的实质性内容。我审查了根据独立任用人员的工作收到的大量资料以及单个研究人员提供的大量资料，并在必要时征求了专家意见。我在报告中分析了这些资料，并酌情将其证明价值程度评估为无、弱、中或强。

我还指出，2017年报告中如说明某一调查结果的举证责任为某一会员国而该会员国也借机作了澄清的话，那么我在报告中已予以考虑。2017年报告如指出某一调查结果的举证责任为某一会员国但该会员国没有作出澄清或提供补充资料的话，那么我就认为这一调查结果还有待加强。

通过审查掌握了更多相关情况，特别是在以下方面：会员国很可能截获了相关通信；加丹加武装部队对秘书长飞机发动袭击的能力；该地区有外国准军事人员和情报人员；以及与 1961 年的时代背景和前后事件有关的其他信息。我已能得出一些结论，在此提交给各位审查。我的报告也全面、详实地介绍了每个会员国参与独立任用人员工作进程情况。

该决议要求各会员国通过本国独立任用人员的工作，对其情报、安全和国防档案进行专门的内部审查，绝大多数会员国遵守了这一要求的规定和精神。我认为已经开展的工作可以说是圆满完成，是在探究这一死难事件真相方面迈出了建设性一步。通过这项工作发现和披露了新的相关信息，包括证人证词、文献材料以及摄影和录像片段。在审查已找到的相关资料以及显示在具体和有限条件下哪些地方极有可能存在额外资料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

我感谢所有会员国的合作和帮助，但我尤其要对那些任命了真正可以说是独立的高级别官员，而且为他们进行有条不紊的全面搜寻提供了必要许可和合作的会员国深表感谢，特别感谢比利时、法国、瑞典和津巴布韦的独立任用人员开展了大量深入的工作。这些会员国审查并提供了信息，披露这些信息一度可能被视为不利于这些国家的利益，特别是考虑到当时还有非殖民化的历史背景。我还要特别感谢加拿大、德国、葡萄牙和赞比亚的独立任用人员所做的工作。虽然在某些方面，它们的搜寻工作所需要涵盖的潜在材料较少，但这些会员国也以同样方式参与了要求它们进行的程序，并提供了重要信息。

上述所有会员国的独立任用人员的工作为记录做出了特殊贡献，协助我完成了我自己的授权任务，并为必须进行的搜寻类型提供了基准。我向这些独立任用人员表示感谢，他们一直积极参与和配合与我们的互动。我还认为，尽管我目前的授权任务已经结束，但会员国可能会发现，根据本报告确定的事项，继续通过其独立任用人员机制开展工作是有好处的。

尽管取得了鼓舞人心的进展，但目前阶段我们还不能说，所有会员国都进行了彻底搜寻。正如我在报告中所讨论的那样，某些会员国没有对提出的问题作出实质性答复，或者似乎只是推断其情报、安全和国防档案肯定不含“相关”信息，因为这些不是其法律框架允许查阅的普通档案。我相信，鉴于此事的情况非常特殊，这些困难可能也应该能被克服。关于我谨建议与之进一步接触的会员国，我注意到以下几点。

南非在你的恳求下于 2019 年 5 月任命了独立任用人员，我对此感激不尽。虽然任命独立任用人员时距我最初提出要求已经过去了大约 15 个月，也是在其他独立任用人员提交报告截止日期之后，但仍是迈出了积极一步，我对此表示感谢。但 2019 年 5 月至提交本报告日期之间，没有收到进一步的消息。

在你的恳求下，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也于 2019 年 5 月任命了独立任用人员。虽然任命独立任用人员时距我最初提出要求已经过去了大约 15 个月，也是在其他独立任用人员提交报告截止日期之后，但仍是迈出了积极的一步，我对此表示感谢。2019 年 6 月收到联合王国独立任用人员的一封信，声称英国政府

掌握的所有载有与这项调查有关资料的文件都已被完全找到并已提交。然而，正如我在报告中所介绍的那样，我提出的详细问题没有得到答复。我谦卑地认为，我在给独立任用人员的信中详述的事项以及本报告中概述的事项可作为今后审议的沃土。

关于美利坚合众国，我很高兴美国 2018 年任命了独立任用人员。2019 年，我被告知正在进行搜寻，但我的实质性问询和对具体信息的请求却没有收到回复。

关于俄罗斯联邦，我获悉，俄罗斯在其情报、安全和国防档案中进行了搜寻，我对此表示感谢；但俄罗斯未任命独立任用人员，信息搜寻的细节也没有具体说明。虽然我面前没有确切的信息表明前苏联知晓具体事件，但作为当时该地区的一个重要行动方，为了完整性和统一性，确保俄罗斯联邦按照所要求的框架进行全面彻底的审查将非常有用。

至于上述会员国的合作为何特别重要，因为现有的具体资料和历史记录均显示，南非、联合王国和美国几乎肯定掌握着重要的未披露信息。广义而言，1961 年 9 月前后，这些会员国在相关地区创建或接收了所截获的联合国通信和其他通信记录，有情报、安全和国防人员参与、附带参与以及/或监控有关事件(但其报告或其他信息尚未披露)，和/或其人员与加丹加境内的外国情报和准军事部队有互动往来。有证据表明，这些会员国中至少有一个曾试图影响 1961/62 年度的调查，以便得出“飞行员失误”的结论，为现在强调透明提供了进一步的动力。相关资料也可能存放在前苏联的档案中。

因此，历史记录使人可以肯定地断定这些会员国肯定创建或掌握了相关记录。例如，这些国家自己的某些情报特工的报告和陈述已被公开或已在私人档案中找到，外交函件表明，也已将这些信息发送给情报机构进行跟进。通过我们所知道的相关时间这些会员国在该地区的政策、资产、设备和人员以及他们在刚果、该地区以及与联合国的接触，这些国家肯定记下了截获或无意中听到的通信内容。当意识到秘书长的飞机已经坠毁时，某些会员国肯定事后立即使用情报资产和情报信息来源生成了保密报告。尽管如此，但没有收到这方面的资料；除了我报告中提到的单独一页文件外，2018 或 2019 年，这些会员国没有一个根据第 72/252 号决议的规定提供任何信息。

所要求提供的类型的信息就是无法重现当时完整情形的缺失内容，记录中明显缺少这些内容意味着还不能给坠机原因盖棺定论。信息一定存在但却依然不公开，这只会助长各方对当时可能发生了什么进行阴谋论猜测。力图在可能的情况下驱散这些想法，我认为也是我职责的一部分。由于与上述会员国的互动仍未最后结束，因此，我在附件中附上了给这些会员国中每个会员国的最后一封信，概述有哪些方面还有待解决。我注意到，这与独立专家小组 2015 年采取的做法类似。

在披露敏感信息问题上，当然明确承认会员国有合法的安全利益，要求它们最大限度谨慎地处理安全、情报和国防信息。但会员国自己的查证和前情报人员

已公开证实，为支持政治目标，这些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几十年里在中部非洲部署了情报和其他人员和资产。

近 60 年前导致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及其一行遇难的飞机坠毁情况特殊，发生此事的全球背景早已改变。因此，如果说当前进程一定会开创一个供今后使用的先例，或者说遵守该进程就会危及安全都不合适。而且，如果根据我在报告中提出的“相关”的广义非技术性定义经过透明审查，证明档案中不含相关信息，那么就可以根据现有信息进行评估来结束这一进程。

自哈马舍尔德委员会 2013 年发布重要报告以来，各方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并逐步获得了新的相关信息，国际社会现在依然有责任 and 正当的理由，不允许对真相的找寻工作被健忘或被遗忘。相反，从现有的与造成这起死难事件的原因和情况及其可能原因有关资料可以明确看出，已发现的缺失资料完全可以通过会员国提供尚未发布的且极有可能很相关的资料加以弥补或充分解释。

因此，在不损害你作为秘书长的特权和大会的最终决定的情况下，基于上述考虑，我在我的报告中提出了四项相互兼容且相辅相成的建议。这些建议是：(a) 联合国任命一名独立人士继续按照知名人士的当前授权任务开展工作；(b) 再次敦促关键会员国保留或任命独立和高级官员(独立任用人员)，以确定这些国家的安全、情报和国防档案中是否存在相关信息。这项工作可参考本报告附件所载函件最好在联合国任命独立人士前继续开展；(c) 请你任命的独立人士在任期结束时得出结论，说明会员国是否已遵守大会概述的进程，包括有关是否可能因不遵守该进程而得出任何推论的意见；(d) 联合国继续致力于通过一个专门的在线资料集公开最近调查获得的关键文件。

我再次注意到，2017 年报告的结论是，似乎有理由认为外部攻击或威胁是造成坠机的原因，同时举证责任已转到会员国，以表明它们对其保管或掌握的记录 and 档案进行了全面审查。由于各国尚未完全履行所述举证责任，因此，我在目前的授权任务下所开展的工作没有发现任何理由可以推翻这两项结论中的任何一项。我谦卑地认为，各国应继续履行举证责任，直到大会认为，各国在披露与这一死难事件可能原因有关的相关资料方面已充分履行举证责任。

我再次重申，2018 和 2019 年取得了长足进展。在此阶段没有必要确定是否应推论不合作可被视为等同于隐瞒。但在某些会员国不对称地承担举证责任，在似乎极有可能存在具体和重要的信息却尚未披露的情况下，鼓励所有各方确保透明至关重要。目前的这一状况已存续了 58 年，如果不确定已披露或看到与得出结论有关的所有信息，我们就无法得出明确的结论。

可以看出，瑞典作为一个国家受到了 1961 年 9 月死难事件的严重影响，因为在这起空难中罹难的 16 人中，达格·哈马舍尔德和其他 8 人都是瑞典人，其中包括驾驶一家瑞典公司飞机的机组人员。瑞典与许多其他国家一样，是联合国当时的维和行动，特别是联合国刚果行动的重要出兵国。但正如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本人所尖锐地指出的那样，他并不代表某个会员国、某个区域或政治集团或某种意识形态。他宣称并体现的信念是，无论相对实力如何，所有国家，无

论大小，都应遵守某些平等适用的基本原则。为了缅怀我们尊敬的第二任秘书长及其随行人员、感谢他们所做出的牺牲，为了他们的家人，为了建设一个强大且独立的联合国的理念，我们都应为找出 1961 年 9 月在恩多拉所发生事件的全部真相而竭尽全力。

知名人士

穆罕默德·钱德·奥斯曼(签名)

执行摘要

A. 引言

1. 1961年9月17日午夜至18日凌晨,一架注册号为SE-BDY航班的DC-6型包机于午夜刚过时在当时属于北罗德西亚的恩多拉附近坠毁。联合国第二任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及其15名随行人员中的14人当场死亡,唯一的一名幸存者6天后死于创伤。坠机发生后的58年间开展了一系列调查,探究有关坠机原因的各种假设,包括空中或地面袭击或其他外来威胁(“外来袭击或威胁”)、人为破坏、劫机和人为失误。继1961年的两次罗德西亚调查后,联合国的一个调查委员会确定,它找不到证据来支持或排除为解释坠机原因提出的任何一种假设。因此,大会在1962年决定将这一事项留待进一步审议,请秘书长向其通报可能出现的任何新证据。

2. 2013年,由四名知名法学家组成的私营志愿机构“调查达格·哈马舍尔德罹难原因法学家委员会”(哈马舍尔德委员会)编写了一份报告,促成大会于2015年设立了一个独立专家小组,审查和评估有关这一死难事件的新资料的证明价值。由我担任主席的独立小组有效排除了有关坠机原因的某些假设,但最终建议还需进一步的查证或调查。2017年,我被任命为知名人士并编写了一份进展报告(2017年报告),2018年,我再次被任命为知名人士。根据大会第72/252号决议,我在2018/19年度作为知名人士的任务范围包括审查潜在的新信息并评估其证明价值。知名人士的任务还包括确定任何进一步查证或调查应涵盖的范围,并在可能情况下,从已经进行的调查中得出结论。本执行摘要介绍了我提交给秘书长的2019年报告(2019年报告)中所载的关键信息。

B. 当前的授权任务和2019年报告

3. 2017年报告得出了某些结论,但无法回答飞机坠毁原因这一终极问题,指出所有相关材料显然还没有完全被披露,因此无法得出定论。报告发现,举证责任已转到会员国,以表明它们已对其监管或掌握的各种记录和档案进行了充分审查。根据第72/252号决议的明确规定,2018年我请14个会员国每个都要任命一名独立的高级别官员(独立任用人员),专门负责对本国的情报、安全和国防档案进行内部审查。这14个会员国是安哥拉、比利时、加拿大、刚果民主共和国、法国、德国、葡萄牙、俄罗斯联邦、南非、瑞典、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赞比亚和津巴布韦。2019年报告全面详细介绍了与这些国家的互动情况,其中包括附件中有一个表格列出了各国任命独立任用人员情况。

4. 2018/19年度与这些会员国及其独立任用人员的互动过程大体成功。大多数会员国参与了大会要求的这一进程。会员国和非会员国信息来源都提供了重要的新信息,掌握了更多与坠机有关的相关情况。这一点在以下领域最为显著:会员国可能截获了相关通信;加丹加武装部队对秘书长飞机发动袭击的能力;该地区有外国准军事人员和情报人员以及与1961年各事件背景有关的其他信息。

5. 如 2019 年报告所详述，虽然大多数会员国都给予了实质性合作，但某些关键会员国却没有做到这一点。在不确定已审查与得出造成坠机最终原因所有相关信息前，不能肯定地得出最终结论。

C. 被视为待确定的事项

6. 为提供综合参考，我列出了在截至 2019 年报告所审查的材料(包括 2019 年报告中的材料)基础上确定的事项摘要。这份不完全事项清单记录了与今后审议这一主题事项具有潜在相关性的事项。在此方面，我注意到，如果 2017 年报告对归因于某一会员国的行为作出了调查结果，那么在 2018/19 年度，会员国就有机会对这一调查结果作出回应。某些会员国对这些问题作出了回应，我在 2019 年的报告中已予以考虑。如果 2017 年报告对归因于某一会员国的行为作出了这样的调查结果，但会员国没有作出澄清或提供补充资料，那么我就认为这一调查结果还有待加强。

7. 本摘要的目的并不是要搜罗所有相关信息，而是列举调查线索建议需要在哪些方面开展进一步工作。为简洁起见，下文列出了根据当前信息有待确定的事项，但并未详细提及辅助材料。要想全面了解各事项的来龙去脉，应全面参考 2017 和 2019 年报告以及其中分析的材料。

1. 背景

8. 尽管 1961/62 年度的调查对历史记录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却存在重大缺陷。特别是，未适当考虑当地目击者提供的证据，因而丧失了一个大好机会。早期调查未能全面考虑各种可能假设，特别是外来袭击或威胁是否是造成坠机的可能原因这一假设。其他问题包括早期调查未能充分考虑 1961 年 9 月事件的时代背景，包括当时正在发生激烈武装冲突，多方卷入了冲突，包括联合国。因此，SE-BDY 航班前往区域正处于高度军事化状态，刚果和北罗德西亚之间边界两侧都有军事行动，大量处于备战和随时交战状态的部队集结在此。

9. 1961/62 年度初步调查中另一个令人关切的问题是，似乎已经确定，英国和北罗德西亚官员试图影响这些调查的结果，从而得出结论，坠机是飞行员失误造成的，而不是任何类型的外部干扰。

2. 关于坠机原因的调查结果

10. 最近进程的每一个持续阶段都发现了早期调查所掩盖或没有考虑到的证据。根据手头已有的全部资料，无论是通过直接袭击还是通过对飞行员的短暂干扰导致 SE-BDY 坠机，都似乎有理由认为外来袭击或威胁可能是造成坠机的一个原因。当时的情况和消息来源都表明，有可能发动了攻击，而且哈马舍尔德将于当晚前往恩多拉的事实事先已广为人知。许多目击者(包括独立小组审议的 12 名“新”目击者中的 9 人)称，他们看到空中有不止一架飞机，另一架可能是喷气式飞机，SE-BDY 坠毁前已着火以及/或者 SE-BDY 遭到枪击或被另一架飞机以其他方式进犯。鉴于当时普遍的情况，对 SE-BDY 发动攻击很困难，但也是可能的。

11. 尚不能断定人为破坏是否可能是造成坠机的原因，部分原因是在南非查阅相关文件遇到了困难。

12. 从医学专家的结论来看，似乎及时、适当地记下了 SE-BDY 机上所有人员的死亡原因。因此，可以顺理成章地得出结论，可以排除关于死因的其他说法，包括达格·哈马舍尔德坠机前或坠机后生还遭刺杀的说法。

13. 关于人为因素，一项同期分析指出，飞行员 Hallonquist 在登上 SE-BDY 航班前似乎有充足的休息机会，但机组 4 名成员中的其他 3 人没有。因此，疲劳可能影响了 SE-BDY 副驾驶和飞行工程师的能力，包括在发生任何意外情况时的应对能力。根据医学报告，包括 2017 年拿到的初步毒理分析结果和独立专家意见，没有证据表明任何一名飞行员或机组人员受到了药物或酒精的影响。

14. 这些年还有人提出过机械或其他材料故障的说法，包括测高仪故障、使用的测高仪设置出错、使用了不正确的着陆图或气体泄漏等原因。这些假设似乎均已被完全排除。

15. 当然，尽管机组人员经验丰富，飞机接近着陆前如果说是条件正常，但坠机仍然有可能是飞行员失误造成的。但在做出这一结论前，必须确信对所有潜在证据都进行了审查。在所有相关证据显然还未完全披露的情况下得出没有外部攻击或威胁的调查结果不合逻辑。在知道没有看到所有潜在物证的情况下得出任何结论性调查结果，既不明智也不负责任。

3. 截获通信

16. 1961 年 9 月，多个会员国都在监控和侦听相关地区的通信，包括联合国的通信。包括联合王国和美国在内的多个会员国在整个 1961 年都接收到了截获的联合国刚果行动的通信，包括那些与敏感军事事项有关的编码通信。英国高级专员 Alport 勋爵、美国驻伊丽莎白维尔领事威廉·坎努普、罗德西亚和尼亚萨兰联邦总理罗伊·韦伦斯基爵士等高级别官员以及各国首都讨论了截获的这些通信内容。

17. 坠机当晚，至少有一个会员国(美国)在恩多拉及其附近部署了先进的通信资产，包括移动军事资产。现场的飞机配有先进的通信设备，可以长距离(包括在洲际间)侦听、传输和接收通信。

18. 从哈马舍尔德使用的 CX-52 型密码机上发送的通信似乎已被英国和美国的信号和情报机构截获，因为这些机构掌握的秘密截获和解密设置使它们能够秘密截获通信。

19. 两名被证实为美国国家安全局工作或为美国国家安全局活动提供支持的美国工作人员说，他们个人在 1961 年 9 月 17 日午夜至 18 日凌晨无意中听到了 SE-BDY 航班遇袭的通信传输或录音。尽管自 2015 年以来一直要求美国予以澄清，但他们的说法一直没有得到美国的实质性回应。截至 2018 年，这两人都已去世。

4. 1961 年 9 月坠机现场及其附近的武装部队

20. 加丹加空军在打击刚果部队和平民以及联刚行动部队的行动中发挥了有效作用。加丹加空军使用商用飞机，1961 年使用的类型包括：Douglas DC-3、Dornier DO-28、De Havilland Dove、Fouga Magister 和各种 Piper 飞机。加丹加空军利用大量刚果和国际领土的机场，包括加丹加、北罗德西亚、安哥拉和刚果共和国各地的机场。证据表明，加丹加空军控制下具有进攻能力且 1961 年 9 月可使用的飞机包括一架 Fouga Magister、一架 Dornier DO-28 和一些 De Havilland Dove 飞机。加丹加空军将这些飞机进行改装，使其可用于发动空袭和轰炸，并对联刚行动和刚果地面和空中目标进行了日夜行动。加丹加空军行动的军事装备似乎包括那些购买的装备以及在采矿公司——上加丹加矿业联盟(矿业联盟)——的参与下在当地制造的武器。

21. 加丹加空军少校 Joseph Delin 在早期的调查中证实，加丹加空军只有一名加丹加飞行员能够驾驶飞机袭击 SE-BDY，但与 Delin 所提证据相反的是，加丹加空军有多名现役飞行员。许多愿意参与加丹加武装部队行动的非飞行员人士当时也在该区域。根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还无法列出一个确定性清单，说明 1961 年 9 月 17 日午夜至 18 日凌晨加丹加或恩多拉附近究竟有哪些这样的人。但在相关时间，无疑有更多涉案人积极参与了反对联合国的战斗，人数比早期调查所考虑的要多。

22. 比利时雇佣兵、加丹加空军飞行员 Jan Van Risseghem 有可能在 1961 年 9 月 17 日前返回了加丹加。根据他自己的飞行日志摘录，1961 年 7 月至 9 月期间，Van Risseghem 与多个不同的副驾驶为加丹加空军驾驶了以下类型的飞机：Douglas DC-3、Dornier DO-28、De Havilland Dove、Fouga Magister 飞机和 Piper 飞机。

23. 还不能最终断定当晚空中没有飞机。除了加丹加空军的飞机外，恩多拉城内或附近还有其他飞机，包括皇家罗德西亚空军的 18 架堪培拉喷气式战斗轰炸机，30 架吸血鬼喷气式战斗轰炸机和 12 架轻型攻击轰炸机。

5. 外国情报机构

24. 1961 年，该地区有大量外国情报人员，而早期的调查根本没有提到这一点。尽管提出了请求，但会员国没有将外国情报人员创建的记录提供给本次调查，但通过独立研究或出于不相关的目的，某些官方记录已被曝光。此外，前情报人员自己也曾公开说明他们当时在该地区的活动。

25. 英国的情报活动是飞机坠毁前各事件的关键。秘密情报局(军情六处)的特工 Neil Ritchie 与包括英国驻加丹加领事丹齐尔·邓内特和英国驻索尔兹伯里高级专员 Alport 勋爵在内的其他人一起，安排了哈马舍尔德于 1961 年 9 月在恩多拉与莫伊塞·冲伯的会晤，SE-BDY 坠毁时哈马舍尔德及其随行人员正是在赶往恩多拉会晤的路上。为了安排此次会议，英国外交、情报和私人商业人员利用矿业联盟和其他设施相互沟通，并与比利时和加丹加当局进行沟通。美国似乎知道联合

王国和矿业联盟之间的某些互动,以及关键人物 Jean Cassart 和 Manfred“Freddy” Loeb 以及 Dornier 飞机公司之间的联系。

26. 1961 年,美国中央情报局似乎在刚果派驻了大量人员。中央情报局在利奥波德维尔站和伊丽莎白维尔站的行动包括空中行动(包括站长 Larry Devlin 协调特工“WIROGUE”和“QJWIN”)和包括计划暗杀的活动,如在“ZRRIFLE”计划和其他计划下开展的行动。中央情报局特工手中可能有 Dornier 和 Helio 飞机,以便在该地区开展行动。

27. 中央情报局的记录也显示西德在刚果开展了多个行动,包括特工 STAHL(Wolf Meister)和德国联邦情报局特工 Hans Germani。

6. 其他

28. 恩多拉机场空中交通管制保存的 SE-BDY 最后通信记录不完整,其中可能缺乏重要通信内容。空中交通管制员 Arundel Campbell Martin 似乎销毁了他的原始笔记,尽管他承认他知道这架飞机以及机上的乘客极其重要,而且他也不知道恩多拉空中交通管制没有录制对话内容磁带。

29. 关于人为破坏假设,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南非似乎有一个名为南非海洋研究所(海研所)的准军事组织。由于南非档案中的相关信息迄今尚未提供,因此无法确认 1961 年是否存在海研所,或者说海研所是否参与了所谓的“Celeste 行动”,据说此次行动的目的是“干掉”哈马舍尔德。

30. 罗德西亚当局的官方记录是,SE-BDY 的残骸是于 1961 年 9 月 18 日约 15 时 00 分被发现的,此时据其未能着陆已经过去了大约 15 个小时。但来自多个消息来源(本地和国外)的信息已经证实,残骸在此时间之前已被发现。

D. 结论和建议

31. 根据 2019 年报告中给出的理由,历史记录使其能够肯定地确信,某些会员国肯定创建或掌握着尚未向联合国披露的相关记录。例如,某些会员国情报特工所做的陈述或报告已经公开或在私人档案中被找到,外交信函称,信息也已送交情报机构采取后续行动。注意到相关时间会员国在该地区的政策、资产、设备和人员以及它们在刚果、该地区以及与联合国的接触,这些国家肯定记下了截获或无意中听到的通信内容。当意识到秘书长的飞机已经坠毁时,某些会员国肯定事后立即使用情报资产和情报信息来源生成了保密报告。尽管这些信息显然与确定坠机原因相关,但尚未披露。

32. 事实证明,大会第 72/252 号决议提供的指导方法大体上取得了成功,大多数会员国有意义地参与了一个在许多方面都属前所未有的进程。尽管 2018/19 年度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但并非所有会员国都进行了彻底的搜寻。尽管大会大多数会员国明确表示希望揭开不透明的面纱,但那些最有可能掌握重要信息的会员国即使是根据最适当的保密条件也还没有披露信息。

33. 鉴于某些关键会员国没有对调查作出实质性答复，或者似乎推断其情报、安全和国防档案中未保存“相关”信息，因为这些不是其法律框架允许查阅的普通档案，因此仍有工作要做。因此，2019年报告的结论是，没有理由推翻以下调查结果：外部袭击或威胁仍有可能是坠机原因，举证责任已转到会员国，以表明它们对其保管或掌握的记录和档案进行了全面审查。我谦卑地认为，各国应继续履行举证责任，直到大会认为，各国在披露与这一死难事件可能原因有关的相关资料方面已充分履行举证责任。

34. 我还已标出需要采取后续行动的具体事项，其中包括：对瑞典独立任用人员提供的照片进行弹道检查，这些照片照的看起来像是 DC-6 飞机的残骸而且残骸上有弹孔；搜寻任何现存的 1961 年 9 月布拉柴维尔机场及其周围机场的飞机出入境记录；分析与 Van Risseghem 有关的材料，包括飞行日志；要求美国和联合王国在其情报档案中寻找具体信息；要求南非查阅海研所的材料；查询有关外国情报人员的更多信息以及我报告正文中提到的其他事项。

35. 在不损害秘书长和大会特权的情况下，2019 年报告提出了四项相互兼容且相辅相成的建议。这些建议是：(a) 联合国任命一名独立人士继续按照知名人士的当前授权任务开展工作；(b) 再次敦促关键会员国保留或任命独立的高级别官员(独立任用人员)，以确定本国的安全、情报和国防档案中是否有相关信息；(c) 请任命的独立人士在任期结束时得出结论，说明会员国是否已遵守大会概述的进程，包括有关是否可能因不遵守该进程而得出任何推论的意见；(d) 联合国继续致力于通过一个专门的在线资料集公开最近调查获得的关键文件。

36. 最后，可能涉及对联合国秘书长发动了敌对行为的这一事件显然是最符合公众利益的问题。2019 年报告再次强调了继续合作寻找真相的重要性。这些问题不仅关系到联合国在世界上的作用及其与会员国关系的核心，还涉及我们对受害者家属以及真实叙述历史的责任。在了解导致 SE-BDY 航班坠毁的原因和情况的全部真相方面又取得了重大进展。必须鼓励会员国加倍积极参与，这对于最终找到信息，使这一死难事件调查能够完结依然很有必要。

大会第 72/252 号决议任命的知名人士的报告

目录

	页次
一. 导言	16
A. 初步问题	16
B. 调查结果摘要	17
C. 背景：以往的调查和质询	17
D. 任务和定义	19
E. 方法和活动	20
二. 扩大搜寻资料：要求会员国任命一名独立的高级别官员审查其情报、安全和国防档案	21
A. 导言	21
B. 会员国的答复	22
C. 联合国档案	27
D. 对会员国答复的意见以及资料搜寻工作遇到的限制	27
三. 关于坠机的可能原因的新资料	28
A. 空中或地面袭击或其他外来威胁	28
B. 人为破坏：Celeste 行动/南非海洋研究所	62
四. 其他新资料	66
A. 地方当局和外国当局的行为	66
B. 其他事项	74
五. 结果和结论	79
A. 导致坠机的一个或多个原因	80
B. 其他事项	85
六. 建议和结论	88
A. 建议的依据	88
B. 建议	89
附件	92

一. 引言

A. 初步问题

1. 正如 2017 年报告所述，1961 年 9 月 17 日午夜至 18 日凌晨，载有联合国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的一架注册号为 SE-BDY 的 DC-6 型包机于午夜刚过时在当时属于北罗德西亚的恩多拉附近坠毁。哈马舍尔德及其 15 名随行人员中的 14 人当场死亡，唯一的幸存者 6 天后死于创伤。新兴的联合国失去了第二任秘书长(死后被追授诺贝尔和平奖)和另外 15 名为刚果和平任务尽职奉献的男女工作人员。

2. 在坠机发生后的 58 年时间里开展了一系列调查，探究有关坠机原因的各种假设，包括空中或地面袭击或其他外来威胁(“外来袭击或威胁”)、人为破坏、劫持和人为错误。迄今，调查尚未得出定论。继 1961 年的两次罗德西亚调查后，联合国的一个调查委员会确定，它找不到证据来支持或排除为解释坠机原因提出的任何一种假设。因此，大会在 1962 年决定将这一事项留待进一步审议，请秘书长向其通报可能出现的任何新证据。2013 年，由四名知名法学家组成的私营志愿机构“调查达格·哈马舍尔德罹难原因法学家委员会”(哈马舍尔德委员会)的工作促成大会于 2015 年设立了一个独立专家小组，负责审查和评估有关这一灾难事件的新资料的证明价值。虽然独立小组有效排除了一些说法，但最终建议需要进一步查证或调查。为此，我在 2017 年被秘书长任命为知名人士，负责审查可能存在的新资料，评估其证明价值，确定任何进一步查证或调查应涵盖的范围，并在可能情况下，从已经进行的调查中得出结论。根据会员国和个人提供的新信息，我在工作过程中能够排除某些假设，同时为某些假设找到佐证。我在 2017 年 7 月向秘书长提交了报告。

3. 2018 年，我再次被任命为知名人士。根据大会第 72/252 号决议的指示，我的工作一个关键部分是通过信函与关键会员国联络，要求它们任命一名独立的高级别官员(独立任用人员)，对本国的情报、安全和国防档案进行专门的内部审查。本报告介绍了我与这些会员国的互动情况以及对他们和个人所提供信息的评估。

4. 本报告是独立小组在 2015 年在联合国主持下重新启动，在 2017 年继续开展的进程的延续，本报告借鉴了这两份报告的分析 and 结论。为便于参考，本报告包括调查结果的执行摘要，综合了根据 2015 至 2019 年期间获得的信息能够得出的临时结论。第三和第四节概述和评估了 2017 年报告结束后期间收到的相关新资料的证明价值以及需要进一步查证的事项。第五节阐述了本报告的调查结果和结论。第六节是我的建议和结论意见。

5. 与之前的报告一样，新信息再次列在副标题下，这些副标题大致与以前报告中使用的副标题相一致。这种结构安排本身并不是对任何一种坠机原因假设的相对可能性表示认可。相反，其目的是提供一致性，以便在本报告和以往报告之间进行交叉参考，因为要全面处理某一主题事项，必须一并阅读以往报告。

6. 首先必须指出，正如我在与会员国的信函往来中所指出的那样，为确保找到所有相关信息，必须从广义的、非排他性意义上，而不是从技术或法律意义上来

解释这一进程中“相关”一词的定义。因此，一条信息不会因为比如现行法律或其他框架不要求或不允许披露，就认为这是一条不“相关”信息。为确保找到所有相关信息，要求会员国确保他们准确地确定了其搜索的性质和地点，其任命的人员级别足够高，足够独立，因此，审查才能是真正不受限制、不受干扰且绝对详尽。

7. 我还要指出，由于我的授权任务无论从结构安排还是从资源分配角度来看都不是进行调查，因此报告并未说明我本人进行了详尽研究。相反，所分析的信息或者是会员国、个人或具有技术或专长的专家提出的信息，或者是在可公开查阅且有电子形式的文献中查到的信息。这一进程看起来正在变得越来越透明，多国政府及其根据第 72/252 号决议委派开展审查的独立任用人员的工作堪称典范。

8. 我感谢会员国及其独立任用人员的合作，感谢许多向我工作提供了协助的人。我一如既往地感谢联合国、特别是秘书处法律事务厅及档案和记录管理科提供的无保留支持。这两个部门的工作人员经常是在时间极其紧张的情况下，向我提供了敬业且专业的咨询和协助。我还要感谢我的助理西蒙·托马斯提供的出色支持。

9. 同前几年一样，我承认，如果没有那些自由慷慨地提供专长和信息的个人的努力，这一过程就不会重新启动或以同样成功的方式进行。我在报告中讨论了具体信息，但谨向提供信息和/或协助的以下人员(按英文字母顺序排列)表示非常感谢：Mandy Banton、电影《哈马舍尔德悬案》(*Cold Case Hammar skjöld*)剧组人员、Hans Corell、Raoul da Costa 上校、Mary Curry、Elisabeth de Kemoularia、Jan Eliasson、Manuel Fröhlich、Richard Goldstone、Torben Gülstorff、Sven Hammarberg、David Lea of Crondall 勋爵、Henning Melber、John Mussell、Maurin Picard、Anna Roosevelt、Victor Rosez、Victor Schonfeld、Stephen Sedley 爵士、Hans Kristian Simensen、Christelle Terreblanche、Björn Virving、David Wardrop 以及 Mark Wolf。出于历史原因以及不断得到的援助，我个人也再次对苏珊·威廉姆斯表示非常感谢。我也得到了其他不愿透露姓名的人的帮助；我也向他们表示感谢。

B. 调查结果摘要

10. 可将构成本报告一部分的执行摘要视为是关键事项当前已知情况摘要。执行摘要将 2015 年独立小组报告和 2017 年知名人士报告作为起点，根据 2018/19 年度开展的工作补充了结论方面的信息，详情如下。与任何此类事项一样，执行摘要也会根据今后的事态发展而进行调整。

C. 背景：以往的调查和质询

11. 正如 2017 年报告所总结的那样，之前对这起死难事件的官方调查和质询如下。1961 年 9 月 19 日至 11 月 2 日，罗德西亚和尼亚萨兰联邦政府民用航空部调查局(罗德西亚调查局)最先正式对坠机事件进行了调查。随后，根据 1955 年《联邦调查委员会法》成立了一个联邦调查委员会(罗德西亚调查委员会)。之后，联合国大会依据第 1628(XVI)号决议成立了 1961 年联合国调查委员会(1961 年委员会)，对导致这起死难事件的原因和情况开展国际调查。1961 年委员会找不到证据来支持或排除关于坠机原因的任何假设。因此，在 1961 年委员会的报告(A/5069)

发表后，大会在第 1759(XVII)号决议中表示注意到该报告，并请秘书长向其通报他可能注意到的任何新证据。

12. 2013 年，私人志愿机构哈马舍尔德委员会公布了一份报告，其中得出的结论是，联合国有理由重启对这起死难事件的调查。哈马舍尔德委员会由四个著名国际法学家组成，他们审查和报告了大量材料，包括个别研究人员所做的重要工作，比如 2011 年出版的《谁杀死了哈马舍尔德？联合国、冷战以及非洲的白人至上》一书的作者苏珊·威廉姆斯开展的工作。哈马舍尔德委员会得出的结论是，联合国确实有理由重启 1961 年委员会的调查，因为有充分证据表明有必要进一步调查飞机是否因遭遇某种形式的敌对行动而迫降。

13. 2014 年 3 月 21 日，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将哈马舍尔德委员会的报告提交大会，并附上一份说明，表示他的评估意见是，该报告载有新证据(A/68/800 和 A/68/800/Add.1)。此后，大会于 2014 年 12 月 29 日通过了第 69/246 号决议，其中请秘书长任命一个独立专家小组，负责审查新资料，评估其证明价值。大会在该决议中还鼓励会员国向秘书长公布和提供所掌握的任何相关记录。

14. 2015 年 3 月 16 日，秘书长宣布，他已依照大会要求任命了独立专家小组，其任务是审查新资料并评估其证明价值。他任命当时担任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首席大法官的我——穆罕默德·钱德·奥斯曼为独立小组组长，并任命航空安全专家 Kerry Macaulay(澳大利亚)和弹道学专家 Henrik Larsen(丹麦)为小组成员。独立小组完成工作的时间只有大约短短 10 周，2015 年 6 月 12 日，独立小组向秘书长提交了报告。收到独立小组的报告后，2016 年，秘书长跟进落实了独立小组向会员国提出的、但在其提交报告之时尚未得到答复的某些索要资料请求。2016 年 8 月 16 日，秘书长向大会报告了后续跟进情况(见 A/70/1017)，随后大会于 2016 年 12 月 23 日通过了第 71/260 号决议。大会在该决议中除其他外，请秘书长任命一名知名人士审查可能存在的新资料，评估其证明价值，确定任何进一步查证或调查应涵盖的范围，并在可能情况下，从已经进行的调查中得出结论。

15. 作为 2017 年 3 月根据大会第 71/260 号决议任命的知名人士，我于 2017 年 7 月完成了 2017 年报告，秘书长已于 2017 年 9 月将该报告转交大会(若想全面审议 2015 和 2017 年审查的说法，需一并阅读独立小组的完整报告和 2017 年报告)。该报告载有调查结果，包括举证责任已转到会员国，表明它们对其保管或掌握的记录和档案，包括那些仍然保密的记录和档案进行了全面审查，以找到潜在的相关信息。

16. 继审议 2017 年报告并导致本进程之后，大会在第 72/252 号决议中要求重新任命知名人士，其授权任务载于第 71/260 号决议中。总而言之，大会除其他外，敦促会员国提供信息，鼓励会员国解密或以其他方式提供机密记录，并首次鼓励会员国毫不拖延地任命一名独立的高级别官员对其情报、安全和国防档案进行专门的内部审查，以确定是否存在相关信息，随后将根据任何要求的保密安排传达结果摘要。

17. 在介绍早期调查时,必须指出,早期调查几乎没有提到坠机发生的时代背景。例如,罗德西亚调查局没有提到 SE-BDY 航班此行的目的与加丹加分裂有关;罗德西亚调查委员会简略提到,提议与莫伊塞·冲伯举行一次会议,但没有提到更多细节。当然,这两个机构都没有明确表示,坠机事件发生在涉及联合国的激烈冲突背景下。1961 年委员会的报告介绍了一些背景情况,包括联合国刚果行动(联刚行动)的行动背景和秘书长此行的目的,但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报告的许多关键分析都依赖于罗德西亚两个机构所做的工作。例如,这份报告除了介绍页外没有提到加丹加的雇佣兵活动,并且报告的分析几乎完全仅限于那些与坠机有关的技术问题。事实上,计划飞行但未成功飞行 SE-BDY 航班的时代背景是政治和军事局势极其动荡、去殖民主义和冷战并存的 1961 年,这一事实鲜被提及,这意味着这些查证工作没有考虑到广泛的潜在重要信息。

18. 在此方面,下文将进一步讨论的瑞典独立任用人员的报告写下了 1961/62 年度瑞典驻刚果特遣队指挥官 Jonas Waern 上校的以下一段话:“如果你不清楚当时正处于战局,我们的敌人一直在试图杀死联合国人员并击落我们的飞机,就不可能对有关哈马舍尔德之死的情况作出任何合理的猜测。不了解这一现实背景,所有的猜测都将是无稽之谈”。政治和军事背景的重要性以及这如何突出了 1960/61 年度期间外国情报实体和人员在该地区的重要性,这些都是不容忽视的方面,2019 年报告将对此进行进一步讨论。

19. 对背景的进一步了解使得 2017 年向会员国提出了搜寻请求,同时在联合国档案中进行搜寻,以涵盖独立小组确定的关键主题领域,目的是更好地了解坠机发生的相关背景,以找到新的相关信息。这一方法在确定拦截联合国通信以及加丹加武装部队能力等领域的事实方面卓有成效。在 2018/19 年度开展的工作过程中再次认为必须充分承认相关背景。

20. 首先,我注意到如果 2017 年报告中提出的某项调查结果归因于某一会员国,如该会员国提供了信息进一步澄清,这一澄清即已被考虑进去。如果 2017 年报告提出的某项调查结果没有收到会员国的澄清或补充资料,我即认为这一调查结果需要加强,直到收到值得重新审议的进一步资料为止。

D. 任务和定义

21. 2017 年我被任命为知名人士,2018/19 年度再次被任命为知名人士,知名人士的工作以独立小组的工作为基础,并有所推进。根据大会第 71/260 和 72/252 号决议,知名人士的任务一直是审查可能存在的新资料(包括会员国可能提供的新资料),并评估其证明价值。知名人士的任务还包括确定任何进一步查证或调查应涵盖的范围,并在可能情况下,从已经进行的调查中得出结论。关于知名人士的任务,需要做一点限定说明,即与独立小组的任务一样,它不涉及对这起死难事件进行全面调查或查证。

22. 独立小组将“新资料”的定义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 1961 年委员会没有看到的资料,第二类是 1961 年委员会当时已经看到,但由于新材料、科技发展或

最佳做法的出现，现在能够从新角度加以审视的资料。我采取了类似的定义办法，并根据需要依照新出现的资料重新审查了以前分析过的资料。

23. 关于“证明价值”的定义，我的处理方法与独立小组的一样，即有关资料独自或是与其他资料结合在一起，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趋向于证明或否定存在或不存在某件或某些相关事实。根据以下标准(并非全部标准)，我对每一项可能的资料进行了考量：资料的真实性(包括前后一致性和当时性)、资料的类型(例如主要资料、次要资料、传闻或间接资料)、资料的可信性(包括与其他资料或已核实情况的一致性)、专家技术评估结论以及有关资料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其他材料的支持。例如，一项新资料的证明价值或许被评定为“弱”，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它所涉及的假设已被否定。相反，评估结果针对的是某一项具体证据及其是否趋向于证明或否定有关事实。此外，一条资料的评估价值可能会随着其他进展信息发生变化，其证明价值可能会被评估为增强或减弱。

24. 说到定义，还必须指出，这一过程中的“相关”一词的定义必须从广义的、非排他性意义上解释，而不是从技术或法律意义上解释。因此，一条信息不会因为比如现行法律或其他框架不要求或不允许披露，就认为这是一条不“相关”信息。

E. 方法和活动

1. 方法和活动说明

25. 根据上述授权任务，知名人士的作用要求对会员国和个人提供的资料进行审查和评估，与政府代表和私人信息来源协商，约谈证人，包括专家证人。已对现有记录并相对于现有记录对所获得的资料进行了评估。

26. 我再次用四个类别来评估新资料的证明价值：零、弱、中或强。如果单独评估一条资料的证明价值没有好处或不可能，但这条资料可能属于任何进一步查证范围，这一点我已经注意到了。

27. 在这份报告中，我再次认为，那些无凭无据或不着边际的说法没有真实可能性。我的工作一个关键内容就是排除那些没有证据支持的论述或说法，以便能够将搜寻重点放在那些仍然有据可依的问题上。在此方面，我只审议了那些具有一定的事实、法律、环境或推理基础，因此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所谓新资料。

28. 我再次指出，我们对1960年代初刚果境内及周边相关情况有了更多认识，这有助于我们继续了解这起空难事件。了解有关事件所发生的背景尤其重要，因为这使得我们可以依据一个单独资产或单独设备当时是否在该区域的事实等方法来断定是否该将某项假设排除在外或潜在地给予更多支持。资料搜寻工作做得越多，或者公开的资料越多，出现新的和/或相关资料的可能性就越大。因此，在某些区域，请求提供新资料和搜寻新资料的范围也已扩大。我将在下文第三和第四节讨论在了解相关背景方面取得的进一步进展。

29. 关于如何请求会员国提供资料，根据大会第 [69/246](#) 号、第 [71/260](#) 号和第 [72/252](#) 号决议规定的索取资料请求，2018年3月，我向以下会员国提出了这一请

求：比利时、加拿大、法国、德国、俄罗斯联邦、南非、瑞典、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2018年早些时候，我将索取资料请求的范围扩大至包括安哥拉、刚果民主共和国、葡萄牙、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等国。下文第二至第五节将进一步讨论索取资料情况和索取结果。

30. 个人也继续提供资料。我在工作中与这些个人进行了通信往来，分析了他们以及自愿提供信息的其他个人提供的相关资料。有时这些信息已经公布，如在我目前任期内公映的电影和发表文学作品，有时这些信息是私下发给我的。下文第三和第四节也将讨论个人提供的资料。本报告的编写也得到了许多个人志愿者的协助，他们向我提供了专家意见和技术评估。我非常感谢他们在极为紧迫的时间内做出的工作和贡献。有关飞机的专家评估，我再次得到以下两名前战斗机飞行员的协助：塞内加尔空军前参谋长 Raoul da Costa 上校(退役)和事故调查员 Sven Hammarberg。

2. 制约和限制

31. 2015年的独立小组和2017年的知名人士分别只有数周和数月的时间来分析大量资料，评估其真实性和可信度，并将其综合成一份报告。这次的任务期限更长，这对开展更多参与式互动非常有益。然而，我作为知名人士的工作受到的限制包括我的任务不是进行全面调查，我的工作也没有这种性质的资源。尽管如此，但任务期限延长对于与会员国互动特别有好处，这些互动往往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以便遵守各国的内部安排以及开展极其耗时的搜寻和查证工作。某些会员国根据第72/252号决议随后在合作方面取得了重大发展。令人遗憾的是，并不是所有会员国都利用这段更长的时间开展有意义的工作，这一问题我还会再次提及。

32. 我应该指出的是，搜寻工作可能又一次看起来像是侧重某些会员国。这一想法合乎逻辑，因为当时一些会员国在刚果境内和周边地区派驻的人员确实比其他国家更多，而且因为自那以来，这些会员国的个人和机构一直在继续调查当时的情况。但不应将这一做法理解为其他会员国或私人来源没有相关信息。

33. 本报告即使与之前的那些报告一并阅读，也没有而且不会自诩为是有关这一事项的一部综合性专著。正如前几份报告所报告的，本报告只是寻找全部真相过程的一部分，而在这一过程中新的事实陈述仍不断出现。至于最根本的问题，即是什么原因导致了飞机坠毁，我认为我们还没有看到存在的所有相关材料。我现在几乎可以肯定这一点，这一点我在下面还会再次提到。尽管如此，但如第五节所述，我们仍然可以确信依据现有资料得出的某些调查结果和结论。

二. 扩大搜寻资料：要求会员国任命一名独立的高级别官员审查其情报、安全和国防档案

A. 引言

34. 2015年曾要求会员国在其记录和档案中搜寻可能有助于了解这起死难事件的资料。2017年，我请一些会员国和联合国将搜寻范围扩大到重点主题领域，试

图找到潜在的新资料，帮助了解坠机事件发生的相关背景。2017年，我向联合国和以下8个会员国发出了进一步搜寻资料的请求：比利时、加拿大、法国、德国、俄罗斯联邦、南非、联合王国和美国。注意到1960年代刚果境内和周边地区的非殖民化进程和地缘政治局势的其他方面，我选择请求这些会员国提供协助是因为从现有记录来看，它们最有可能掌握极其相关的资料。但我注意到，其他会员国也可能掌握着相关资料，而且大会已要求所有会员国参与并提供协助。

35. 我感谢各会员国2017年的合作，挖掘出大量重要的、新的相关资料。2017年收到的资料在2017年报告中进行了讨论，其中的关键内容也在下文中进行了讨论。挖掘出许多新的重要资料；但这些资料几乎完全来自外交和/或政治档案。

36. 2018年3月，依据大会第72/252号决议概述的进程，我请上述8个会员国和瑞典各任命一名独立的高级别官员对其国家的情报、安全和国防档案进行专门的内部审查。在进一步评估可以在哪里找到相关信息之后，我还在2018年6月请求另外5个会员国也任命这样的独立官员。这些国家是安哥拉、刚果民主共和国、葡萄牙、赞比亚和津巴布韦。这是首次通过大会的明确指示，具体要求会员国确保他们的搜寻工作涵盖情报、安全和国防档案。

B. 会员国的答复

答复摘要

37. 以下是会员国对于要求它们任命一名独立的高级别官员(独立任用人员)对其情报、安全和国防档案进行专门内部审查的答复摘要。我在摘要中提到了独立人员的职位、任命时间、何时收到他们的任何报告以及他们是否确认可以不受限制地查阅情报、安全和国防档案。对各会员国各自进程的更多评论意见载于下文第五节下的结论部分。

安哥拉

38. 2019年4月，安哥拉告知我，在1961年9月的相关时间，安哥拉是葡萄牙殖民地。因此，安哥拉现政府查阅不到殖民时期创建或掌握的保密文件。我将此事转交给葡萄牙，葡萄牙的答复将在下文讨论。

39. 根据安哥拉的答复，似乎再问下去也不太会获得新资料。我感谢安哥拉的答复。

比利时

40. 2018年5月，我获悉比利时已任命情报和安全事务常务委员会(R委员会)主席兼列日上诉法院总检察长 Guy Rapaille 和皇家军事学校军事教官兼军事历史首席主席 Kris Quanten 中校为其独立任用人员。比利时独立任用人员应要求提供了一份全面的中期报告，介绍他们在截至2018年10月前开展的实质性工作。2019年5月，Rapaille先生退休，我获悉，Serge Lipszyc 已被任命为继任独立任用人员，Quanten先生还在继续这项工作。

41. 2019年6月，我收到比利时独立任用人员的最后报告。Lipszyc先生和Quanten先生的这份报告指出，比利时允许他们完全查阅国防部、国家安全局及情报和安

全总局保存的所有文件和档案。报告指出，任务授权不含审查非国家行为体或私营组织的档案。

42. 我向 Rapaille 先生、Quanten 先生、Lipszyc 先生和他们的团队所做的努力和开展的重要工作表示感谢。比利时政府通过其工作提供的关键资料将在以下相关专题领域进行讨论。

加拿大

43. 2018 年 10 月，我获悉加拿大已任命加拿大全球事务部联合国司司长 Jeffrey Marder 为独立任用人员。Marder 先生在 2019 年 4 月提供了一份最后综合报告，其中确认他获准查阅所有被认定可能与调查有关的记录和档案，其中包括可全面查阅加拿大政府的中央档案和记录存放处、加拿大图书馆和档案馆(也包括加拿大全球事务部的前身——对外事务部)和由国防部和枢密院办公室管理的军事档案以及私人档案。协助 Marder 先生的研究人员还得到了加拿大教授 Kevin Spooner 的帮助，他是当时加拿大参与刚果事务的专家。

44. 我向 Marder 先生及其团队所做的努力和开展的重要工作表示感谢。加拿大政府通过其工作提供的关键资料将在以下相关专题领域进行讨论。

刚果民主共和国

45. 2018 年 10 月，我获悉刚果民主共和国任命军事情报参谋的政治战略顾问 Daniel Felix Thabizé Yengolas Elemani 为独立任用人员。

46. 2019 年 7 月，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独立任用人员提供了一份中期报告，其中指出这项工作已被推迟但仍在进行中。报告证实，他可以查阅所有文件和档案，包括机密和非机密、私人或公共的文件和档案。此外，已经开始与安全、情报和司法服务部门进行交流，以获取 1960 和 1961 年其档案中的文档和文件。报告还证实，正在通过金沙萨的国家中心局与国际刑事警察组织(国际刑警组织)合作，中心局还要求该国的上诉法院总检察长办公室提供资料。

47. 我感谢 Thabizé Yengolas Elemani 先生所做的努力和开展的重要工作，令人很受鼓舞。我还注意到，比利时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相互提供了帮助和协助，这一点值得表扬。

法国

48. 2018 年 5 月，我获悉法国已任命法国巴黎政治大学荣誉退休教授兼法国外交文件编辑 Maurice Vaïsse 为独立任用人员。

49. 法国独立任用人员应要求提供了一份中期综合报告，介绍他在截至 2018 年 10 月前开展的实质性工作。2019 年 6 月，他提交了一份最后报告，其中确认他在 2019 年被专门授予了可查阅相关文件的接触国防机密文件许可，他可以查阅包括情报、安全和国防档案在内的档案，其中包括外交部、文化部、国家档案馆、国防部和武装部队、防卫和国家安全总秘书处、外国文件和反间谍局的档案以及包括巴黎政治大学历史中心和民航总局在内的私人档案。

50. 我向 Vaïsse 先生所做的努力和开展的重要工作表示感谢。法国政府通过 Vaïsse 先生的工作所提供的关键资料将在以下相关专题领域进行讨论。

德国

51. 2018 年 5 月, 我获悉德国已任命副部长兼总理府联邦情报局历史处理专员 Hans Vorbeck 为独立任用人员, 他从 2018 年 5 月开始工作, 直至 2018 年 6 月退休。自 2018 年 8 月起, 大使兼联邦外交部网络外交政策和网络安全特别代表 Thomas Fitschen 被任命为独立任用人员。

52. 德国独立任用人员根据要求提供了一份中期综合报告, 介绍他截至 2018 年 10 月前开展的实质性工作。2019 年 6 月, 他提交了一份最后报告, 证实德国允许他查阅联邦外交部、联邦国防部、联邦经济事务和能源部、联邦情报局、慕尼黑机场海关调查股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之前也被称为“东德”)的任何档案, 包括东德情报局的文件。他还表示, 他仍在追踪私人档案中的一条信息。

53. 我向 Fitschen 先生所做的努力和开展的重要工作表示感谢。德国政府通过 Fitschen 先生的工作所提供的关键资料将在以下相关专题领域进行讨论。

葡萄牙

54. 2019 年 2 月, 我获悉葡萄牙已任命 José Júlio Pereira Gomes 大使为独立任用人员。

55. 2019 年 5 月, 葡萄牙的独立任用人员提供了一份最后综合报告, 介绍他所做的实质性工作。这份报告证实, 所有记录和档案, 无论保密级别如何, 查阅均不受限制, 包括外交档案(包括外交部政治事务办公室)、军事历史档案、国防档案、空军历史档案、东波塔档案馆的国家档案、情报局档案(安全部国内外防卫警察总局)和海外历史档案。

56. 我感谢 Pereira Gomes 先生所做的努力和开展的重要工作。葡萄牙政府通过 Gomes 先生的工作所提供的关键资料将在以下相关专题领域进行讨论。

俄罗斯联邦

57. 2018 年 5 月, 在我提出请求后, 俄罗斯联邦通过普通照会告知我, 俄罗斯联邦主管部门正在对情报、安全和国防档案进行审查, 以确定是否有与达格·哈马舍尔德调查有关的信息。

58. 2019 年 3 月, 我致函俄罗斯联邦, 要求俄罗斯进一步参与大会规定的独立任用人员进程。该函件的复印件作为本报告附件附上。

南非

59. 我 2017 年发给南非的援助请求没有得到答复。2018 和 2019 年, 我与南非进行了多次正式和非正式接触。我还请秘书长与南非政府进行高级别接触, 并请已故前秘书长科菲·安南与南非政府接触。

60. 2019年5月,在我最初提出请求15个月后,在收到其他独立任用人员的最后报告的最后期限之后,南非通知说,其已任命大使兼国际关系与合作部主管全球治理和大陆议程的副司长 Mxolisi Nkosi 为协调人。

61. 尽管在2019年6月与 Nkosi 先生进行了接触,但没有收到他的工作实质性最新情况介绍。2019年3月,我致函南非,要求南非进一步参与大会规定的独立任用人员进程。该函件的复印件作为本报告附件附上。

瑞典

62. 2018年4月,我获悉瑞典已任命前大使 Mathias Mossberg 为独立任用人员。我特别感谢 Mossberg 先生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的领导作用和作出的非常重要的个人努力,详情下文将进一步介绍。

63. 瑞典独立任用人员根据要求提供了一份中期综合报告,介绍他在2018年10月前开展的实质性工作。2019年5月,他提交了最后报告,其中确认外交部于2018年9月9日通过了一项决定,允许他可以完全不受限制地查阅所有档案。他不受限制地查阅了所有档案和记录,包括外交部(包括已经移到别处的外交部记录)、瑞典国家档案(包括瑞典皇家民用航空委员会和瑞典刑事军警)、达格·哈马舍尔德档案(瑞典国家图书馆馆藏)、皇家民用航空委员会、军事档案、瑞典军事情报、国防广播机构、瑞典安全局和私人档案(包括 Wallenberg 家族、阿特拉斯科普柯、泛航、Virving 和 Hellstrom 家族的档案)。

64. 瑞典采取了具体步骤,确保其独立任用人员可完全查阅所有可能相关的信息,包括敏感的情报、安全和国防档案。瑞典政府还向独立任用人员提供了足够的资源,使其能够在适当水平的协助下,手动和数字查阅大量材料。虽然独立任用人员的工作不受限制,但保密信息本身只能按照待商定的条款与联合国分享。这正是2017年报告建议中提出的安排形式,我也感谢瑞典在这方面发挥的领导作用。

65. 瑞典独立任用人员搜索了以前搜索过的档案,包括政治和外交档案,以及其他尚未搜索过的潜在相关来源,包括私人个人和公司的档案。这些类型的搜索既重要又必要,因为了解的情况越多意味着以前认为不重要的新人物、设备和其他事实后来经证明发现很重要。我感谢 Mossberg 先生所做的努力、开展的重要工作及发挥的领导作用。瑞典政府通过 Mossberg 先生的工作所提供的关键资料将在以下相关专题领域进行讨论。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66. 我2018和2019年分别与该国进行了多次正式和非正式接触。我还请秘书长与联合王国政府进行高级别接触。在我初步开始编写我的中期报告的日期之后,即2018年11月9日,我收到了联合王国对我2018年3月所提出请求的答复。联合王国在答复中指出,该国不打算任命一名独立的高级别官员,因为对调查有直接价值的所有信息联合王国前几年均已提供,或者已经公布并可公开查阅。我在给联合王国的答复中强调,在我看来,联合王国的其他档案中存在其他相关信息的可能性似乎很大。

67. 2019年5月,在我最初提出请求15个月后,在收到其他独立任用人员的最后报告的最后期限之后,联合王国通知说,它已任命外交和联邦事务部敏感问题高级审查员兼前大使Graham Hand为审查员。2019年6月,Hand先生给我回信,称他拿到了必要的接触机密文件许可,并且充分了解对调查可能有用的英国政府文件范围。他进一步表示,所有相关文件都已适当找到并完全可以查阅。为查找任何相关信息,已经对所有相关文件都进行了充分全面的审查,文件中任何微小的修订都有理由,且与这一调查无关。Hand先生再次重申的观点是,英国政府掌握的所有载有与已故秘书长之死调查有关资料的文件均已被完全找到,并已根据之前的要求提交。

68. 我对Hand先生所做的工作表示感谢。如上所述,联合王国政府未提供资料。出于下文进一步概述的原因,本报告附件列出了我2019年3月给联合王国的信函,因为其中提出的问题尚未得到具体答复,这些问题可以作为今后审议的基础。

美利坚合众国

69. 2018年4月,我获悉,美国已任命美国国务院国际组织事务局主管国际组织事务的代理副助理国务卿Eric Gaudiosi(2018年3月至9月)以及美国国务院国际组织事务局代理首席副助理国务卿Joseph Manso(2018年10月起)为独立任用人员。

70. 美国的独立任用人员没有提供关于实质性问题的中期报告或最后报告。他2019年4月29日的信指出,搜寻工作很全面,涵盖了情报、安全和国防档案。还向我发送了一份文件(下面将进一步讨论)。

71. 我对Manso先生的工作表示感谢。由于下文进一步概述的原因,本报告附件列出了我2019年3月给美国的信函,因为其中提出的问题尚未得到具体答复,这些问题可以作为今后审议的基础。Manso先生在信的最后说,“为答复你提出的更多请求,包括你2019年3月24日来信附件中提出的那些请求,我已经将我们的搜索工作扩大至涵盖更多的美国情报机构。虽然这些搜索工作在你提交最后报告时还无法完成,但我们期待今后能够与您合作。”

赞比亚

72. 2019年2月,我获悉赞比亚已任命总统办公室主任John Zulu为独立任用人员。

73. 2019年6月,赞比亚的独立任用人员提供了一份最后综合报告,介绍他所开展的实质性工作。这份报告由他和外交部长共同签署,其中确认所有记录和档案,包括情报、国防和安全档案,都可以完全查阅,无论保密等级如何,均不受限制。他未调查私人档案。

74. 我向Zulu先生所做的努力和开展的重要工作表示感谢。他的工作成果将在下面的相关主题领域中进行讨论。

津巴布韦

75. 2018 年 10 月，我获悉津巴布韦已任命参议员兼前任国防和国家安全部长兼国务秘书 Sydney Sekeramayi 为独立任用人员，由 Asher Tapfumaneyi 准将及其团队提供协助。

76. 2019 年 5 月，津巴布韦的独立任用人员提供了一份综合报告，介绍他所开展的实质性工作。这份报告证实，津巴布韦允许其独立任用人员可完全查阅所有文档和档案，无论保密等级如何，包括情报、安全、国防档案，包括津巴布韦国防军(皇家罗德西亚军队继任机构)、津巴布韦国民军、津巴布韦空军(皇家罗德西亚空军的继任机构)、中央情报组织(罗德西亚特种部队的继任机构)、津巴布韦共和国警察(前罗德西亚警察组织和英国南非警察的继任机构)、津巴布韦民航局(罗德西亚民航局的继任机构)和津巴布韦国家档案馆的档案。Sekeramayi 先生及其团队在向我提供了他们的报告后依然继续工作，在本报告截稿前又向我提供了更多有用的最新情况。

77. 津巴布韦独立任用人员指出，关于这一主题的搜寻材料有限，因为在津巴布韦独立之前，罗德西亚当局“小心翼翼地删除了几乎所有与达格·哈马舍尔德坠机有关的每一份记录或档案”。

78. 我向 Sekeramayi 先生及其团队所做的努力和开展的重要工作表示感谢。虽然 Sekeramayi 先生及其团队后期才参与此事，但却开展了大量工作，并发现了大量重要信息。津巴布韦政府通过 Sekeramayi 先生的工作所提供的关键资料将在以下相关专题领域进行讨论。

C. 联合国档案

79. 我再次获得许可，可不受限制地查阅联合国所有档案，并得到了秘书处档案和记录管理科工作人员非常有用的优先协助。2018/19 年度，为寻找或核实信息，我再次审查了大量联合国文档。秘书长告诉我，除 23 份文档外，联合国刚果行动的所有文档均已完全公开。根据联合国的既定政策，这 23 份文档依然处于“绝密”状态。我可以确认，我已经要求查阅并安排审查了所有这 23 份文档的全部内容，根据我在本文中所讨论的所要求会员国提供“相关”资料的定义，我可以证明其中没有一份文件含与达格·哈马舍尔德调查有关的信息。我还获悉，本着透明原则，联合国进行了全面的解密，又解密了数千份与刚果有关的文件。下文将在相关标题下讨论从联合国找到的新资料。

D. 对会员国答复的意见以及资料搜寻工作遇到的限制

80. 必须指出，不能说搜寻工作已经结束。有些限制与会员国的意愿有关，有些则与操作问题有关。

81. 关于前一类限制，搜寻过程全面性受到的最严重限制仍然是某些会员国没有按照大会的敦促给予充分、真正和积极的合作。我感谢被要求参与搜寻过程的大多数会员国向我提供的帮助。比利时、加拿大、刚果民主共和国、法国、德国、葡萄牙、瑞典、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等会员国明确确认，在看起来属于情报、安全

和国防档案的范围内进行了搜寻。即使在这些会员国中，其中某些国家也表示，搜寻工作仍在进行中。

82. 包括俄罗斯联邦、南非、联合王国和美国在内的某些其他会员国可能还有工作需要完成，以确保以足够透明方式进行全面搜寻，使我们充分相信已找到了所有潜在相关信息。

83. 关于操作问题，正如我在 2017 年所注意到的，正在开展的搜寻工作的性质导致知名人士、会员国、联合国和个人的工作受到一些限制。例如，那个时代的大多数档案没有数字化，这意味着不能通过使用关键字就算是笼统地进行了全面搜索；一般只显示文件夹名称(往往很笼统)。此外，即便材料已被扫描，但关键词搜索也显示不了想要找的信息，原因可能包括拼写不同，例如，雇佣兵的名字或化名的拼写千差万别；或者是由于老式排版或手写文件的数码字符识别度低。

三. 关于坠机的可能原因的新资料

84. 本节分析会员国和个人提供的关于坠机的可能原因的新资料。将根据这些资料的性质和类型评估其证明价值，或讨论在可能进行的进一步调查范围中将其放在何处。

85. 如下分析所示，掌握了更多与这一次主题有关的情况，尤其是在会员国可能截获联合国通信以及加丹加武装部队对秘书长飞机发动可能攻击的能力这两个方面。从以下各节也可以明显看出，某些信息来自 2017 年及之前的消息来源，而某些其他方面则来自 2018/19 年度新收到的信息。后一类包括以下方面提供的一些信息：独立任用人员、Victor Rosez(1961 年 9 月背景事件的一个目击证人)和《哈马舍尔德悬案》电影团队等。

A. 空中或地面袭击或其他外来威胁

86. 自 1961/62 年度的调查以来，关于另一架飞机击落或以其他方式威胁 SE-BDY，导致其坠毁的可能性的重大新信息浮出水面。2017 年的报告也考虑了 SE-BDY 的飞行员受到干扰或分心的可能性，如果干扰发生在即将降落的临界点，可能会导致坠机，但不会留下弹孔等任何其他物证。独立小组工作结束后，2017 年和 2018/19 年度分别从个人和会员国收到了关于这一专题的更多新的相关信息。

87. 2017 年报告中在本标题下审查的被认为具有证明价值的信息包括：

- Paul Henry Abram 说，1961 年 9 月 17 日午夜至 18 日凌晨，他在希腊 Irakleio(Heraklion)的一个美国国家安全局监听站工作时无意中听到袭击飞机的无线电通信，他提供了他所说的额外服役记录。美国认为他所述的部分内容不准确。
- 2015 年，美国对独立小组 2015 年的一项问询作出答复，称美国不知道 1961 年“法国人”在“中央情报局的协助”下向加丹加交付了多架 Fouga Magister 喷气式飞机。但在 2017 年，美国表示，1961 年 2 月，一家美

国商业航空公司实际上交付了有关货物，还提供了关于交货细节的更多信息。

- 比利时雇佣兵飞行员 Jan Van Risseghem 有可能在 1961 年 9 月 17 日之前返回了加丹加。虽然关于 Van Risseghem 返回加丹加的日期的信息相互矛盾，但无论如何，他并不是该日期在加丹加的唯一一名雇佣兵飞行员，也不是唯一一个能够驾驶 Fouga Magister 飞机的人。
- 哈马舍尔德的前私人助理克劳德·德凯莫拉里亚(1957-1961 年)后来成了著名的法国外交官和商人，他在 1960 年代末遇到了自称叫“De Troye”和“Beukels”的两个人，Beukels 称参与了对 SE-BDY 的空袭。德凯莫拉里亚似乎在 1960 年代诚挚地向法国和瑞典当局转达了这一信息，而不是之前所理解的 1980 年代。
- 关于加丹加空军在 1961 年对联合国部队的攻击中非常成功地使用 Fouga Magister 喷气式飞机情况，关于 1961 年 9 月 17 日午夜至 18 日凌晨是否出动了不止一架 Fouga Magister 飞机的证据相互矛盾。Fouga 飞机能够发动空对空攻击，还攻击了在加丹加的美国飞机(不仅仅是联合国飞机)。
- 关于加丹加空军使用的 Dornier DO-28 型飞机，这是 1961 年西德向加丹加提供的商用飞机，1961 年 9 月之前刚果至少有一架该类型飞机。这架飞机可能经过了改装，可用于发动空中袭击和轰炸。这架飞机对联合国进行了日夜轰炸，并似乎试图发动空对空攻击。DO-28 型飞机的活动地点既有加丹加，又有北罗德西亚(卡尼阿马和恩多拉之间相距约 1 000 公里)。
- 恩多拉及其周边可用的机场比早期调查最初想到的要多，加丹加空军既可使用加丹加的机场，也可使用北罗德西亚的机场。
- 根据加丹加空军 Joseph Delin 少校提供的证据，早期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只有一名加丹加飞行员有可能驾驶飞机攻击 SE-BDY。后来的证据表明，这样的飞行员不止一名，但确切地说 9 月 17 日和 18 日谁在加丹加尚不能完全确定。

88. 2018/19 年度收到的信息拓展了 2017 年分析的信息，并包含了以下新信息。

1. 截获无线电通信

(a) Paul Henry Abram

89. Paul Henry Abram 2015 年给独立小组提供资料时说，1961 年 9 月 17 日午夜至 18 日凌晨，他个人听到了关于在刚果或其附近击落一架飞机的无线电通信。Abram 当时驻守在美国国家安全局驻希腊克里特岛 Irakleio(Heraklion)的一个监听站。Abram 说，他之前是一名美国空军安全事务官员，并提供了各种文件，确定他所说的确信是他的服役记录。

90. 2015 年 Abram 接受独立小组约谈时详细介绍了他的说法，他说，在 1961 年 9 月 17 日之前几天，监听站将 SE-BDY 的预计飞行计划交给了他，其中包括关

于飞机类型和“飞机编号”的资料，并注明目的地为恩多拉。他说，9月17日午夜至18日凌晨他在值夜班时，听到有人在无线电上说：“飞机过来了……机上的灯很亮”，随后有人在另一个波频上用非美国口音的英语说：“美国人刚刚击落了一架联合国飞机”。这些通话之后，各语文各波频的“无线电杂乱通话”大量增加。他认为，截获的信息是实时听到的，并将信息记录在磁带上，录音带原件和信息内容传真应该交给了位于马里兰州米德堡的国家安全局和英国情报安全组织——政府通信总部。Abram 进一步表示，他将当时听到的情况告诉了同事，随后在场的其他军官收听了重播。他表示，他在国家安全局的主管在 Heraklion 和位于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凯利空军基地的美国空军安全局总部。我注意到，Abram 后来做出的类似陈述与他在 2015 年告知独立小组的内容一致。

91. 2015 年，Abram 还向独立小组提供了他的退役记录复印件和一份文件，其中显示他在希腊 Heraklion 参加了“教育服务方案”。2016 和 2017 年，Abram 向联合国和知名人士提供进一步文件，意在证明其服役经历，包括他的身份识别号/代号“AbelBaker”。

92. 2015、2016 和 2017 年都曾要求美国提供与 Abram 说法有关的信息，包括他的服役记录信息，他当时是否在美国空军或其他政府部门服役，他是否曾驻扎在希腊以及他当时是否在为国家安全局工作，职务是什么。2015 年，美国未就 Abram 一事做出回应。2016 年，收到一份回复称，美国空军没有关于此人的信息。2017 年 6 月，在我提供了 Abram 提供的进一步信息后，美国答复说，“无法找到有关 Abram 先生的任何进一步信息。我们无法鉴定你提供的据称显示 Abram 先生服役情况的文件的真伪。我们不知道美国政府是否掌握可以支持 Abram 先生的说法或为其说法提供证明的任何资料或文件。”

93. 但 2017 年 7 月中旬，在我写完 2017 年报告前几天，我收到了美国发来的又一封信。这是一份五页的表格，第一页与 Abram 提供的服役记录内容相符。其他几页的内容是有关他服役情况的行政记录，包括专业职务“语音侦听规程专家”、获奖情况、接触机密文件许可、出勤记录和外国服务标志。这份资料附有一封信，称“美国空军记录……显示 Paul Abram 于 1959 年 10 月 24 日开始在克里特服役。记录还显示，Paul Abram 返回美国的时间是 1961 年 4 月 7 日。因此，看起来 1961 年 9 月 Paul Abram 不在克里特岛”。

94. 我问 Abram 对他在相关时间不在克里特岛的说法有何回应。Abram 确认了他最初的说法，并表示表格上列出的日期肯定不准确。他确定这一点的依据是他依然记得相关时间或在此前后发生的其他重要生活事件，并确认他 1961 年 9 月确实以所述身份在克里特岛，他认为美国提供的记录不准确。

95. 2018 年 4 月，我给美利坚合众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尼基·黑利写信，试图澄清为何会出现如此明显的差异。我在该信中特别指出，“我注意到，在我提交 2017 年报告时，关于 Paul Abram 先生和 Charles Southall 先生服役记录的全部细节信息仍然相互矛盾。仍有必要最终确认这些全部细节，包括这两名军官在 1961 年关键时期任职的职务，在此期间他们在特定工作地点的确切日期，以及他们各自声称录制并保留了他们说他们所听到内容的磁带或其他记录。此外，如果美国对

我在 2017 年报告中或除此之外提出的问题有任何其他澄清或进一步信息，我将不胜感激”。在这封信之后，我也写信给美国的独立任用人员，让他跟进此事。

96. 对于我对 Abram 陈述内容所提出的问题，美国没有作出任何回应。2019 年，我获悉，Abram 已于 2018 年底去世，享年 77 岁。

97. Abram 的说法，如果是真的，显然在这件事上是最重要的信息。多年来一直在要求美国提供支持或排除这些说法的信息。2015 至 2017 年，尽管已将有关 Abram 的大量详细信息，包括其服役地点、职务、服役记录编号等传给美国核实，但美国表示没有关于此人的资料。在没有解释为何立场转变的情况下，2017 年 7 月，美国最终确认了 Abram 所陈述的他作为拦截专家在克里特岛服役这一依据，但表示他 1961 年 9 月不在克里特岛。当 2017 年至 2019 年期间把 Abram 的说法与美国相左的地方要求美国进一步澄清时，同样没有收到任何答复。

98. 2015 年，独立小组评估认为，Abram 提供的 SE-BDY 受到攻击的信息的证明价值为“中”，我在 2017 年暂时确认了这一评估结果。值得注意的是，多年来，美国有足够的机会反驳或澄清 Abram 反复重申的说法。他于 2019 年去世后，就再也不能就解决他在克里特岛监听站实际任职的确切时间和事件顺序这一关键问题做出任何进一步陈述。虽然一个重要的当事方现已无法就这一有争议的问题陈述其观点，但由于这直接关系到确定他在克里特岛服役的确切时间，这不仅可以通过 Abram 在美国政府的服役记录，也可以通过其他佐证或证明材料进行核实，对于这一性质的调查，将这一问题标记为需继续跟进的问题并非完全无效。

99. 从整体上考虑这一信息，包括 Abram 于 2017 年 7 月最后重申他在有关日期确实在克里特岛；他的专长是持有美国空军接触机密文件许可的语音侦听规程专家；鉴于他在国家安全局监听设施的任务性质，我认为 Abram 的说法具有很强的证明价值，即美国当时正在监控无线电通信，并且美国很有可能创建了相关录音内容记录。关于 Abram 截至目前提供的与 SE-BDY 攻击有关的信息，我继续将这部分信息的证明价值评估为“中”。这些评估，包括其与其他事实和材料的关系可能会根据新信息和新进展而进行调整。

(b) Charles Southall

100. 2015 年，独立小组审议的一条信息是，Charles Southall 指挥官在 1961 年驻扎在尼科西亚附近的国家安全局海军通信设施期间于 1961 年 9 月 17 日午夜至 18 日凌晨亲耳听到了与泛航 DC-6 飞机遇袭有关的通话内容。这一信息是根据威廉姆斯进行的研究由哈马舍尔德委员会提供的。

101. 根据 Southall 的说法，他是国家安全局的“处理和报告”军官。在多年来做出的陈述中他一直坚称，当晚，他听到或读到了大意如下的文字：“我看到一架运输机正在下降。所有灯都亮着。我要下去对付它了。没错，就是泛航 DC-6。就是这架飞机。我击中它了。着火了。它在往下掉。就要坠毁。”他说这段通话是中央情报局的一个单位截获的，但传给了他和其他四五名人员所在的国家安全局工作区，当时他听到了录音或看到了录音记录。Southall 还说，他的通讯侦听官或另一个当时在场的军官告诉他，这段通话是一个绰号为“独行侠”的比利时飞行

员说的，他当时驾驶的是一架加丹加部队使用的 Fouga Magister 飞机，而且这名飞行员“一定是在等待哈马舍尔德的飞机”。(大家可能还记得，美国驻利奥波德维尔大使 Edmund A. Gullion 也提到过“独行侠”和 Fouga Magister 飞机，Victor Rosez 也提到过，Victor 的陈述将在下文提及)。

102. 2015 年，独立小组就 Southall 的陈述提出了质询，美国的答复确认他于 1955 年加入海军，1969 年解除现役，1978 年作为指挥官从海军预备队退役。就 Southall 的陈述，美国没再提供进一步信息，包括对提出的 Southall 驻扎在哪里，他是否为国家安全局工作，或者是否创建了他所说的录音记录等问题，美国都没有做出回应。曾在 2016、2017、2018 和 2019 年要求美国确认这些事情，但未收到美国的确认。

103. 2017 年，我获悉，Southall 在独立小组工作完成后去世了。2018 年，Victor Schonfeld 和 Beyond the Frame 公司向我提供了有关他们与 Southall 在他去世前几年在伦敦完成的视频访谈的新信息。我获悉，这些采访以前从未见过或听过，Schonfeld 和 Beyond the Frame 公司当时准备将这些信息提供给本次调查。因此，我审查了有关在采访 Southall 过程中获取的新信息。访谈包含多个文件，其中包含多个采访镜头，其中 Southall 回忆了他与此事飞机失事有关的经历，包括当天夜里的情况以及他随后与政府官员和私营部门的互动。总得来说，Southall 的陈述与独立小组审查的陈述非常相似。如果让一个人反复讲一个故事，而不是读脚本，可能会出现一些细微的变化——例如，短语会有变化或单词的精确顺序会有变化。但这些变化并不涉及实质内容。

104. Southall 在视频采访中大体陈述了以下内容。1961 年，他驻扎在尼科西亚附近的美国海军通信拦截站点。他的部门受命于国家安全局或为其提供支持，负责处理和报告前一天截获的内容(信息拦截员全天候工作，但拦截的信息一般在白天处理)。他们负责接收、解密以及必要时翻译截获的信息，并确定应将这些信息交给哪个政府机构(包括国家安全局)。他说，他们所在的大楼是一座水泥砖房，分为两个主要部分，中央情报局在楼下，海军人员在楼上一间大屋子里，里面都是拦截军事、海军、非法或外交通信的信息拦截员，这些通讯也与位于塞浦路斯法马古斯塔的英国人共享。该站点也是将信息从该地区各地传输到华盛顿特区的主要中继站。

105. 关于通信中继问题，独立小组注意到收到的专家意见指出，在塞浦路斯接收甚高频无线电传输需要一个中间的中继站将此类通信的录音或录音记录从恩多拉附近转发给欧洲的收听站。在此，我注意到，正如下面进一步讨论的那样，当时有一些美国 Dakota 飞机驻扎在恩多拉，它们拥有先进的通信设备，能够远距离拦截、传输和接收通信，包括洲际通信。因此，2017 年的分析表明，这些飞机能够发挥这种中继功能。另一方面，如果通信是高频通信，则可以在塞浦路斯和克里特岛直接截获，不需要中继站。

106. 回到视频采访中 Southall 讲述的故事，有一天晚上，他被告知在午夜左右来到单位，因为一些有趣的事情即将发生。他大约在那个时候去了通讯科，午夜刚过，一段清晰的录音通过非洲的一个卫星站传来，在此期间，一个声音说：“我

看到一架运输机进入了低空。我在下降。没错。就是泛航 DC-6。我要下去对付它了。”在此之后，枪声响起，然后那个声音说，“我击中了它。飞机着火了，飞机坠毁了”。录音结束。他不知道那是谁的飞机。后来房间里就“独行侠”进行了讨论。

107. 据当时在房间里的一位同事告诉 Southall，这段录音是在 SE-BDY 航班被击落的实际时间后约 7 分钟发过来的。大约另外 5 个同事也听到了这个消息，其中一人名叫“Wat Tyler Cluverius IV”（名字的拼写未经确认）。Southall 当时讲一口流利的法语（以及半流利的阿拉伯语），他说他似乎记得飞行员讲的是法语。他和他的同事迅速处理了录音，将其推入另一台机器，并将其发送到华盛顿特区。Southall 说，在事后阅读了其他材料后，他推断这架飞机是一架 Fouga Magister 飞机。后来他听说那是哈马舍尔德的飞机。

108. 大约在 1990 年代初，Southall 收到了一封来自美国国务院内部“Karen Enstrom”（名字拼写未经确认）的信，这封信是通过海军发给他的。他表示，他与此人交谈是为了将上述信息告诉她，但回应是美国政府不想进一步谈论此事。Southall 说，他主动提出加入并暂时全职帮忙查找录音或其他记录。但别人对他的态度用他的话说就是对开展任何搜寻都缺乏热情。尽管他当时已经在情报界工作很长一段时间了，但他将当晚听到录音一事称为是一个单独的独特事件。Southall 还谈到后来 Wat Tyler Cluverius 当上美国外交官后，他曾就此事打电话给 Cluverius，但因当时使用的是一条公开的电话线，Cluverius 表示“我不能谈论此事”。后来，还没等到 Southall 能够有机会亲自和 Cluverius 谈论这件事，Cluverius 就去世了。

109. 瑞典的独立任用人员还提供了资料，表明 Southall 早在 1967 年就将 1961 年在尼科西亚听到的通信内容告诉了在拉巴特的一名瑞典外交官。这名瑞典外交官当时将这一信息转给了瑞典外交部，但瑞典外交部显然错误地将此理解为指的是推断认为地面防空炮台发动了攻击。由于据悉 SE-BDY 航班最后经过的路线上没有部署防空炮台，因此，瑞典当时没有就这一信息进一步采取行动。

110. 根据 1967 年的相关报告，瑞典助理空军武官了解到，Southall 看到或听到了美国人截获的无线电电文，该电文是由一名比利时雇佣兵在恩多拉发送的。那名雇佣兵当时在自己的枪位或高射炮位，看到哈马舍尔德的飞机朝恩多拉机场飞来。确信这不是他们自己的飞机后，他向飞机射击，当飞机坠毁时，他兴高采烈地在麦克风里大声叫喊。显然，外交部副司长 Edelstam 对拉巴特助理空军武官的答复是，从来没有人声称飞机是从地面被击落的，这在技术上很难做到。

111. 随后，在 1980 年代初，Southall 在美国私下会见了斯堪的纳维亚学者 Sten Thore，并告诉他关于击落哈马舍尔德飞机的情形。Thore 1992 年 10 月 21 日致信 Bengt Rösiö 大使，信中称，Southall “明确称，中央情报局内部详细了解所有情况，他提到他本人听到了比利时飞行员与他的联系人之间的对话录音，其中这个比利时人实时描述了击落瞬间的情形”。

112. 2015 年，独立小组评估认为，Southall 提供的 SE-BDY 受到攻击的信息的证明价值为“中”，我在 2017 年认为没有理由更改这一评估结果。我注意到，跟

Abram 一样，在 Southall 死前，美国也有充足的机会反驳或澄清他的说法。但美国没有抓住这个机会。但这并没有消除确立 Southall 说法的可靠性和可信度以及彻底搜查情报、安全和国防档案的持续必要性。2019 年收到的新信息与他以前的陈述以及哈马舍尔德委员会审查的书面历史函件一致，并为他以前的陈述提供了进一步佐证。正如瑞典独立任用人员指出的那样，“Southall 实际上几十年来一直在试图传递这一信息”。

113. 有必要考虑到所有的情况：Southall 在美国海军中的职位无可争议，作为预备役指挥官退休；他的专长是“处理和报告”军官；1961 年在尼科西亚附近的海军通信机构工作；他所述内容不仅对若干人所述内容前后一致，而且在至少从 1967 到 2013 年这么长的一段时期内所述内容都是一样的。我完全有理由认为他所述内容具有很强的证明价值，即美国当时正在监控无线电通信，并且美国很有可能创建了录音记录。关于 Southall 提供的与 SE-BDY 攻击有关的信息，我将继续将这部分信息的证明价值评估为“中”。这些评估，包括其与其他事实和材料的关系，可能会根据新信息和新进展而进行调整。

(c) 罗德西亚官员截获的通信

114. 2018/19 年度，我收到了关于罗德西亚官员截获联合国通信的新信息。正如 2017 年报告所分析的那样，从联合王国和美国收到的文件显示，两个会员国都收到了截获的联刚行动通信，包括与敏感军事事项有关的编码通信。这些信息是在整个 1961 年(1961 年 9 月之前和之后)截获的，并在高级别进行了讨论，英国高级专员 Alport 勋爵、美国驻伊丽莎白维尔领事威廉·坎努普、罗德西亚和尼亚萨兰联邦总理罗伊·韦伦斯基爵士等高级别官员以及各国首都讨论了这些截获的通信内容。

115. 2018/19 年度，津巴布韦独立任用人员指出，从对安全部门档案(特别指出津巴布韦国防军的档案)的审查来看，很明显，“罗德西亚联邦当局当时有无线电信号拦截能力，当时正在监控加丹加地区的通信”。根据津巴布韦提供的进一步确认，我认为加强了 2017 年得出的结论。

(d) 其他拦截情况

116. Tore Meijer 是隶属于埃塞俄比亚帝国空军的瑞典籍飞行教练。根据他在 1994 年所作的陈述，1961 年 9 月 17 日午夜至 18 日凌晨，他在恩多拉时间午夜左右使用短波无线电收听电波。他听到了“恩多拉”这个词，机场控制塔的一个人用英语说，“他正在接近机场。他在掉头。他在拉平。另一架飞机从后面过来了。怎么回事？”，随后传输中断。Meijer 说他试图把听到的情况告知埃塞俄比亚空军负责人、他认识的美国人和刚果的泛航航空公司总工程师 Bo Virving，但未果。

117. 2017 年的报告将 Meijer 可能提供的任何进一步记录标记为可能与今后的任何调查相关。Bo Virving 的儿子 Björn Virving 本人还就这一坠机事件写了一本书，他和瑞典的独立任用人员亲切地促成了与 Meijer 的遗孀的联系。令人感到遗憾的是，Meijer 夫人无法就此事提供更多信息。

2. 恩多拉空中交通管制的作用

118. 早期调查指出，恩多拉机场空中交通管制保存的 SE-BDY 最后通信记录不完整，可能缺少重要通信内容。尽管如此，但早期调查仍然将其作为真实记录。恩多拉的空中交通管制记录至关重要，因为是空中交通管制与 SE-BDY 进行了最后一次正式确认的通信，并负责引导 SE-BDY 在恩多拉机场着陆，参与通知程序以及之后飞机未能着陆后的搜寻和救援工作。

119. 在 2018/19 年度，《哈马舍尔德悬案》电影进一步提出了关于记录是否被故意篡改问题。关于《哈马舍尔德悬案》电影团队提出的恩多拉空中交通管制记录被销毁的意见，有必要核实是否有记录或其他新信息支持这一意见。

120. 为了回忆当时的情况，1961 年 9 月 17 日午夜至 18 日凌晨，索尔兹伯里航班信息中心(空中交通管制员 Leslie Thorogood)在 23 时 31 分将与 SE-BDY 的通信责任移交给恩多拉(空中交通管制员 Arundel Campbell Martin)。正如从证词中确定的那样，恩多拉交通管制员本应将 SE-BDY 的通话记录不间断地制成磁带，但声称由于缺乏设施而没有这样做。(关于这个问题，我注意到津巴布韦的独立任用人员在 2019 年确认，1958 年颁布了磁带录音机到位的政策，但显然没有执行)。Martin 最初向罗德西亚调查局做了一个简短的陈述，他说其中概述了他在恩多拉空中交通管制与 SE-BDY 之间的互动，以及他在意识到 SE-BDY 失踪后所采取的行动。这两方面内容都在一页半纸的陈述内。

121. 当 Martin 作书面和口头陈述时，他自己并没有同期的笔记。1961 年委员会与 Martin 确认，他“告诉联邦委员会，[他]销毁了[他的]笔记”。Martin 没有否认这一点，也没有作进一步的澄清。虽然罗德西亚调查委员会的逐字记录没有明确说明这些笔记已被“销毁”，但当 Martin 被问及是否还能找到这些笔记时，Martin 说“恐怕够呛”，并证实他只是根据飞行进度记录条做了“粗略的笔记”，他后来承认，他并未在笔记中写入关于他与这架飞机对话的所有基本内容。索尔兹伯里空中交通管制的 Thorogood 也向罗德西亚委员会证实，“日志记录不完整，发生的很多事情上面都没有记录”。与 SE-BDY 对话的其他许多内容，例如 Martin 问到飞机到恩多拉之后是否将前往索尔兹伯里的问题就没有出现在他的笔记中，但他根据回忆将此写入了给罗德西亚委员会的陈述。他承认，他写下的一些时间是他根据记忆写出来的近似时间；尽管如此，但这些记录后来还是被引述为权威资料。Martin 与 SE-BDY 交流的最后一句话也是他根据记忆写入陈述的，没有写入任何笔记中，当时距离与 SE-BDY 最后一次联系过去了几乎 36 小时，而且当时他已经知道这架飞机已坠毁。

122. 基于上述情况，尽管 Martin 承认他知道这架飞机及其乘客非常重要，尽管他也知道恩多拉空中交通管制没有录制对话内容磁带，但似乎可以确定他销毁了自己的原始笔记。

123. 在此，再次值得注意的是，2013 年，哈马舍尔德委员会找到了进一步的材料，表明恩多拉空中交通管制的记录存在不足。罗纳德·普兰爵士在 1961 年的回忆录中写道，当天晚上，当时我们住在铜带街，“我们的一位地质学家打电话来

说，空中发生了一些不寻常的活动。他是一个无线电业余爱好者，一直在收听恩多拉机场控制塔与空中和地面各单位之间的对话，他从中推断，一架飞机在附近某处坠毁了”。正如哈马舍尔德委员会在这个副标题方面所指出的那样，如果这是真的，这一说法表明控制塔日志存在严重不足，SE-BDY 的传输内容肯定已经清楚表明它遇到了麻烦，即将坠毁，而且听者可能还听到了 SE-BDY 和其他飞机之间的对话。

124. SE-BDY 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航班。显然，恩多拉空中交通管制关于该架飞机最后时刻的通信记录严重不足。这也使人不禁要问，Martin 是否销毁了他在 SE-BDY 未能着陆大约 36 小时后所做出的简短且不完整陈述所依据的笔记，当时他知道这架飞机已经坠毁了。鉴于包括 Martin 本人在内的多名证人提到，美国飞机可能一直在监控无线电通信，并可能一直在从恩多拉与 SE-BDY 沟通，恩多拉空中交通管制记录不完整的奇怪情况突显了找到在那个坠机夜间发生的任何其他通信痕迹的重要性。

125. 与此相关的另一件事是，葡萄牙独立任用人员向我分享了一封署名为葡萄牙驻利奥波尔德维尔大使馆的 L. Fonseca 1961 年 9 月 22 日给里斯本外交部的电报，电报中说，联合国的感觉是，坠机是恩多拉机场“控制塔”故意造成的，因为其在飞机降落过程中提供了“错误的信息”。早期调查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证明如该电报所说恩多拉空中交通管制向 SE-BDY 发出了任何不正确信息，这一说法的依据也不清楚。尽管如此，但对这一死难事件的同时期报告及其对恩多拉空中交通管制的关注还是让人很受启发。

126. 没有特别必要评估恩多拉空中交通管制同期记录被破坏这一信息的证明价值。但这一信息很重要，作为后续工作，强调必须加强对坠机之前、之中和之后进行的所有通信、无线电或其他通信的搜寻。

3. 新发现的在 1961 年检测过的照片

127. 瑞典独立任用人员告诉我，2019 年，他从北罗德西亚警察局助理警司 Michael Cary 的后代那里收到了与坠机有关的各种文件，包括照片。Cary 是第一批到达坠机地点的人之一，并参与了初步调查。

128. 有些照片似乎没有出现在我所看到的早期调查的记录中。其中有的照片照的似乎是飞机残骸的金属板，有的照片上的金属板有一个或多个圆洞，这些圆洞大小大致相等，略小于 1 厘米；有的金属板上有三个明显相同的洞孔，这些洞孔彼此之间可能有 3 到 5 厘米的距离，排列形不规则(可以看到一只手靠着桌子拿着这块金属板，金属板上似乎贴着一个识别标签，照片的背面是北罗德西亚警察的印章，日期为“1961 年 11 月 28 日”，并有一张铅笔纸条“pw 361/61”)；在一个相框膜几乎中间的位置有一个类似的孔洞(也有一只手拿着这个相框，照片上的印章和日期与前一张相同)；一块长条金属板，一只手指向一个似乎与另外两张照片上的孔洞非常相似的孔洞(这张照片的背面写着“支持 3 号发动机冷却器”，“334/61”，也印有相同的印章，日期为“1961 年 10 月 20 日”)；机翼的一部分，

上有看起来与其他照片类似的孔洞(这张照片的背面写着“右翼”，“pw 334/61”，日期和印章与前一张相同)。

129. 根据瑞典警方和国家法证中心进行的非正式分析，照片中的洞可能是一种小口径武器的弹孔，需要弹道专家进一步调查。

130. 瑞典独立任用人员指出，瑞典专家在 1961 年一再要求对残骸中的金属板进行射击测试，以查明金属板是如何被从不同角度穿透的子弹损坏的。最终获得了许可，并于 1961 年 10 月 25 日在包括 Cary、Evans、Landin 和 Danielsson 在内的一些人在场的情况下，使用口径.303(7.7 毫米)的英国陆军步枪和口径 9 毫米的手枪(Luger)对类似成分的金属板进行了测试。根据 Danielsson 的说法，测试“甚至让 Evans 都感到困惑”，并且“测试结果显示，金属板受损情况相当奇怪，而受损情况取决于你从哪个角度射击。用肉眼辨别受到的损坏情况是由子弹还是由另一物体造成的如果不能说是不可能，但实际上也是很难”。虽然 Cary 打算编写一个测试规程，但他显然没有写。

131. 上述测试是 1961 年 10 月 25 日进行的，但其中两张照片上印有 1961 年 10 月 20 日的字样，两张印着 1961 年 11 月 28 日。瑞典的独立任用人员指出，一张照片上的洞孔有可能在 1961 年的调查中被检查过，并被认为是由弹出的铆钉造成的。然而，这张照片中的洞孔以及其他的洞孔，在早期的调查中似乎没有考虑到，也不能排除是子弹破坏造成的。

132. 确定 Cary 家人所提供照片的最终意义是一个值得进一步进行弹道检查的问题，我已将照片存放在联合国，以便妥善保管。

4. 雇佣兵飞行员或其他特工介入的可能性

133. 2018/19 年度收到的新信息扩展了 2017 年报告中分析的有关可能有人参与了袭击 SE-BDY 这一主题的内容，具体如下。

(a) Van Risseghem

134. 2015 年独立小组收到信息称，一个名为 Van Risseghem(也称为“Van Reisseghem”、“Van Rysseghem”、“Van Reisenghan”、“Van Riesegehel”和其他写法)的比利时飞行员可能驾驶一架飞机击落了 SE-BDY。特别是，Gullion 在 1961 年 9 月 18 日从利奥波德维尔发往华盛顿特区的一封信中说，“[SE-BDY]有可能是被一名飞行员击落的，这名飞行员干扰过联合国的行动；据一个通常很可靠的消息来源指认，这个飞行员名叫 Vam (rpt VAK) Riesegehel，比利时人，在所谓的加丹加空军接受过飞行训练。以前他被当成了身份不明的罗德西亚人。只要他仍在活动，就有可能破坏空中救援行动。”1961/62 年度调查从未披露也未分析过这些资料。

135. 独立小组主要依据比利时提供的其他资料得出的结论是，比利时当局已确定 Van Risseghem 不可能在 1961 年 9 月 17 日之前到达加丹加，因为他在 1961 年 9 月 16 日之前还没有离开布鲁塞尔。Van Risseghem “本应 9 月 17 日签收加丹加驻布鲁塞尔‘使团’的履职工资”；但比利时政府指出，他签字的文件是让别人代

他从“萨比那共济基金”领钱的委托书，当时他可能仍在布鲁塞尔，也可能已经到了巴黎转道去刚果。

136. 2017年，从联合国和美国的记录中查到了关于 Van Risseghem 的更多信息，令人怀疑 1961 年 9 月 17 日之前他是否已经在加丹加。这包括 1961 年 9 月 15 日的一封信件，其中 Gullion 注意到一份报告，其中提到“单引擎喷气式战斗机攻击卡米纳。塔台与战斗机有语音联系。飞行员似乎是比利时人。在用火箭弹和机关枪袭击后，飞行员说他将返回并再次发动攻击”。1961 年 9 月 16 日，Gullion 在一封电报中说，“商用飞机飞行员昨天下午报告其与加丹加喷气机短暂并翼飞行，他认出这名飞行员是我们所知道的身材高大、胡须浓密的 Van Risseghem，加丹加空军教练员。大概在 5 月 1 日从布鲁塞尔抵达加丹加。据称是比航飞行员。据信他是唯一一名能驾驶现有两架飞机的飞行员”。哈马舍尔德同一天也请比利时协助制止 Van Risseghem 侵犯联合国的犯罪行为以及对平民的袭击。因此，2017 年报告的结论是，鉴于当时能查到的资料相互矛盾，因此，不可能完全确定 Van Risseghem 1961 年 9 月 17 日是否在加丹加。

137. 2018/19 年度从各种来源获得了关于 Van Risseghem 的进一步资料。根据比利时独立任用人员提供的资料，Jan Van Risseghem de Sautiernon de Saint Clement 是比利时公民，在德国出生，父亲是比利时人，母亲是英国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活跃在联合王国皇家空军的比利时分部，并娶了一名英国女子 Marion Fowkes 为妻。在为比航公司飞行后，1961 年 3 月或 4 月，他被加丹加空军(加丹加航空，也称为加丹加空军部队)招募。在 1961 年 8 月被联合国部队逮捕后，Van Risseghem 被遣返回比利时，于 1961 年 9 月 8 日抵达 Zaventem，直至 1961 年 9 月 16 日他一直待在此地。没有他离开 Zaventem 的痕迹；他很可能经由巴黎返回加丹加，比利时独立任用人员重申了 2017 年根据相同的档案材料表达的意见，即 Van Risseghem 不会在 1961 年 9 月 17 日之前已返回加丹加。

138. 比利时的独立任用人员还审查了从家庭档案中获得的 Van Risseghem 签字的飞行日志原件。(《哈马舍尔德悬案》电影团队还向我提供了一份更进一步的、明显匹配的这一飞行日志摘录复印件)。这本飞行日志记录了 Van Risseghem 1961 年为加丹加空军飞行至 1961 年 8 月 27 日的情况，这与 Rumpunch 行动开始日期相符，他在该行动期间被联合国行动逮捕并遣返。之后，飞行日志记录显示，1961 年 9 月 20 日他再次为加丹加空军执行飞行任务。7 月和 8 月期间，Van Risseghem 飞行时使用的飞机类型如下：DOVE、Piper、DC-3 和 Fouga Magister。Fouga 的所有航班飞行的都是注册号为“KAT93”的飞机，7 月和 8 月各有 4 个这样的航班。提到的副驾驶是 Delcourt、Wicksteed、Pieret、De L(o)uigi 和 Bracco。(飞行日志还提到了多次驾驶 Fouga Magister、DC-3 和 Dove 进行夜间飞行，下面将进一步讨论)。

139. 根据 Van Risseghem 的日志，1961 年 9 月份为加丹加空军飞行的航班均记录为驾驶“Dornier-28”飞机(可能是 Dornier DO-28，下文讨论)，副驾驶为“John Cassart 上校”。(Cassart 被认为是 Jean Cassart(生于 02/07/1906))，二战期间是一名志愿者，直到 1950 年代中期都是比利时军队的军官。报告指出，此后，Cassart 当

上了刚果 Mitraco 公司的董事总经理，Mitraco 公司在 1961 年加丹加政府购买 Dornier 飞机的过程中充当了中间人。我注意到，尚不清楚 Van Risseghem 1961 年 9 月之前是否知道如何驾驶 Dornier DO-28 飞机。

140. 2018/19 年度还从各种私人来源收到了关于 Van Risseghem 的新资料。根据《哈马舍尔德悬案》电影上对 Pierre Coppens 的采访，据他说 Van Risseghem 在 1965 年承认对哈马舍尔德的飞机进行了攻击。Coppens 曾是一名伞兵，也是 Van Risseghem 的朋友，他说他 1960 年代初就认识 Van Risseghem，当时 Van Risseghem 是比利时一个伞兵训练中心的飞行员。他说，Van Risseghem 1965 年告诉他，他驾驶 Fouga 飞机击落了哈马舍尔德的 DC-6，尽管做到这一点很困难，但 Van Risseghem 并不知道机上乘客是谁。据称，Van Risseghem 说过，袭击是从基普西机场发动的，他飞行时还带上了额外的油箱。《哈马舍尔德悬案》电影团队表示，Coppens 在 1980 年代首次向另一名刚果前雇佣兵 Edouarde Dinant 提到了 Van Risseghem 对他说的话。

141. 根据记者 Bruno Struys 于 2019 年 3 月在 *De Morgen* 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他在 2019 年对 Van Risseghem 的遗孀 Marion Fowkes 进行了采访。Fowkes 说，Van Risseghem 是被他的朋友 Jean Cassart 招募到加丹加的，Jean Cassart 是 Mitraco 公司的比利时老板，该公司向加丹加提供军事装备。Struys 称，Fowkes 向他出示了 Van Risseghem 母亲的日记，其中提到 Van Risseghem 称他成了加丹加空军的“老板”。日记中的内容说，Van Risseghem 于 1961 年 9 月 8 日抵达比利时，这与比利时提供的信息相符，他的“秘密组织”要求他立即离开，此后他的母亲收到了他的一封信，这封信寄自巴黎，信是 1961 年 9 月 19 日收到的。信中没有说他什么时候到的加丹加，也没有说那封信是什么时候寄出的。Fowkes 有 Van Risseghem 的飞行日志。

142. Victor Rosez 是 1961 年 9 月事件的目击证人，他向我提供了一份书面陈述，据他说，他本人曾在 1961 年 8 月或 9 月在加丹加见过 Van Risseghem，但未说明确切日期。他说，他亲眼看到 Van Risseghem 驾驶一架 Dove 飞机从伊丽莎白维尔的 Luano 机场起飞，并听说他曾在不同的场合与 Jerry Puren(作为投弹手)和 Bob Denard 一起驾驶这架飞机。Rosez 表示，后来的几年(1961 年后)，他还见过几次 Van Risseghem，其中包括在比利时安特卫普 Deurne 机场以及 1982/83 年度在布鲁塞尔的殖民地餐馆 Karibu。Karibu 餐馆的主人是 Jean-Claude Wavreille，他娶了冲伯的一个女儿，他也是 Rosez 的老同学。Rosez 在 Karibu 餐馆听到 Van Risseghem 向以前住在加丹加的一些比利时人讲了一个故事，他说他是在加丹加打击巴鲁巴人的加丹加空军行动的指挥官。另一次，Van Risseghem 谈到了他早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加入英国皇家空军的事情。1980 年代，Van Risseghem 仍在参与买卖飞机，并与 Rosez 谈到 Rosez 的朋友 Jacques Dheere 拥有一架罕见的单引擎 Fokker 飞机。Van Risseghem 向 Rosez 表示，他不想公开谈论加丹加的战斗行动，因为他不想像 Jean Schramme 那样惹祸上身，Jean Schramme 曾被问及其在刚果当雇佣兵时发生的那些事情。Rosez 表示，他从未听 Van Risseghem 专门谈到过达格·哈马舍尔德。

143. 我分析了 2018/19 年度收到的与 Van Risseghem 有关的新资料。首先, 关于他的家人保存的飞行日志, 我还没有机会完整地查看原件, 也没有机会让专家对日志进行分析, 这严重限制了在现阶段得出任何最终调查结果。然而, 从序言就可以立即看出, 我审查的 1961 年 9 月的日志摘录显然与 1961 年 6 月、7 月和 8 月等其他月份的日志摘录有明显的不同。例如, 即使在一天中进行了多次飞行的情况下, 其他月份也会完整地写出飞机类型、注册号、飞行员和副驾驶的信息。只有九月份用“”标记表示信息与上一行相同。此外, 与其他月份相比, 9 月份的字迹在总体特征、字体的具体细节(包括形式和比例)以及大写和草写体之间的变化方面似乎都存在差异。细节的记录也前后不一; 例如, 9 月是唯一一个似乎只(但总是)记录起飞点和着陆点(本身包含某些不一致的细节)的月份。看起来也使用了不同的印章和签名。这些和其他差异表明, 9 月份日志的创建方式可能与其他月份不同, 或者可能是由另一个人创建的。我再次指出, 上述情况还需对完整原件进行核查, 只有对飞行日志上声称是 Van Risseghem 的手写字迹、签名和印章以及专家分析和意见进行进一步的独立确证, 才能得出任何最终的调查结果或结论。

144. 2019 年, 《他们杀死了 H 先生》的作者 Maurin Picard 也向我提供了他在 2018 年采访 Bracco 时拿到的前加丹加空军飞行员 Roger Bracco 的飞行日志摘录。这份飞行日志摘录似乎是 1961 年 9 月 30 日记录的, 其中包含 1961 年 9 月 24 日的一条信息, 写着 Bracco 该日担任加丹加空军的副驾驶, 驾驶“Dornier 28”飞机, 登记号为 KA19, 飞行员是 Van Risseghem。上文提到的 Van Risseghem 的日志上该日期也有一条, 写的是驾驶“DO-28”的一次飞行, 但日志上写的副驾驶是“De Louygy”, 所驾驶飞机的登记号为 KA016 或 KA 3016。(如上所述, 在 Van Risseghem 的飞行日志中, Bracco 被列为 8 月份驾驶 Fouga 飞机的副驾驶, 而不是 9 月份的 Dornier)。鉴于 Van Risseghem 日志摘录内部以及他的日志和 Bracco 日志内容上存在不一致, 从逻辑上推理, 这两本日志不可能都是真实且完整的记录。还应指出, 也不排除两本日志都是假的可能性。

145. Picard 和《哈马舍尔德悬案》电影团队都采访了 Bracco。根据这两次采访, Bracco 似乎不相信 Van Risseghem 的飞行日志摘录是真实的。其中, Bracco 特别表示, 虽然当时为加丹加空军效力的所有飞行员他都知道, 但 Van Risseghem 日志中列出的某些副驾驶他却从未听说过。当然, 这些意见本身远远没有达到可靠证据的标准。但是根据以上分析, 这些意见似乎支持的一个命题是, 应进一步质疑 Van Risseghem 飞行日志的可信度。

146. Van Risseghem 自己的飞行日志摘录显示, 1961 年 9 月 20 日, 他在未知地点驾驶 DO-28 飞行, 然后在两天的旅程中从布拉柴维尔返回加丹加, 于 1961 年 9 月 21 日离开布拉柴维尔。这种情况意味着, 一定有其他人在 1961 年 9 月 18 日或 19 日左右从加丹加飞往了刚果共和国。正如下面所进一步讨论的, SE-BDY 坠毁后布拉柴维尔一些人的明显汇合是一个有待进一步调查的问题。目前, Heinrich Schäfer 和 Jean Cassart 此时的去向是一个有待回答的问题, 与 Van Risseghem 进出布拉柴维尔有关的任何记录同样是一个有待回答的问题。

147. 我就这一点在 2018/19 年度写信给刚果共和国，试图确定是否有其机场的相关出入境记录，但没有收到回复。我的关于这一主题的信件往来作为本报告附件列出，这是必须标记为需采取后续行动的一个事项。

148. 2018/19 年度收到的有关 Van Risseghem 的新信息很重要。一方面，比利时独立任用人员的进一步分析再次证实，比利时现有的资料，主要是国家安全局的档案资料表明，1961 年 9 月 17 日之前 Van Risseghem 不可能在加丹加或恩多拉。这与 1990 年代 Van Risseghem 向 Bengt Rösiö 否认自己参与此事的说法相一致。但比利时的独立任用人员也指出，他们感到惊讶的是，军事情报局和国防部的档案中关于 1960 年代中部非洲雇佣兵活动的信息少得令人惊讶，尽管这些雇佣兵往往是前比利时士兵。

149. 另一方面，还有 Rosez、Bracco 和 Coppens 提供的新资料及飞行日志。这些资料部分内容相辅相成，部分内容相互矛盾。来自这些来源的信息，加上之前审查过的美国和联合国的记录，使有关 Van Risseghem 的一些早期调查不知道的事情得以确定，包括他于 1961 年在加丹加空军担任高级职位，他在 1961 年作为飞行员为其驾驶了多架飞机。他似乎还与向加丹加提供武器的 Jean Cassart 有联系。

150. 但 Van Risseghem 在 1961 年 9 月中两周关键时期的确切下落这一最重要的问题，尽管有试图解决这一问题的充分理由，但根据目前的资料还不能做出最终定论。其中包括，有人怀疑飞行日志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根据 Rosez 的说法，Van Risseghem 否认参与了此事，并表示他不想面临 Jean Schramme 因在刚果当雇佣兵所面临的问题。如果 1960 年代到 2000 年代期间 Van Risseghem 想要与提出的这个问题(包括 Rösiö 对他的采访，下文将讨论)彻底摆脱干系，那么通过文件证明他在相关时间在欧洲或在过境途中很可能是在他能力范围内能够做到的事情。但据我所知，他没有这样做，尽管他可能试图证明过。还有一个问题是，Coppens 在 Van Risseghem 死后做出迟来的陈述，说 Risseghem 承认攻击了 SE-BDY。

151. 综合考虑，关于 Van Risseghem 的信息片段为搜寻更多信息提供了更多动力。注意到他的血统、家族关系和在英国武装部队的服役记录，以及显示美国认为他可能袭击了 SE-BDY 的信息，我要求这些会员国提供关于 Van Risseghem 的信息，但没有得到实质性答复。应将此做个标记，以便进一步跟进。

152. 来自各种来源的新信息无法确定 Van Risseghem 1961 年 9 月 17 日午夜至 18 日凌晨是否可能在加丹加或附近。因此，我现在不能就这一问题得出结论。我认为，关于一个名为 Van Risseghem 的比利时雇佣兵飞行员参与了空中袭击 SE-BDY 的资料的证明价值，没有任何依据可改变评估结果。我目前的评估仍然是，这一资料的证明价值为“弱”。

(b) Beukels

153. 2017 年收到了关于一个名为“Beukels”的比利时雇佣兵飞行员涉嫌进行空袭的新资料。这些未经证实的陈述最初由前联合国人员德凯穆拉里亚和 George Ivan Smith、Manuel Fröhlich 和威廉姆斯等人审查。据称，Beukels 驾驶一架 Fouga Magister 喷气式飞机从科卢韦齐机场(位于恩多拉西北约 430 公里)起飞，由姓名

不详的飞行员驾驶第二架 Fouga Magister 飞机伴行。据称他们两人是奉 X 先生(据信是一个凌驾于军事指挥之上的高级别人士)和加丹加部队总司令 Lamouline 中校之命,在恩多拉附近拦截 SE-BDY,使其改道前往卡米纳机场(位于恩多拉西北约 620 公里),让哈马舍尔德在那里会晤一名“很有影响力的欧洲公司高管”。Beukels 说他拦截了 SE-BDY,并用无线电告诉其转往卡米纳。当 SE-BDY 没有遵照指令改变航向时,Beukels 就用 Fouga 飞机的机关枪从 SE-BDY 后部开火,结果意外击中了这架 DC-6 的水平尾翼。随后,飞行员失去控制,飞机坠毁,燃起了大火(哈马舍尔德委员会和独立小组的报告更全面描述了 Beukels 的说法)。

154. Beukels 假设是 1967 年自称是前雇佣兵的人向德凯穆拉里亚讲述了这个故事时曝光的。2017 年,德凯穆拉里亚的女儿将他在 1951 至 1992 年间以及 2006 至 2012 年间的议程原件以及大约 20 箱他的个人记录交给了我。从这些资料中可以确定,德凯穆拉里亚实际上在 1960 年代和 1970 年代就将 Beukels 所述内容告诉了当局,比哈马舍尔德委员会所知道的 1993 年要早。但 2017 年报告得出的结论是,确定何时向当局报告此事的新资料本身并不会使所述事件属实的可能性增加或减少。总体而言,与 Beukels 假设相关的新资料的证明价值被定为“弱”。

155. 2018 年,德凯穆拉里亚的女儿向我提供了更多新资料,其中包括两页的手写笔记,看起来是同时间写的。这两页笔记似乎涉及 1993 年 6 月 16 日德凯穆拉里亚在其家中与法国前雇佣兵 Robert (Bob) Denard (Gilbert Bourgeaud 的化名)会面,在相关时间他也在加丹加。笔记是用法语简称写的,用简称写成的笔记某些方面的意义并不完全清楚。此外,很多小错误很明显,例如将下文将进一步讨论的中央情报局刚果站站长“Devlin”拼成“Develine”,以及提到“1962 年”9 月,可能指的是“1961 年”9 月,提到的“DC-7”可能指的是“DC-6”。笔记还写下了雇佣兵 Bracco 和 Lamouline 的详细联系方式。至于笔记涉及到的其他飞行员、设备和机场,将在下面进一步讨论。

156. 德凯穆拉里亚 1993 年的两页手写笔记中指出,从 Denard 那获得了以下资料:

- 1962 年中央情报局的老板“Develin”在利奥波德维尔说过同样的话,即 Bracco 是 Fouga Magister 飞机的飞行员。另一名飞行员 Magain 什么也没说。Delin 是加丹加空军的负责人,但不是飞行员。
- 3 个比利时人: Bracco、Magain、Delin。
- Bracco(比利时人)于 1961 年被招募,是驾驶所提供的 6 架 Fouga 飞机中 3 架飞机的专家。但一架 Fouga 飞机撞上输电线坠毁,飞行员 Daggonier 遇难。
- 当时 Bracco 在科卢韦齐。
- 1962 年 9 月,只有 1 架 Fouga 飞机可正常飞行。但夜间无法飞行。
- Bracco 认为瑞典飞行员混淆了恩多罗和恩多拉。
- Devlin 曾表示,修理过的 DC-7 从利奥波德维尔起飞时发动机出现了故障。

- Michel Declarey(现年 80 岁)是雅多维尔加丹加宪兵队队长，曾俘虏多名爱尔兰人。
- 加丹加部队的指挥官是 Muke 将军。
- 在购买的 8 架飞机中，3 架飞机已经运抵。只有 3 架 Fouga 飞机。
- Bracco: 没有夜间导航支持。只有 1 架能正常飞行的 Fouga 飞机。
- 对非洲不了解。恩多罗/恩多拉实际上在金沙萨附近。图表/书。
- 一直没有备用油箱。
- 没有目视系统。
- 卡米纳被联合国把持。

157. 这些笔记是德凯穆拉里亚长期为试图查明 SE-BDY 航班真相所做努力的一部分。特别是考虑到之前对德凯穆拉里亚所提供的其他材料的分析，似乎没有理由怀疑该笔记所记录的会面是否发生过，或者其中包含的资料是否已传达给德凯穆拉里亚。但需要指出的是，1993 年与 Denard 会面的笔记并没有提到 Beukels 的名字。

158. 2018 年，我要求比利时的独立任用人员在他们的工作中列入与 Beukels 假设相关的搜寻。他们的最后报告指出，比利时的军事档案中没有提到一位名叫 Beukels 的飞行员；其他档案的资料中也没有提到叫这个名字的任何人参与了加丹加空军。

159. 《哈马舍尔德悬案》电影中还采访了两个人，他们一个自称是 Roger “Beuckels” 的侄子，一个自称是 Roger “Beuckels” 的朋友。Roger “Beuckels” 曾是加丹加的一名雇佣兵。这两位受访者都表示，Beuckels 不是一名飞行员(关于拼写上的差异，我注意到“Beukels”这一拼写最初似乎来自德凯穆拉里亚，他很可能是对话中听到了这个名字然后就直接根据读音进行的拼写)。

160. 根据先前对 Beukels 假设的分析以及收到的新资料，似乎原来向德凯穆拉里亚陈述的故事不可能是真实的。如果情况是在相关时间只有一架 Fouga 飞机可正常飞行(下文将进一步讨论)，那么这将与 Beukels 假设中声称的事实不一致，Beukels 假设声称有两架 Fouga 飞机参与了攻击行动。此外，联刚行动的记录指出，正如 Denard 在与德凯穆拉里亚会面时所指出的那样，联合国部队于 1961 年 9 月 17 日把持了卡米纳。这意味着，Beukels 想要秘书长的飞机改道卡米纳的动机就不是那么一目了然了。

161. 鉴于假设是一个名叫 Beukels(或 Beuckels)的个人对秘书长的飞机发动了攻击，我估计新资料对这一假设予以反驳。如果能找到德凯穆拉里亚的原始笔记和与 Beukels 谈话的任何原始磁带录音，那么仍需对这些进行分析。但是，自 2015 年以来已知资料的权重表明，Beukels 假设的某些方面似乎无法得到佐证。但这一说法的某些内容可能仍然属实，另一部分内容是假的；例如，“Beukels” 将别

人的行为归于自己是为了以后获得经济好处或其他好处。鉴于这一假设在这个阶段不能被完全否定，所以不应将其完全排除。但对所谓显示以 Beukels 所说方式袭击 SE-BDY 的资料，我保留价值为“弱”的评估结果。

(c) 总体背景

162. 如上所述，早期的调查几乎没有提到坠机发生的背景。近年来对相关资料的搜寻范围扩大，涵盖了与 SE-BDY 航班飞行时的总体背景相关的资料，包括当时动荡的军事和地缘政治现实。2018/19 年度，独立任用人员和许多个人就相关事件背景提供了进一步的新资料。

163. 法国独立任用人员表示，法国的档案，包括情报、安全、国防和航空档案，未披露围绕达格·哈马舍尔德之死的周围环境，这一事件本身提及的也极少。他说，他广泛调查了法国的档案，但没有发现任何可能揭示与哈马舍尔德死亡相关情况的线索，当然也没有在法国档案中找到暗示有具体暗杀企图的痕迹。他尤其侧重于调查加丹加的“法国雇佣兵”问题，但在搜寻过程中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表明他们的存在与秘书长之死之间有任何关联。

164. 但他在搜寻法国档案过程中确实发现了更多细节，说明加丹加危机发生时的总体背景以及法国与秘书长之间的关系。虽然这一历史背景与 SE-BDY 坠机没有直接联系，但法国的独立任用人员指出，他真诚地提供这些资料，因为这些资料有助于阐明当时法国政策的某些方面。他认为法国对加丹加的政策存在二元性。一方面，外交部声明的政策认为，加丹加应该在不使用武力的情况下重新融入刚果。另一方面，外部情报和国防部门的目标之一是保护和维护前法国殖民帝国不受外国干涉，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将法国殖民帝国扩大到其他讲法语的非洲国家。独立任用人员称，这导致了“法国的两项非洲政策”之间关系紧张，这两项政策分别得到外交部长莫里斯·顾夫·德姆维尔和总理米歇尔·德勃雷的支持，而法国负责非洲和马达加斯加事务的秘书长雅克·福卡尔则使之复杂化。

165. 外交部长顾夫·德姆维尔认为加丹加事件属于他的职权范围，并捍卫了国际合法性。但德勃雷认为非洲事务是一个主要的行动领域，他本人还对特勤局有着浓厚的兴趣，特勤局由格罗辛将军领导，由德勃雷总理管理。德勃雷谴责外交部“软弱”，并希望防止非洲大陆遭到共产主义威胁，支持加丹加分裂，如下文进一步讨论的那样，他认为这种意识形态立场使法国有理由派遣武器和“雇佣兵”。独立任用人员将法国国内这种剑拔弩张的紧张局势描述为“外交部、总理(当时特勤局归其管理)和武装部队之间；外交部与驻莱波尔德维尔大使馆之间；大使馆与伊丽莎白维尔领事馆之间；法国当局和联合国代表之间的一场多方参与的捉迷藏游戏”。

166. 关于特勤局的存在，独立任用人员指出，1961 年春夏，斯坦利维尔和伊丽莎白维尔有领事官员，但莱波尔德维尔未设特勤局站点。一个 Bistos 先生确实以特勤局代表身份访问了加丹加，法国国内对这次访问相当了解：“因此，独立任用人员指出，尽管遭到外交部的明确反对，但似乎在米歇尔·德勃雷总理的直接领导下，特勤局还是直接参与了干预加丹加的行动”。

167. 法国独立任用人员指出，法国对加丹加分裂的反应受到以下因素的影响：**(a)** 法国国内局势和殖民局势；**(b)** 法国对它认为的联合国在非洲的干涉主义的担忧。关于**(a)**，法国的国内背景和殖民背景，独立任用人员指出，必须牢记，法国当时处于内战状态。由于戴高乐总统的阿尔及利亚政策，1960年和1961年，许多法国军官辞职或被逐出军队。1961年夏天之后，局势变得更加复杂。据独立任用人员称，法国的立场是，联合国无权干涉国内事务，其中包括无权干涉阿尔及利亚寻求脱离法国殖民统治独立的讨论。

168. 关于**(b)**，法国对其所认为的联合国干预非洲的关切，独立任用人员指出，包括戴高乐总统在内的法国当局均担心联合国对非洲的干预是对法国势力范围的入侵，而哈马舍尔德想要“亲自取代欧洲大国在非洲发挥的作用”。当时联合国与法国之间的关系紧张，戴高乐最初于1960年4月拒绝在联合国总部会见秘书长，1961年6月至7月的Bizerte危机再次考验了联合国与法国之间的关系。法国“采取了一种敬而远之的立场”，并拒绝为联合国干预所产生的支出提供资金。

169. 在有关背景的其他资料中，Picard提供了关于他采访Paul Ropagnol的信息，Paul Ropagnol显然是当时在加丹加的22名法国雇佣兵中依然在世的唯一一名雇佣兵。根据Bob Denard的回忆录，Ropagnol是在“Morthor行动”中领导加丹加部队包围联合国维和人员一个爱尔兰排的雇佣军士兵；联合国文件也确认，Ropagnol当时在加丹加。Ropagnol表示，招募他时在巴黎与戴高乐总统的顾问Pierre Lefranc进行了讨论。在此之后，他和他的朋友Robin Wrenacre被派往加丹加负责训练加丹加的武装部队，他们以真实身份领取报酬。Wrenacre也是外国军团的一名军官，有在阿尔及利亚的经验，英国血统，在Ropagnol所说的加丹加可疑情况下被杀。

170. Ropagnol还对Picard说，他1961年在伊丽莎白维尔为加丹加国防部招募雇佣兵，包括1961年12月从图卢兹招募雇佣军，为此他最终被法国当局逮捕。

171. 关于背景的新资料仍然是建议进一步调查领域和了解现有资料的相关工具。在此方面，并且由于背景的次要目的，没有特别必要评估其在坠毁原因方面的证明价值。

(d) 其他有关个人

172. 正如2017年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根据Delin的证据，早期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加丹加空军中只有一名加丹加飞行员能够驾驶飞机攻击SE-BDY。但2017年审查的资料(和之前的资料)确定，在考虑各种假设时，更多飞行员以及其他雇佣兵和其他人员有参与袭击的可能性。新审议的资料包括联合国文件，其中列出了1961年1月至少有32名加丹加空军人员(14名飞行员加上无线电操作员和技术员)的名单以及一份空中情报日志，其中显示，1962年4月，科卢韦齐(加丹加控制下的主要机场)有11名雇佣兵飞行员。联合国文件确定1961年末至1962年初在加丹加有能力担任飞行员的雇佣兵包括Delin、Gelen、Glaspole、Hirsch、Magain、Puren、Van Risseghem、Verloo和Wicksteed(正如所注意到的那样，这些人的名字有多种拼法)。

173. 关于在加丹加效力的外国军队、准军事部队或非正规(包括雇佣兵)人员问题, 2017 年比利时也提供了有关 Charles “Carlos” Huyghe 和 Jerry Puren 的资料。关于 Huyghe, 资料显示, 他在 1961 年 8 月 3 日被联合国从加丹加遣返回国。关于 Puren(给出的其他拼写有 “Purren” 和 “Pureh”, 别名 “Du Plessis”), 经部分删改的资料显示, 比利时报告时他仍在加丹加, 但该资料未注明日期。

174. 2018/19 年度收到了更多新的相关资料。加拿大独立任用人员提供了加拿大常驻纽约联合国代表团 1961 年 10 月 16 日给总部的一份报告的笔记, 其中指出, 1961 年 9 月 23 日在恩多拉看到一架加丹加空军 Dove 飞机, 根据观察和无意中听到的谈话, 据了解, 这架飞机正从南非飞往科卢韦齐(加丹加), 飞机上载有 3 名先前被驱逐出加丹加的雇佣兵。罗德西亚当局在被问询时提供的关于这些乘客的信息明显是假的。该函件还讨论了联合国关于当时在恩多拉的雇佣兵 Huyghe 的报告, 以及第二架运载雇佣兵 Browne 上尉(显然被误拼写为 “Brown”)的加丹加空军 Dove 飞机试图进入加丹加, 但将被英国当局拘留等情况。

175. 德国的独立任用人员指出, 在 1961 年 8 月底将 Dornier DO-28 型飞机交付给加丹加后, 交付该飞机的飞行员 Heinrich Schäfer 的确切行踪便不得而知了。1961 年 10 月 2 日的一张便条记录了 Dornier 飞机驻波恩代表与联邦经济部的一名官员的电话交谈情况, 其中指出, Schäfer “早就” 回到了德国。这张便条没有具体说明他返回德国的确切日期; 鉴于 Schäfer 是在那封便条之前大约一个月才到达的加丹加, “早就” 可能最多也就是几周前。

176. 同样是有关飞行员 Schäfer 这一主题, Gülstorff 注意到关于交付第一架 DO-28 飞机的更多细节。他审查记录时发现, Dornier 的档案中没有提到飞行员的名字是 Schäfer。大约在 1961 年 10 月, Dornier 代表 Otto Wien 提到了 “一名德国飞行员, 他不是 Dornier 的雇员”, Dornier 的出口总监一个 Leander 先生和 Dornier 雇员一个 Sohn 先生提到了一个他们不认识的德国飞行员。目前尚不清楚 Dornier 为什么不能或不愿透露 Heinrich Schäfer 的名字, Schäfer 自 1950 年代中期以来一直担任他们的首席试飞员。

177. 法国独立任用人员指出, 法国派驻加丹加的雇佣兵人数很少但却是此地外国雇佣兵部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指出, 法国雇佣兵在法国的声誉很高, 因此成了外国雇佣兵中的高级专业人员, 他们当时正在训练和监督加丹加宪兵, 费用由上加丹加矿业联盟(矿业联盟)支付。法国官方政策中明显的二元性(下文进一步描述)导致独立任用人员质疑, 法国雇佣兵在加丹加的存在是否与法国政府机构有关(因此是否可以将他们视为是输出法国官方政策的武装部门), 或者这种存在是否只是为法国政府提供便利, 因为这意味着这些雇佣兵不会在法国或法国殖民帝国其他地区制造麻烦。

178. 独立任用人员证实, 法国雇佣兵中包括 Trinquier 上校(一名曾参与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战争的伞兵, 冲伯赋予他的任务是组织加丹加军队并招募约 20 名军官)、Faulques 指挥官、Egé上尉和 de La Bourdonnaye 上尉。其他人是由加丹加驻巴黎代表 Dominique Diur 从巴黎 30 大道 Georges Mandel 处招募的。当外交

部打算因这次招募活动驱逐 Diur 时，德勃雷总理采取了中立化的态度，使这些行动与外交部在加丹加的不干预政策保持一致。

179. 法国独立任用人员指出，1961 年 2 月，法国武装部队部长皮埃尔·梅斯麦尔办公室准许 Faulques、Trinquier 等人从法国军队“退役”，并与加丹加签署了合同。1961 年 3 月，法国驻莱波尔德维尔大使馆一等秘书 Robert Massé 指出，伊丽莎白维尔有 6 名法国军官，并表示 Faulques 说，他“来加丹加得到了法国政府的同意，还带着武装部队部长签署的任务令”（独立任用人员指出，Faulques 明确否认自己在 SE-BDY 坠机中扮演了任何角色）。政府回应说，这些人员的一举一动都未经过政府授权或同意，他们也不是现役军人。

180. 法国的独立任用人员说，1961 年 6 月被任命为法国驻伊丽莎白维尔领事的 Joseph Lambroschini 可能是特勤局一名“受人尊敬的记者”。他指出，法国有一个优势，那就是“新政变者”远在非洲，尤其是在梅斯麦尔在 1960 年 9 月得知 Trinquier 上校正在进行多次接触以反对戴高乐的阿尔及利亚政策之后。1961 年 4 月法国发生政变，这些雇佣兵不在场，这为法国政府受益于法国雇佣兵在加丹加的推断提供了佐证。最后，法国独立任用人员指出，当联刚行动部队于 1961 年 9 月 13 日占领邮局和电台时，冲伯在英国领事馆而不是法国领事馆避难。

181. 瑞典独立任用人员提请我注意，Rösiö 在 1994 年的报告《又见恩多拉》中提到了他对 Van Risseghem 的采访。他指出，Van Risseghem 向他提供了“其他飞行员的详细情况，[他]看不出 Van Risseghem 为什么要伪造飞行日志或隐藏任何东西的逻辑理由。他认识他们所有人，Fouquet、Pence、de Radiques、de Stoute、Dubois、Melot、Hedges、Puren、Delcors、Mans、Heuckets、Hislier、Boutet、Bertaux、Volont、Pier、Hirsch 和 Osy。”其中一些名字联合国文件中也提到过，有一些名字没提过。

182. 联合国记录还显示，根据 1962 年 3 月 3 日给联合国代表 Jose Rolz-Bennett 的说明，Charles (Chuck) Cox 曾于 1962 年 2 月在索尔兹伯里购买一架 DC-4 飞机，海关已建议联系“Jan van Reisenhan 机长”，他是比利时前比航飞行员，是加丹加空军的负责人。他介绍了将加丹加空军飞机部署在乍得的计划，联合国部队在乍得没有飞行授权。很明显，“van Reisenhan”是 Van Risseghem 的误拼，他告诉 Cox 当时科卢韦齐有几个加丹加空军飞行员，包括“Peter Wickstend”、“Josh Purin”、“Hedges”、“Glasspole”和一个匈牙利人“Sputnik”。这些被理解为属可能的参考资料，确认告诉联合国代表，Peter Wicksteed、Jerry Purin、Jimmy Hedges、Max Glaspole 和 Sandor Gürkitz 1962 年初分别为加丹加空军效力，他们的所在地是科卢韦齐。

183. 如上所述，2018 年，克洛德·德凯穆拉里亚女儿向我提供了更多关于 1993 年 6 月 16 日德凯穆拉里亚在家中与法国前雇佣兵 Robert (Bob) Denard 会面的新资料。已经引用的笔记中提到，Bracco 是 Fouga 飞机的飞行员，提到 Magain “什么也没说”，Delin 是加丹加空军的负责人，但不是飞行员。

184. 《哈马舍尔德悬案》电影团队通过摘录他们与前雇佣兵 Carlos Huyghe 的访谈记录提供了新资料，采访时他已经 93 岁了。Huyghe 承认他在刚果从事雇佣兵活动，但否认 Jerry Puren 所说的坠机当晚他在恩多拉的说法。他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直到 1961 年 9 月 18 日才从欧洲到达非洲(他说他的飞行路线是从巴黎到南非)。他说，大约一周后，他和当时留在约翰内斯堡等待飞机修理的雇佣兵“Sputnik”(Gürkitz)从约翰内斯堡经恩多拉飞回加丹加。他不知道 1961 年 9 月 17 日午夜至 18 日凌晨“Sputnik”是否在恩多拉。

185. 根据《哈马舍尔德悬案》电影团队的资料，Huyghe 提供了他所说的文件，证明他在相关日期不在恩多拉。他向采访者提供了一份由比利时驻约翰内斯堡领事馆盖章的护照记录复印件，上面有显示出入境日期的页面。有些日期又问了一下 Huyghe，因为一个出入境记录显然显示他于 1961 年 8 月 3 日离开加丹加，另一条记录显示他于 1961 年 8 月 5 日抵达马拉马拉机场。这与他所说的他离开加丹加前往欧洲的说法相反。但 Huyghe 表示，这些日期肯定有误。

186. Huyghe 进一步证实，Roderick Russell-Cargill 是加丹加的雇佣兵招募者，但表示他本人没有参与招募活动。他说，Russell-Cargill(他后来告诉联合国，Huyghe 参与了暗杀帕特里斯·卢蒙巴行动)招募了 Jerry Puren 到加丹加，已经在那里的 Huyghe 和 Crevecoeur 让他到加丹加空军担任导航员。他还说，法国政府在戴高乐总统知情的情况下向加丹加派遣了 17 名法国军官，Bob Denard 参与了法国情报工作，Denard 发动了对联刚行动的战斗。他提到了 Trinquier、Faulques 和 Debourdonnaie 大约在相关时间都在加丹加。我注意到，Huyghe 在这方面的陈述与法国独立任用人员的分析有重叠。Huyghe 表示，他希望把他的名字从参与卢蒙巴和哈马舍尔德事件中除去。

187. Rosez 还在陈述中提供了有关雇佣兵的资料。他说，他住在伊丽莎白维尔时，他家隔壁的邻居是加丹加宪兵队总指挥 Norbert Muke 将军。1961 年，Rosez 与 Muke 将军的儿子(也叫 Victor)是朋友，也与 Muke 将军关系密切，因为他经常去 Muke 家。有时其他政界人士也会来拜访将军，比如 Godefroid Munongo 部长和 Evariste Kimba 以及 Kimba 的两个儿子。

188. Rosez 回忆说，1961 年 8 月和 9 月，他在加丹加看到许多外国雇佣兵，其中一些人他本人还认识，有些人他看见与联刚行动作战过，有些人他在伊丽莎白维尔不同地点遇到过(包括邮局前的“宫殿”，利奥波德二号酒店(酒吧和客房)以及市政游泳池和丽都游泳池)。Rosez 说，他在家族朋友 van Dijks 家、Muke 将军家或镇上附近都见过雇佣兵。他在陈述中提到的那些人他见面可以认出；其中一些他知道真名，还有一些当时只知道他们的代号，后来才知道他们的名字。雇佣兵们很想把他们的故事讲给别人听，在这么小的圈子里保守秘密很难。

189. 据 Rosez 说，1961 年 8 月和/或 9 月前后，他在伊丽莎白维尔亲眼看到的非隶属于加丹加空军的外国雇佣兵包括：Robert (Bob) Denard(一个法国士兵)、Jean-Baptiste Dubois(待在 van Dijks 家的一个比利时士兵)、Dislaire Lucien、Jacques Saquet、Van DeWalle 上校、Weber 少校、Lebvebre 指挥官、Ropagnol(法国人，又被称为“le Légionnaire”)以及 Faulques(法国人，又被称为“Indo”)。据 Rosez 说，

1961年8月和/或9月他在伊丽莎白维尔亲眼看到的隶属于加丹加空军的外国雇佣兵包括: Jimmy Hedges(一个南非人, 冲伯的私人飞行员, 当时他和另一个南非人一起待在 van Dijks 家, 另一个人是一个导航员, 他只知道别人都叫他“Fossy”)、Jerry Puren(南非人, 导航员兼炸弹手)、Jan Van Risseghem(一个比利时/英国飞行员, 经常和 Puren 在一起)、Sandor Gürkitz(一个匈牙利飞行员, 他记得一天早上8点在 Ruwe 大道看到他去技术制图学校)、Joseph Delin(一个比利时指挥官)、Dubois(也是比利时 Fouga 飞机飞行员, 在 Luano 机场与冲伯同机)以及 Roger Bracco。Rosez 说, 他不确定是否看到过 Magain, 但可能在 Luano 机场短暂见过他。

190. 关于 Rosez 先生回忆的相关时间的具体事件, 他说, 1961年9月15日, 雇佣军 Denard 返回加丹加, 协助“广播学院”战斗, 在战斗中, 一个小型伞兵排由一些“平民”(包括 Denard、Faulques、Ropagnol 等人)领导。Rosez 和他的父亲都在9月14日到16日之间在该学院里看到了这些雇佣兵, 他们认出了他们。这次交火持续时间很长, 一直打到9月15日晚上。联刚行动爱尔兰部队躲在“Commissaire Soete”的房子里。9月15日晚上, 他远远地看到 Denard 和至少5名其他雇佣兵以及志愿者 Jean-Baptiste Dubois(其他人可能是 Faulques、Ropagnol 和 de Saint-Paul, 但他当时无法证实)。他们在街上和废弃的房子里搜寻爱尔兰军人。当时, “Marie José研究所”、伊丽莎白医院和学院周围的整个地区都没有联刚行动部队人员。广播学院再次开始广播, 煽动民众共同对抗刚果部队和联刚行动部队。Muke 将军指挥着马萨特营地的剩余人员保卫营地和矿业联盟的设施。他的许多人分散在镇上, 他花了一些时间才把他们叫回来。他还要求加丹加空军进行干预, 加丹加空军提供了 Fouga 飞机。

191. Mike Hoare 的儿子 2018 年出版了一本关于雇佣兵 Mike Hoare 的书, 题目是《疯狂的 Mike Hoare 的传奇人生》, 书中写道, “在 Mike 很老的时候, 有一天,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 他漫不经心地告诉我, 他后来和 Phyllis 一起经由公路回到加丹加, 在回去的路上, 他们住在北罗德西亚恩多拉的鲁特兰酒店。他记不起为什么要回去, 但他记得那一天是 1961 年 9 月 17 日, 因为就在这一天, 联合国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正飞往恩多拉与冲伯安排停战, 就在那一天, 他的 DC6-B 飞机在附近坠毁, 机上 16 人全部遇难。Mike 生性多疑, 表面上看不出什么, 但他觉得坠机的真正原因已经被掩盖了——永远也不会为人所知了。他明确表示, 他个人对坠机事件一无所知, 也与坠机事件毫无关系”。这似乎是声称 Hoare 坠机时在恩多拉的首份资料。

192. 2019 年 7 月从 Simensen 收到的新资料提请我注意 2017 年报告中提到的名为“Dubois”飞行员的潜在相关性。这份来信指出, 联合国军事情报处于 1961 年 10 月 18 日要求联刚行动部队指挥官对各种问题作出答复。答复中的一份手写注释指出, 部队指挥官注意到 Fouga 飞机的飞行员是“Dubois”。

193. 正如 Simensen 所注意到的, Rösiö 1993 年题为《恩多拉灾难》的报告注释中提到了这名飞行员。通过 Jonas Waern 上校的比利时联络人(历史学家 Daniel Despas), Rösiö 联系上了 Van Risseghem。Van Risseghem 的回复信(包括飞行日志摘录)记录在 1993 年 3 月 2 日 Rösiö 的笔记中。Simensen 将原文为瑞典语的注释

翻译了一下，注意到其中内容如下：“Delin 在伊丽莎白维尔担任装载主管，后获得副中尉头衔，负责管理黑人工作人员，随后被派往科卢韦齐，因为那里的 3 名 Fouga 飞机飞行员纪律涣散且酗酒，而第 4 名飞行员不得被送回比利时。3 名 Fouga 飞行员中的一人驾驶的飞机在伊丽莎白维尔坠毁，导致一行三人只剩下 2 名 Fouga 飞行员，加上 Van Risseghem 和一名法国教官为科卢韦齐剩下的唯一可使用的一架 Fouga 飞机和一架 CM-170 提供服务。Delin 在南非接受的培训是成为导航员，而不是飞行员，他没有飞行经验，比利时空军也不要他，他唯一的优势就是他会说‘加丹加语’。Despas 显然也与 Vandewalle 上校有过联系。Risseghem 解释说，他愿意透露更多信息。他附上了一本飞行日志的复印件，上面说最初有 3 架 Fouga 飞机，编号为 K91、K92 和 K93；最后只剩下了 K93。从 8 月 28 日 Rumpunch 开始到 9 月 20 日 Risseghem 显然已经从比利时返回期间，没有任何飞行记录。Risseghem 最后一次驾驶 Fouga 飞机的飞行日期是 8 月 10 日。除了 Van Risseghem 之外，其他飞行员还有 Dubois 和 Dagonier。副驾驶/学员的名字有很多，但以往的资料并未确认他们的名字。其他飞机是 Heron、DC-3、Dove 和一架 Dornier 28。印戳上写着‘Etat du Katanga, Force Aerienne’（加丹加国空军部队）。Despas 为感谢 Risseghem 显然将其中一架 Fouga 飞机涂了漆，Risseghem 被认为是‘pilote titulaire du KAT93 et Commandant de l’AVIKAT’（KAT93 的飞行员兼加丹加空军指挥官），AVIKAT 很可能是‘加丹加空军’的缩写。他还附上了《卫报》文章中非常关键的报纸剪辑，但该文件误将恩多拉写成恩多伦，从而指出泛航的导航教学分不清东西南北。飞行日志还说，Fouga 在空中的飞行时间不能超过 1 小时 30 分钟”。

194. 由于 2017 和 2019 年确认 Dubois 可能是 Fouga 飞机的飞行员，任何进一步的调查可能都会力求找到更多记录，以确定 1961 年 9 月 17 日他所在的位置。

195. 2018/19 年度收到的新资料再次凸显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加丹加及其周边地区的外国雇佣兵，包括飞行员，比早期调查所考虑的要多得多。我不能交叉引用所有资料，这些资料也不一定完整。由于这些原因，根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不可能确定 1961 年 9 月 17 日午夜至 18 日凌晨加丹加或恩多拉附近究竟有哪些雇佣兵人物。但是，没有一个已提好的这方面的特定假设，目前也没有必要提出这样一个假设。我们能够得出的结论是，在相关时间，无疑有更多涉案人积极参与了反对联合国的战斗，人数比早期调查所考虑的要多。我评估认为，关于 1961 年 9 月 17 日午夜至 18 日凌晨加丹加武装部队中有不止一名飞行员的新资料的证明价值依然为“中”。如果任何具体的假设有进一步进展，那么这一资料还需进一步的核证。

5. 可能的飞机类型和起降机场

196. 早期调查在审议哪些设备可被用于袭击 SE-BDY 范围方面存在缺陷。早期调查认为不相关但后来事实证明属于重要资料的一个例子是，这些调查在评估加丹加空军飞机是否有可能实施攻击时只考虑了 Fouga Magister 飞机，没有考虑到 Van Risseghem 是加丹加空军飞行员。我们现在知道，加丹加空军拥有可用于进攻性军事目的的其他飞机，包括多架 De Havilland Dove 飞机和至少一架 Dornier DO-

28 飞机。值得一提的是，正如瑞典独立任用人员所指出的，此次事件中可能还有另一架飞机的问题是瑞典政府在 1962 年提出的，包括瑞典政府在其 1962 年 2 月 26 日题为“瑞典政府对联邦调查委员会关于 SE-BDY 飞机事故的报告的评论意见”的报告中提出了这一问题。Bo Virving 等其他人也提出了类似观点；但早期调查并没有深入考虑这种可能性。

197. 独立小组分析了在对 SE-BDY 的空袭中有可能使用了 Fouga Magister 喷气式飞机、De Havilland Dove 或 Dornier DO-27 或 DO-28 飞机的说法。独立小组最终将其中一架飞机具体用于此类攻击的资料的证明价值定为“弱”，但指出可以确定这些飞机在相关时间确实在该地区。2017 年报告指出，关于 Fouga、De Havilland、Dornier 或其他飞机可能袭击了 SE-BDY 的资料单独看来被评估认为证明价值为“弱”，但必须将其与其他证据，包括证人证据一并加以考虑。

198. 2018/19 年度，我从独立任用人员和其他来源获得了以下关于可能的飞机和机场类型的进一步资料。

(a) **飞机：Fouga Magister**

199. 早期调查确定，1961 年 9 月加丹加空军有一架 Fouga Magister 喷气式飞机可用，并在敌对行动中给联刚行动部队造成了重大损失。但这种喷气式飞机的数量，它们是如何被运到加丹加的以及加丹加空军是否还有任何其他能力都是当时没有解决的问题。

200. David Doyle 是驻加丹加的前中央情报局官员，2013 年，他接受了哈马舍尔德委员会的采访。他表示，1961 年 7 月之前，他一直在中央情报局伊丽莎白维尔“分局”工作，与 Freddie LeClair 及另一名通讯员一起工作。Doyle 说，有一天晚上，当他在加丹加执行“机场例行检查”时，他看到一架没有标记的 KC-97 美国空军飞机，上面有穿着便服的美国空军机组人员，正在卸载 3 架 Fouga Magister 飞机。Doyle 表示，这些飞机是“法国人交给中央情报局用来对付联合国飞机的”，由“冲伯或法国或比利时”支付费用。根据这些信息，独立小组询问美国是否参与了供应 Fouga 飞机(一些文件中将其错误地拼写为“Fuga”或“Fugha”)。美国告知独立小组，“中央情报局进行了搜寻，没有发现关于所涉时间在加丹加地区存在 Fouga Magister 飞机的任何文件”。但在 2017 年进行进一步调查后，美国后来表示，它实际上确实有记录，证明美国公司七海航空公司于 1961 年 2 月 16 日左右向加丹加运送了 3 架 Fouga Magister 飞机。美国没有提供资料说明为什么中央情报局最初的搜寻没有发现这些飞机。我评估认定这一新资料的证明价值为“强”。

201. 在 2017 年进行审查后，联合国记录和其他资料确定，1961 年 9 月 17 日，一架或两架 Fouga 飞机仍可使用(最初的订单中总共有 9 架喷气式飞机，但只交付了上面提到的前 3 架)。某些消息来源指出，到 1961 年 9 月只有 1 架 Fouga(标号为#93)可用，因为 1961 年 6 月 23 日，1 架 Fouga(#91)在训练中在伊丽莎白维尔附近坠毁，当时由加丹加空军飞行员 Dagonnier 驾驶(飞行员遇难)。另一架(#92)于 1961 年 7 月因机械故障在 Luano 伊丽莎白维尔机场停飞，此后于 1961 年 9 月 13 日在“Morthor 行动”中被联合国没收。

202. 但 2017 年审议的会员国和联合国提供的其他资料显示,在相关日期或该日期前一天,可投入使用的 Fouga 飞机不止一架,其中包括多份信函中都提到不止一架喷气式飞机,包括美国大使 Gullion 给美国国务卿的多份电报,其中一封于 1961 年 9 月 16 日表示,“据信有 2 架[Fouga] Magister 飞机可以使用”,并且“明显担心”那架喷气式飞机可能会进行夜间突袭。联合国信函上也提到不止有 1 架喷气式飞机,对联合国部队发动袭击的次数也表明,单靠 1 架 Fouga 飞机很难做到。例如,联合国档案显示,Fouga 飞机的袭击每天发生多次,包括 9 月 15 日、16 日、17 日和 18 日,其中包括火箭、机枪和炸弹袭击。在这些日期期间的这些袭击中曾有一次爆炸袭击炸死了联合国人员,摧毁了联合国多架飞机,其中包括 1 架 UNC199、1 架 DC-3 和 1 架 DC-4。我在此作个标记,以便后续调查确定 Fouga(#91)是否在 1961 年 6 月 23 日坠毁,Fouga(#92)是否在 1961 年 9 月 13 日被联刚行动没收。

203. 关于新资料,德国独立任用人员注意到西德驻莱波尔德维尔大使馆 1961 年 7 月 25 日的一份报告,报告称加丹加空军拥有“8 架 Dakota 运输飞机、3 架直升机、2 架 Fouga 飞机和几架侦察机”。但随后的报告只提到了一架 Fouga 飞机,包括 1961 年 9 月 25 日西德驻莱波尔德维尔大使馆的一份报告,其中提到一架喷气式飞机袭击联合国飞机,包括 8 架飞机和 3 架直升机,并对联合国地面部队进行“打击士气”的袭击。另一份此类报告载于 1961 年 10 月 21 日西德驻华盛顿大使馆致联邦外交部的电报中,其中提到一架 Fouga 飞机控制了联合国部队的全部物资,并在地面步兵行动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204. 比利时的独立任用人员指出,根据 2017 年分析的类似文件(这些文件已列入报告),看来 1961 年 9 月只有 1 架 Fouga 飞机(#93)可用。

205. 加拿大独立任用人员找到了 1961 年 9 月 19 日国防部的一份报告,上面说加丹加空军“人数约为 200 人,基地设在科卢韦齐(位于伊丽莎白维尔西北约 200 英里)。飞行员是欧洲人(比利时人、法国人、罗德西亚人和南非人)。他们飞行的飞机有以下几种:3 至 7 架 Fouga Magister(喷气式飞机,配备火箭、大炮和机枪),6 架 Harvard 飞机,6 架 Dove 飞机,4 架 Dakota 飞机([每一架]都配备了机枪)。”

206. 津巴布韦的独立任用人员找到了类似资料,包括 1961 年 10 月 4 日为罗德西亚安全和情报联合委员会编写的一份报告,其中写到加丹加空军有 1 架罗德西亚军用 Fouga 喷气式飞机、1 架 Dornier 28 飞机、2 架 Piper Cub 飞机、2 架 Dove 飞机、1 架 Sikorsky 55 飞机(前联合国)和 6 架仍待交付的 Fouga 喷气式飞机。这份文件还发现有 10 个空军基地和多名可驾驶上述飞机的飞行员。

207. 瑞典独立任用人员分析了瑞典武装部队参谋长 Göransson 将军 1961 年 9 月 23 日至 27 日访问刚果后撰写的一份报告。该报告指出,“敌方在科卢韦齐空军基地的 3 架飞机(Fouga Magister 飞机)拥有充分的行动自由”。这一内容被写入了报告,尽管美国大使 Gullion 显然已经告知 Göransson 将军“只有一架 Fouga 飞机”。独立任用人员还指出,在 1962 年和 1961 年 12 月开展的初步工作的基础上,1993 年编写了一份后来的论文,题为“瑞典空军对 Fouga 飞机能力的研究,1993-02-

01”。1993 年的论文注意到，从理论上讲，Fouga 飞机可以从科卢韦齐出发，在恩多拉上空执行任务，但考虑到时间因素，这种可能性不大。

208. 瑞典独立任用人员还指出，卡米纳基地 1961 年 10 月 31 日关于 1961 年 9 月 14 日至 20 日期间事件的联刚行动备忘录报告称，1961 年 9 月 18 日 7 时 30 分一架 Fouga 飞机袭击卡米纳。这似乎反驳了罗德西亚委员会证明当天上午 8 点那架 Fouga 飞机仍在科卢韦齐的证词(例如 Forrest 的证人陈述#84)。

209. 法国独立任用人员指出，1961 年向加丹加供应法国制造的 Fouga 飞机一事似乎已为法国最高层(包括戴高乐总统和外交部长顾夫·德姆维尔)所知。1961 年 9 月之后，顾夫·德姆维尔因得知“像 Fouga 这样的可疑的武器交易正在被续约，国防部和特勤局对此都(再次)表示支持”，写信给德勃雷总理。显然，1961 年 11 月左右，刚果共和国总统菲尔贝·龙卢从法国订购了大量武器，大概是打算给加丹加的。顾夫·德姆维尔说：“我以为加丹加问题已经解决(……)平行干预加丹加事务已经翻篇，[已作出决定]使我们的官方政策与不归我管的某些服务[国防和特勤局]的政策一致”。信中的一个边注写道，德勃雷总理已口头答复。从这份记录可以看出，经刚果共和国转运的法国武器销售是运往加丹加的。但这封信没有提供更多细节说明 1961 年 9 月期间有多少架 Fouga 飞机可用，也没提供其他细节。

210. Victor Rosez 在 2019 年给我的陈述中回忆了个人经历，其中包括，在 1961 年早些时候，他看到 3 架 Fouga 飞机为 Weber 少校的 DC-6 飞机提供空中护送，Weber 少校是应联合国的要求离开加丹加前往布拉柴维尔的军事顾问。但 Fouga#91 号于 1961 年 6 月坠毁，造成飞行员和副驾驶死亡，坠机地点距离 Rosez 一家住在伊丽莎白维尔的 d'Uvira 广场的住处约 1 公里；他父亲目睹了此次坠机事件。1961 年 8 月，Fouga#92 号被联合国没收，Rosez 因为与机场的一名突尼斯空中交通管制员是朋友，可自由进出机场，因此在 Luano 伊丽莎白维尔机场见过这架飞机。他说，他几次见过 Fouga#93 号飞机在空中飞行，一次是攻击 Luano 机场，一次是攻击 Claire Manoir，据他所知，Fouga#93 号飞机是 1961 年 9 月加丹加空军中仅存的 1 架 Fouga Magister 飞机。

211. Rosez 还就 Fouga 飞机的使用情况作了其他陈述。关于夜间飞行任务，他说，1961 年 8 月左右，他听说 Fouga 飞机在午夜前后执行了一次飞行任务。1961 年 9 月 13 日，他听说这架 Fouga 飞机在伊丽莎白维尔机场摧毁了一架联合国 DC-3 飞机。他说，他当时是听说的这件事情，没有亲眼目睹。9 月 14 日，他看到这架 Fouga Magister 飞机在飞行，并从加丹加部队内的朋友那听说，这架 Fouga 飞机在雅多维尔攻击联刚行动部队并赶走了一架直升机，攻击停在卡米纳的 DC-3 飞机，并对伊丽莎白维尔的联刚行动部队又发动了一次空袭。他说，他知道这架 Fouga 飞机投掷了 25 公斤炸弹，也可能是 50 公斤炸弹，其中一些炸弹是他协助制造的(如下所述)。1961 年 9 月 17 日，Rosez 听说，这架 Fouga 飞机进行了一次空对空攻击，涉及对联合国一架 DC-3 飞机进行追击和射击。

212. 根据 Picard 2018 年对 Bracco 的采访(如上所述)，1961 年晚上，Bracco 和 Van Risseghem 一同驾驶 Fouga 飞机飞行，但 Van Risseghem 告诉 Bracco 不要将

这些飞行情况记录在飞行日志中。Van Risseghem 自己的飞行日志也显示，1961年8月有一次驾驶 Fouga 飞机的夜间飞行记录。

213. 之前已经对 Fouga 飞机的作战能力进行了评估。这些都具有相关性，因为在夜间、空对空攻击和/或从未铺路面的简易机场发动行动有各种限制，以前称因这些限制使得攻击 SE-BDY 的可能性下降。早期调查似乎已经接受了加丹加工作人员的证词，即不能将 Fouga 飞机用于夜间行动或发动空对空攻击，而且 Fouga 飞机只能在科卢韦齐使用。但现已证明，这一证词的部分内容不属实：例如，Delin 少校的陈述是，他是唯一一名能够驾驶 Fouga 飞机的飞行员。此外，2017年收到的关于作战能力的资料表明，已将 Fouga 飞机用于夜间飞行或空对空攻击。关于这些方面的信息的例子包括1961年9月15日 Gullion 的信函，其中提到对 Fouga 飞机执行夜间任务表示关切，另一封信是1961年9月18日从纽约发给美国国务卿的，其中说 Fouga “喷气式飞机袭击了从伊丽莎白维尔飞往利奥途中的美国 Dakota 飞机。飞机受损，但安全抵达利奥”。这表明 Fouga 不仅有能力发动空对空袭击，还袭击了在加丹加的美国飞机。

214. 2018/19 年度收到的新资料建立在前几年审议资料的基础上。现在看来，有说服力的证据表明，1961年9月，加丹加空军只有一架 Fouga 飞机仍可使用；然而，如果只有一架飞机，那么它在广大区域内实施了多起攻击表明，它是以严格有效的方式操作和维护的，包括由多名飞行员和支持人员操作和使用。若干资料来源提到 Fouga 飞机可在夜间使用以及实施空对空攻击。下面将进一步考虑哪些机场可能被用于了起飞或着陆。

215. 我重申，任何分析都必须保持审慎态度，因为2015和2017年收到的专家意见指出，鉴于 Fouga 上的设备和用于从地面支持 Fouga 的设备，Fouga 很难执行夜间任务或进行空对空骚扰或攻击。此外，这一分析只表明 Fouga 有可能威胁或攻击 SE-BDY，这意味着不能排除这种攻击或威胁。但分析并不支持 Fouga 实际上被用来对 SE-BDY 进行了攻击这一具体命题。基于以上内容，我评估，关于1961年9月 Fouga 飞机在加丹加存在和活动的资料的证明价值为“中”。

(b) 飞机：Dornier

216. 独立小组和知名人士分析了 Torben Gülstorff 提供的关于加丹加有 Dornier DO-27和 DO-28 飞机以及其中一架或两架飞机可能参与了攻击 SE-BDY 的信息。Rösiö 在其报告中指出，在对联合国的夜间轰炸行动中使用了 Dornier 飞机。

217. 2017年，Gülstorff、比利时、德国、美国和联合国向我提供了关于 Dornier 飞机的资料。2017年报告得出的结论是，似乎可以确定，Dornier DO-28 飞机是在1961年按商业条件从西德供应给加丹加的，其中至少有一架飞机1961年9月17日午夜至18日凌晨之前已运抵加丹加，这架飞机可能经过了改装，使其能够用于实施空中袭击和轰炸。根据联合国资料，1961年，加丹加空军的 Dornier 飞机当时正在开展行动，其中包括白天和夜间的轰炸行动，且据报在相距大约1000公里的两个地点(Kaniama 和恩多拉)开展了行动，1961年10月，至少有一次行动

是企图进行空对空拦截。虽然其中一些行动发生在 SE-BDY 坠毁后，但它们事关 Dornier 飞机是否有能力开展此类行动。

218. 在 2018/19 年度获得的关于 Dornier 飞机的资料中，德国的独立任用人员提供了对这些飞机交付的详细分析。西德政府最初在 1961 年年中表示，关于交付这种飞机的说法不实，原则上，西德不向政治危机地区运送武器，并受安全理事会和大会通过的关于刚果的相关决议的约束。

219. 但 1961 年 9 月 29 日，美国驻波恩大使馆向西德外交部通报了“报告”，称在加丹加发现了一架武装 DO-28 飞机，但没有提供进一步的细节。随后，根据德国独立任用人员向知名人士提供的新资料确定，Jean Cassart 通过其公司 Mitraco(Dornier 在刚果的代表)于 1961 年初订购了 6 架 DO-28 飞机。其中一架飞机于 1961 年 8 月 18 日在 Oberpfaffenhofen 的 Dornier 机场移交给买方，经海关清关并经 Luftfahrtbundesamt(联邦航空办公室)批准，于 1961 年 8 月 21 日离开慕尼黑国际机场经科西嘉的阿雅克乔前往加丹加。飞机由 Heinrich Schäfer 驾驶，他是前 Dornier 试飞员，在 Jean Cassart 的陪同下于 1961 年 8 月 29 日左右抵达加丹加。

220. 分析的资料显示，另外 4 架 Dornier DO-28 飞机由比利时飞行员驾驶，经罗安达于 1961 年 10 月中旬后的某个时间抵达加丹加。由于这是在 SE-BDY 坠毁的日期之后，这些飞机被认为与本报告所述的目的无关。根据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常驻联合国观察员 1961 年 10 月 25 日的一封电报，已向联合国告知 Dornier 飞机一事，常驻观察员称其结论是，“德国的记录完全清白”。

221. 关于 Dornier DO-27(单引擎)飞机，西德驻罗安达领事馆 1961 年 7 月 19 日的一份报告通知西德，那里有 16 架 DO-27 飞机。这些飞机经过了军事化改装，配备了火箭发射器，葡萄牙军方部署这些飞机用于打击安哥拉北部的叛军，该地区的德国农民目睹了其中一些袭击事件。1961 年 8 月 29 日的另一份报告通报称，葡萄牙在靠近安哥拉和刚果边界的“Canda 地区”开展了一次军事行动，这一地区有几架配备了火箭发射器的 DO-27 型飞机被用来为 1961 年 8 月 25 日进行的空降行动提供掩护。

222. 1961 年 7 月 10 日西德外交部给其在纽约的常驻观察员的一封电报指出，已向比利时交付了 6 架 Dornier DO-27 型飞机。虽然这些飞机只配备了常规民用设备，未配备任何其他设备，但“不能排除交付给第三国的一些 DO 飞机(……)可能已经被转运到了加丹加，最终还会配备更多军事装备”。在德国独立任用人员查询的档案中没有发现随后有确认这一情况是否属实。

223. 比利时的独立任用人员再次指出，加丹加空军拥有 DO-28 飞机，但指出，不清楚加丹加空军购置了多少架这种飞机，也不清楚这些飞机何时交付给了加丹加。1961 年 10 月初的一份国家安全局文件指出，一架 DO-28 飞机可能在 1961 年 9 月之前从德国飞到了布拉柴维尔，随后飞到了科卢韦齐。此后，同一类型的第二架飞机可能在未知日期也已从德国直接飞往加丹加。1961 年 10 月下旬的另一份文件提到，“最近”德国向加丹加交付了 4 架 Dornier 飞机，使 DO-28 飞机

总数达到 6 架。比利时档案中的资料还指出，DO-27 和 DO-28 可被改装为战斗机使用。

224. 我向葡萄牙独立任用人员具体问及，是否有任何细节说明 1961 年 8 月至 10 月期间加丹加空军 Dornier 飞机使用安哥拉空域的情况，我得到的答复是，空军历史档案馆的记录中没有提到这一问题中提到的飞机或飞行员。

225. 2018/19 年度还收到了 Gülstorff 提供的新信息，这些信息是他在 2015 和 2017 年提供的信息的基础上提供的。他提供的信息在很大程度上与德国独立任用人员确认的信息一致。他提供的进一步信息指出，除了 8 月运抵的 DO-28(标号为 3016)和大约 1961 年 10 月 16 日运抵的另外 4 架 DO-28(3017-3020)之外，另有一架 DO-28 被拆卸，运到了隶属葡萄牙的安哥拉，转运到科卢韦齐，在那里由一名公司技术员重新组装。但是，由于这架飞机的抵达时间在 SE-BDY 坠毁的日期之后，因此认为其与本报告所述的目的无关。

226. Gülstorff 还提供信息说，DO-27 飞机在 1961 年一直被用于军事目的，包括在安哥拉，西德外交部 1961 年 11 月 24 日的电报通知 Dornier 公司，一架 DO-28 飞机在加丹加袭击了联刚行动和刚果部队。就作战能力而言，根据巴伐利亚州经济和交通部门 1961 年 11 月 10 日提供的信息以及 2018 年 6 月与 Dornier 航天基金会工作人员的通信，Gülstorff 表示，DO-28 飞机的最高速度约为 328 公里/小时，正常速度约为 250 公里/小时，最低飞行速度约为 65 公里/小时。他表示，根据同样的信息，DO-28 飞机具有极好的机动性，属“短距起落”飞机，能够在长度不到 300 米的跑道上起飞和降落。Gülstorff 还表示，第一架 DO-28 飞机(3016)配备了 Lear ADF 14-d-1 无线电罗盘，这将有助于夜间飞行，Narco Marc V 高频无线电设备以及专门为远程通信设计的 Sunair 5-T-R 高频收发报机。

227. 在德国独立任用人员的报告定稿后，Gülstorff 又向我提供了关于德国情报人员就 Dornier 飞机一事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合作的更多资料。1961 年 7 月 28 日，中央情报局将提交规划局的一份题为“Dornier 飞机评估”报告标记为“机密”。报告指出，“[中央情报局]的任务要求最好利用具有短距起降能力的轻型飞机来完成。到目前为止，已利用 Helio Courier[飞机]完成了这些任务……2. 中央情报局要求空军飞行员-工程师团队评估适用的德国制造的 Dornier 飞机型号，以便进行比较[包括]DO.27、配有涡轮螺旋桨发动机 Do.27T 和 Do.28”。1961 年中央情报局在刚果开展的与空中有关行动的进一步情况下文将进一步讨论，但有必要确定中央情报局想要的 Dornier 飞机中的任何一架有没有被运到刚果用来对付联合国的飞机。

228. Gülstorff 提供了一份 1961 年 10 月 20 日名为《Caravel 联系报告》的新解密的中央情报局文件。其中写道“运往加丹加的 Dornier 飞机：解释了这一交易可能会给德国带来污点的风险，并给出了事件概要。把比利时军火商 Jean Cassart 和据称的中间人 Freddy Loeb(居住在罗德西亚基特韦)的名字交给了 Caravel，允许他安排国际刑警组织的检查，这反过来又给进一步调查提供了解释。Caravel 希望听到 Dornier 一方讲述这件事，因为：‘碰巧我们在 Dornier 有一个人’。”中央情报局知道 Cassart 和 Loeb 的身份，Cassart 向加丹加空军提供飞机，Loeb 与英

国情报部门、矿业联盟和罗德西亚官员等协调，他们有一名特工与 Dornier 有联系，这表明这是必须进行研究的另一个领域，下面将进一步讨论这一问题。

229. Rosez 在陈述中回忆起 1961 年 9 月的第一个周末，他在新学年之前参加了一次学校聚会。时间大约是 1961 年 9 月的第一个星期六，他在基普西参观一个朋友的小湖和农场，这个朋友有一架小型单引擎飞机。他在那看到了一架编号为 3016 的 Dornier DO-28，在他看来，这架飞机的侧门大得惊人。他和他的朋友与一些说法语的雇佣兵交谈时发现他们的口音不同(他后来认为他们可能来自法国，而不是来自比利时)。这些雇佣兵告诉他们，还会交付更多飞机，并要求他们在非常小的跑道上留出空间。Rosez 还说，他亲眼看到 1961 年 8 月运抵的 Dornier DO-28 飞机上安装了一个炸弹系统。

230. 如上所述，Van Risseghem 和 Bracco 飞行日志中提到的是驾驶 DO-28 飞机。如下面将进一步讨论的，日志还显示，DO-28 利用了加丹加、北罗德西亚、安哥拉和刚果共和国的机场。此外，联刚行动档案提供给我的新信息包括 1961 年 12 月 14 日美国空军专员 Matlick 给美国大使 Gullion 的一份报告，报告称，1961 年 12 月 13 日 Matlick 访问恩多拉时，他被介绍给一名 Dornier DO-28 飞机的“反对派”飞行员，他注意到机场表格上填写的是“Wicksteed(或 Wickstead), 英国国籍”。据称，这名飞行员在飞往“加丹加的一个小地带取炸弹之前”，曾将 DO-28 停在恩多拉，之后对伊丽莎白维尔的联刚行动目标进行了夜间轰炸。

231. 2018/19 年度收到的关于 Dornier 飞机的新资料建立在前几年审议资料的基础上。多个消息来源证实，1961 年 9 月当地至少有一架 DO-28，并在广泛的地理区域内活动。现有资料还提到 DO-28 已被改装，配备了武器，可夜间飞行，也可发动空对空攻击。这一分析只是再次表明，Dornier 有可能威胁或攻击了 SE-BDY；但分析本身并不支持实际上用 Dornier 攻击了 SE-BDY 的这一具体命题。尽管如此，但我评估认为，关于 1961 年 9 月 Dornier 飞机在加丹加存在和活动的资料的证明价值为“中”。

(c) 飞机：其他

232. 独立小组和知名人士分析了其他类型飞机可能参与了攻击 SE-BDY 的信息。根据 2018/19 年度收到的新资料，这些资料的进展情况如下。

233. 加拿大独立任用人员提供了加拿大常驻纽约联合国代表团 1961 年 10 月 16 日提交总部的一份报告的说明，其中指出，1961 年 9 月 23 日在恩多拉看到一架加丹加空军 Dove 飞机，根据观察和无意中听到的谈话，据了解，这架飞机正从南非飞往科卢韦齐(加丹加)，飞机上载有 3 名先前被驱逐出加丹加的雇佣兵。罗德西亚当局在接受询问时给出的关于这些乘客的信息明显是假的。该函件讨论的其他问题包括联合国关于雇佣兵 Huyghe 当时在恩多拉的报告以及另一架运载雇佣兵 Browne 上尉(显然被误拼写为“Brown”)的加丹加空军 Dove 飞机试图进入加丹加，但被英国当局拘留等情况。

234. Rosez 在陈述中说，他在 1960 和 1961 年期间在加丹加多地(下文进一步讨论)以及加丹加空中看到了很多飞机。除了非常短暂的麻烦时期外，这些飞机均可

自由进入机场或跑道。他表示，1960年至1961年期间，他在加丹加亲眼看到了以下加丹加空军飞机：几架 DC-3 Dakota、在空中飞行的 C-47(1961年12月之后，他再没见过任何 C-47)、1架 Fouga Magister 飞机、4架 De Havilland Dove 飞机、1架 Dornier DO-28 飞机、T-6 Texan 飞机和 Harvard 飞机(它们在北方使用)、1架云雀式直升机、Sikorsky S-55 和 S-58、Piper 飞机、Cessna 飞机和至少两架 Beechcraft 直升机。

235. Rosez 说，1961年10月，他和 Bob Denard 一起去科卢韦齐进行降落伞训练时，他看到了一架经过改装配备了炸弹发射器的 Dove 飞机。Denard 腿受了伤，不能与 Rosez 及其同事一起训练，所以训练最终取消了。但是，他们有机会在那里看了各种各样的飞机。炸弹发射器看起来像一个金属盒子，里面可放置3枚炸弹，发射器安装在 Dove 飞机底部，配有一个舱口，由杠杆操作。他们看到其中一架 Dove 飞机的木箱里至少有12枚12.5公斤重的炸弹。另一架 Dove 飞机的侧门上有一把勃朗宁 0.50 口径的枪。需要指出的是，Rosez 在这方面提供的某些信息与哈马舍尔德委员会和独立小组以前分析的关于 Puren 和 Virving 的信息是一致的。

236. Rosez 还说，他亲眼看到并参与了制造供加丹加空军飞机使用的炸弹。他父亲的工作场所加丹加下刚果省化工公司与伊丽莎白维尔的上加丹加矿业联盟(矿业联盟)的工厂相邻。由于他父亲的许多朋友都在矿业联盟工作，因此，他经常去加丹加下刚果省化工公司和矿业联盟。尽管1961年他只有16岁，但由于工人短缺，1961年5月至8月期间，Rosez 协助位于加藤大道的矿业联盟在伊丽莎白维尔的工厂制造炸弹。他的朋友 Cornelis van Dijk 教他如何制造炸弹，经过几小时的培训，他就掌握了制作内外螺丝线和切割金属管(可能是旧的路标或灯柱)技术。管子被切割成特定的长度，板材经切割成为尾部并焊接在一起，然后将各零件拧在一起。这些炸弹用比利时军队的比利时引信点火器一点就炸，位于工业大道的加丹加宪兵“base terrestre”有很多引信点火器。该地点还有大量不同类型的弹药。

237. Rosez 说，他们制造的炸弹是打算供加丹加空军使用的，包括一系列25公斤的炸弹，一些指定给 Fouga Magister 飞机使用，一些指定给 T-6 Texan 飞机使用。科卢韦齐还有为 T-6 Texan 飞机制造的50公斤重的炸弹(他个人没有制造这些炸弹)，为 De Havilland Dove 飞机制造的12.5公斤炸弹。Rosez 还表示，他看到矿业联盟同一家工厂也制造其他武器，包括将 Fouga 机枪枪管从7.5毫米钻到7.62毫米这一标准弹药尺寸。如果真的是机枪枪管被钻孔了，那么他们发射的子弹就可能没有膛线痕迹；此事还未得到核证。

238. Rosez 还指出，众所周知，包括他也知道，一个名叫 Jean Cassart(上校)的比利时人安排了许多加丹加空军飞机的交付事宜。他在伊丽莎白维尔工业区 base terrestre 背后有一个非常大的工厂，里面有安装车间。1961年8月之前，那个工厂已经组装了几架 T-6 Texan 飞机。Cassart 上校在那有一个组装飞机车间。他在比利时购买二手飞机，之后将这些飞机卖到加丹加。Rosez 说，他本人在 Muke 将军的家里不止一次见过 Cassart，但没有在楼下的大会议室参加过他们的会议。

239. 如上所述, Van Risseghem 的飞行日志摘录中也提到了驾驶 DC-3 和 Dove 进行的夜间飞行。其中写道 1961 年 6 月 22 日驾驶 DC-3 “夜间着陆 5”, 副驾驶为 “V Gee”, 1961 年 7 月 27 日在驾驶 Dove “夜间着陆 5”, 副驾驶为 Verloo。

240. 根据《约翰·肯尼迪总统暗杀事件记录集法》(1992 年)2017 和 2018 年新公布的记录也包含关于加丹加空军的情报。这些文件不是美国的独立任用人员提供的, 而是威廉姆斯提供的, 下面将进行详细讨论。1961 年 11 月, 根据这些记录中的某些记录, 向华盛顿特区报告, Fouga 喷气式飞机停靠在科卢韦齐, 除了 Fouga 飞机外, “KAT[加丹加空军]的飞机主要可能是 5 架 Dornier 28、2 架或 3 架 Dove 飞机、可能还有一架 C-47 飞机”。

241. 与上面讨论的 Fouga 和 Dornier 飞机的情况一样, 2018/19 年度收到的关于其他飞机的新资料建立在前几年审查的基础上。多个消息来源均指这些飞机配备了武器, 在广阔的地理区域内进行攻击性飞行, 包括夜间飞行。这一分析本身并不能用来佐证这些飞机被用来对 SE-BDY 进行攻击的具体命题, 而是强化了它们本可以被用来攻击 SE-BDY 的命题。尽管如此, 但我评估认为, 关于 1961 年 9 月其他飞机在加丹加存在和活动的资料的证明价值为 “中”。

(d) 机场

242. 根据 2017 年分析的资料, 2017 年报告得出的结论是, 在相关时间, 加丹加存在的机场可能比最初了解的要多, 加丹加部队有跨越罗德西亚边界的行动自由, 并可使用加丹加的机场。这些信息包括美国的来往公文指出北罗德西亚允许加丹加飞机使用恩多拉的机场, 以及 1961 年 12 月的一份联合国新闻稿指出, 一架加丹加 Dornier 飞机利用北罗德西亚的恩多拉机场对位于 250 多公里之外的伊丽莎白维尔机场的联合国设施发动了炸弹袭击。

243. 2017 年, 我考虑过可能相关的机场包括那些长度超过 750 米的机场, 尽管我注意到在 2018/19 年度收到的信息表明, DO-28 飞机可以使用更小的机场。专家意见认为 Fouga 飞机需要封闭的(沥青或混凝土)铺面跑道才能起降, 因为草面跑道或砾石跑道有可能扬起异物, 损害喷气式飞机。但我也注意到有证据(包括 Delin 的证词)表明, Fouga 飞机可能也从非封闭的跑道起飞或降落过。Delin 对罗德西亚调查委员会说, Fouga 飞机可以从许多地方起飞, 显然至少有一次, 他 “驾驶 Fouga 飞机从科卢韦齐起飞, 降落在一条土道上, 要想起飞, 就往跑道上洒水, 然后滚压”。关于夜间飞行, 早期调查指出, 使用过的临时解决办法包括用煤油和沙子照明。该地区潜在相关机场的地图已列入 2017 年报告附件。

244. 2018/19 年度收到了有关机场的新资料。瑞典的独立任用人员提供了 1993 年 4 月 Rösjö 给外交部的一封信(提交日期在他的报告提交后), 转达了他在比利时会谈时得出的主要结论。信中称, 基普西机场被 DO-28 用来攻击联刚行动部队, 包括夜间攻击。这至少发生在 1961 年 10 月, 可能更早。得出的其他结论包括, Delin 不是飞行员, “Beukels” 可能是 Société Anonyme Belge de Constructions Aéronautiques 公司的 “Beuken”。

245. 正如 Picard 所指出的那样，一位前罗德西亚士兵也写过 Dornier 曾多次夜间飞行。在《圣徒：罗德西亚轻步兵》一书中，罗德西亚轻步兵第一营 A 连指挥官 Alexandre Binda 于 1960/61 年度驻扎在刚果和北罗德西亚之间边界，他在《圣徒：罗德西亚轻步兵》中说，“我们还发现跑道很短的基普西机场横跨边界。白天大部分时间我们都掌控着机场，但晚上机场经常被雇佣兵使用，他们驾驶着一架噪音非常小的 Dornier 短距起降飞机，这架飞机看起来有点像大号的 de Havilland Twin Otter 飞机。这架飞机为加丹加部队运来弹药和武器以及奇怪的人，并后送雇佣兵伤亡人员……。虽然我们报告了机场的秘密活动，但我们被告知不要干预，所以我们没有干预。”

246. Rosez 在陈述中证实，他知道 1961 年早些时候加丹加空军主要空军基地在 Luano，但他也看到科卢韦齐、雅多维尔、基森盖、迪洛洛、基普西、恩多拉和基特韦被用做过空军基地。关于 Fouga 在 1961 年 8 月左右的夜间飞行，他获悉飞机在“KM30”机场起飞和降落，KM30 是一个由大约 1.5 公里长的红色泥土铺成的跑道。

247. 上述 Van Risseghem 1961 年 6 月至 9 月期间的飞行日志摘录显示，加丹加空军飞机当时正在使用加丹加、北罗德西亚、安哥拉和刚果共和国的机场。他们列出了 Dornier DO-28 在 9 月份起飞或降落的机场包括：布拉柴维尔、Vila Herique(拼写错误，可能是安哥拉的 Vila Henrique)、科卢韦齐、基普西、恩多拉、雅多维尔、卡米纳和孔戈洛。

248. Gülstorff 提供的资料包括 1961 年 10 月 21 日西德驻华盛顿特区大使馆和美国国务院之间的一次会议笔记，其中提到了一架 DO-28 飞机停靠在基普西。

249. 与 2017 年报告中的评估一致，我评估认为，关于加丹加部队可能使用了比以前确定的更多的加丹加、北罗德西亚和其他地点机场的新资料证明价值为“中”。

6. 罗德西亚军事力量

250. 与使用罗德西亚机场的先前资料相关的是，还收到了关于 1961 年 9 月 17 日午夜至 18 日凌晨加丹加有罗德西亚军队的新资料，这是早期调查没有考虑到的。

251. 津巴布韦独立任用人员提供的资料证实，北罗德西亚大批部队在加丹加边界沿线，有时在加丹加内部集结，处于备战和战斗就绪状态。其中包括 1961 年 6 月的军事情报报告和 1961 年 10 月 8 日的北罗德西亚行动指示。1961 年 9 月 18 日皇家罗德西亚空军的一份报告也讨论了军事化的原因，包括保护恩多拉等易受攻击的机场，“以便一旦领空遭到侵犯，毫无疑问联邦将投入战斗”，入侵者将“立即遭到皇家罗德西亚空军的空中攻击”。1961 年 10 月 18 日的一份情报报告也证实，北罗德西亚人知道“加丹加空军飞机继续利用基普西机场[包括]1 架 Dornier 28 飞机、1 架直升机和 1 架 Piper 加勒比飞机”。

252. 联合国档案向我提供的资料包括 1961 年 9 月 27 日从驻伊丽莎白维尔的联刚行动(Conor Cruise O'Brien)向驻利奥波德维尔的联刚行动(Sture Linner)发送的一份电报，其中传达了 1961 年 9 月 23 日从一名罗德西亚非洲人那里收到的关于

加丹加有罗德西亚部队的信息。这一消息称，1961年9月14日，写信人在从基普西前往北罗德西亚的途中，遇到大量罗德西亚军队部队(包括各种装备、20多辆装甲车和150多名罗德西亚部队白人士兵)在加丹加一侧边界露营。第二天，他看到同一部队中的一些人穿着便装混在非洲平民当中。在与那里的一名士兵交谈时，他得知，罗德西亚部队白人士兵“被建议不要在白天作战，而是在晚上作战，因为那样他们就可以充分利用罗德西亚白人士兵，[他们]操控着所有重炮和武装车辆”。O'Brien 对这一说法的评论包括，联刚行动有其他资料说，罗德西亚和南非正在向加丹加宪兵“提供物资和技术人员”。

253. 2018/19 年度分析的信息突出表明，SE-BDY 前往的地区处于高度军事化状态，刚果和北罗德西亚边界两侧正在发生或即将发生激烈冲突。同样明显的是，北罗德西亚的记录现在散落在津巴布韦、赞比亚、联合王国和南非等地，仍然是一个可能尚未被充分审查的资料来源，其中可能包含其他相关信息。

7. 地面攻击

254. 2018/19 年度收到的信息涉及历史信息，声称地面部队可能直接攻击了 SE-BDY，或力图在飞机坠毁后立即就到达了残骸(和任何幸存者)所在地。

255. 1961 年的联合国委员会曾大略考虑过“通过空中或地面的攻击或假装攻击分散飞行员的注意力”，2017 年的报告回顾说，独立小组审议的四个领域之一是“空中或地面攻击或其他外部威胁”。此后审查的大多数新信息都涉及空袭的可能性，2017 年报告的结论之一是，“几乎可以肯定，哈马舍尔德和其他随行人员不是在飞机落地后被刺杀的”。但是否是 SE-BDY 仍在空中飞行时就遭到了地面攻击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并且持续有说法称，地面部队可能在正式发现残骸之前就试图到达了残骸所在地。2018/19 年度收到的关于这一主题的新信息有限，这些信息如下。

256. 某些新信息与 Wren Mast-Ingle 所述内容有关。还记得，Mast-Ingle 告诉威廉姆斯，1961 年 9 月，当他在铜带采矿公司工作时，他正从 Luanshya 前往 Bancroft，这时他听到了一架飞机坠毁的消息。在到达残骸时，他说他看到飞机机身上有一排孔。车辆到达后几分钟，他回忆说这些车是比黑色更浅的吉普车或路虎，6 至 8 名身穿战斗迷彩服的武装白人男子命令他离开此地。独立小组注意到，共有 6 名新证人报告称在 9 月 18 日凌晨去到了坠机现场(Chimema、Custon Chipoya、Lumiya Chipoya、Mast-Ingle、Mwebe 和 Mwansa)，并表示他们注意到现场有警察或士兵，或两者皆有。目击证人 Mpinganjira 和 Chisanga 也都报告说，在飞机坠毁几个小时后，看到两辆路虎以极快的速度驶向坠毁地点。关于 Mast-Ingle 所述内容，特别是关于该信息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确定部分机身“被子弹喷射”情况，独立小组评估这一信息的证明价值为“弱”。

257. 在 2018 年对 Mast-Ingle 进行的新采访中，Picard 表示，Mast-Ingle 详细阐述了他看到的男子所穿的迷彩服的样子，称制服“不同”，“看起来更像是迷彩战斗服，而不是简单的绿色卡其布衣服”，并且戴着“滑稽的遮耳帽”。根据 Picard 进行的研究，只有部署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军队和伞兵团戴灌木迷彩遮耳帽，身

穿的外套名为“猎豹”，头戴的帽子名为“Bigard”。他推测，以前在 Faulques 领导下，在阿尔及利亚效力的法国雇佣兵可能是那些在恩多拉留下迷彩服的人。

258. Rosez 在陈述中也提到在恩多拉看到了独特的迷彩服。他说，1962 年初，他的朋友，恩多拉警察局的大卫·罗伯特·斯蒂尔督查向他展示了 1961 年 9 月一群雇佣兵留在恩多拉的迷彩服，警察把这些迷彩服作为“纪念品”保留起来。Rosez 说，他在恩多拉警察局看到的迷彩服与 1950 年代印度支那法国外国军团穿的制服相似。

259. 上述两个消息来源的信息都是 2018/19 年度收到的，并分别表示，坠机后在恩多拉及其附近看到了与众不同的迷彩服。其中一个消息来源 Mast-Ingle 证实了他早先的说法，即在正式发现坠机地点之前，有穿着这些迷彩服的武装人员出现在坠机现场。目前，这一信息未经证实，但可能与本报告定稿时收到的与地面攻击假设有关的其他信息有关系，下文将进一步讨论。

B. 人为破坏：Celeste 行动/南非海洋研究所

260. 2018/19 年度期间收到了关于这一主题的重要信息，拓展了独立小组分析的信息，具体如下所示。

261. 1990 年代末，在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工作中，一些文件引起了公众的注意，这些文件提到了一场据称要破坏 SE-BDY 航班的阴谋。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看到的这些文件提到，飞机上安放了一枚炸弹，并在飞机即将降落前不久引爆，导致飞机坠毁。这些文件的信头上据信写着名为“南非海洋研究所”（海研所）的一个神秘组织，指的是其特工策划和执行“Celeste 行动”，目的是“干掉”哈马舍尔德。

262. 根据 Christelle Terreblanche 对这些文件的初步发现和威廉姆斯所做的研究，哈马舍尔德委员会在 2013 年审查了这些文件。他们对这些文件的可信度持谨慎态度，但指出这些文件作为人为破坏活动的次要证据可能具有一些价值，但还须经法证审查。2015 和 2017 年的报告无法最终评估南非海洋研究所文件的证明价值，因为南非在查阅文件或搜寻方面没有提供其他协助。尽管对所谓的“Celeste 行动”和南非海洋研究所可行性表示担忧，但在 2017 年，我指出，核实作为 SE-BDY 坠毁原因假设的这一所谓破坏行为仍然至关重要。

263. 2018/19 年度，《哈马舍尔德悬案》电影团队提供了关于南非海洋研究所文件的信息，该团队还安排采访了 Alexander Jones，Jones 称，他以前是一名南非士兵，被南非海洋研究所以准军事身份雇用。《哈马舍尔德悬案》电影团队为瑞典独立任用人员与 Jones 的会面提供了便利，以便他可以在 2019 年为达格·哈马舍尔德调查的目的接受采访。我注意到《哈马舍尔德悬案》电影中提出的其他问题不在本次调查的范围之内，因此我不会提及，也不会做出任何评估。

264. Jones 在采访中表示，他在 16 或 17 岁时进入南非部队服兵役，并在情报部门接受培训。他觉得服兵役很光荣，因为他一直想当兵。1989 年至 1990 年高中毕业时，Jones 在《公民》报上看到一则广告，称有一个组织正在寻找军事行动人

员。他认为南非国防部队没有前途，所以出于经济原因，他对这则广告很感兴趣。他和一些朋友联系了这个广告，被请去参加在约翰内斯堡市中心旧卡尔顿中心举行的一次会议，当时那里是一家酒店。他在会上得知该组织名为南非海洋研究所，简称海研所。他说，海研所似乎遵循的是海军传统(他说，加入后更确认了这一事实，因为海研所将 Wemmer Pan 一个与约翰内斯堡南非海军相连的一个卫星海军基地用作行动基地)。

265. Jones 说，在 1990 年前后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招募会上，向申请人介绍了两个人，一个人名为 Keith Maxwell，看起来 40 多或 50 岁左右，介绍时称他为“准将”，另一个资浅人员，未介绍他的名字。他们向潜在的新招募人员播放了海研所的“宣传”或营销材料。其中包括三组大照片，介绍时对申请人说，这些照片展示了海研所最成功的几次行动，其中涉及暗杀一名高级别人员。当时既没有进一步介绍此次行动，也没有进一步介绍这一高级别人员。Jones 明白，这些照片是作为宣传展示给新招募人员的，向他们说明海研所作为一个作战准军事组织的行事理念，让新招募人员看到既有行动又能赚钱。

266. 在展示行动照片时，Maxwell 准将显得非常自豪，并明确表示，他参与了成功暗杀这名高级官员的具体行动。他说，此次行动发生在 1960 年的刚果，但 Jones 不了解任何具体意义，也不知道这名官员可能是谁。在其中一张照片中，三个人站在被烧毁的树旁。Jones 认为，照片中一人是年轻时的 Maxwell，还有一人后来他知道被称为“雪松上尉”，第三个人他不认识。第二张照片是被烧毁森林中的树木。Jones 说，第三张照片很明显是一张飞机坠毁照片，上面有烧焦的残骸，其中还看到一个螺旋桨。他说这是他唯一一次看到这些照片。

267. Jones 说，招募会结束后，他加入海研所，进入了一个名为三角洲部队的行动组。每组人都不知道其他组人员的身份，每个人履行不同的行动职能，包括行政和财务。Jones 因受过情报训练当上了中尉，属于该机构中的一名下级军官。雪松是一名美国人，是三角洲部队的指挥官，当时他的年龄与 Maxwell 差不多，40 多岁或 50 岁左右。

268. Jones 对 Maxwell 的印象是，他穿着纳尔逊时代的英式海军制服，上有肩章，身配一把剑。Jones 表示，该组织自负，对英国海军传统狂热。至于其他高级官员，Jones 见过一次“高级准将 Wagner”，他当时已经 70 多岁或 80 高龄了，他的排名比 Maxwell 高。Maxwell 当时是一名准将，但后来开始自称“高级准将”。Jones 知道的其他高级官员包括 Pike 少校和一个姓 Dalglish 的人。他知道有 Malan 这个名字，但只听说过这个名字。

269. Jones 表示，他从来不知道海研所的钱从哪来，但他认为，海研所的钱是从外面来的，因为 Maxwell 自己从来没有钱。他指出，一些重要会议会有一两个外国人参加，包括法国人和英国人(他通过口音确定)。他不知道海研所是否与其他国家政府有关联。

270. 海研所成员们都知道海研所的标志，这个标志整个组织都是一样的。海研所的所有文件和徽章上都有这个标志。Jones 认为，海研所很长一段时间一直使用同一个标志，没变过。

271. Jones 表示，他因想法发生变化于 1993 年离开了海研所。他谨澄清，他离开海研所时和刚加入时相比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很难有人离开后再谈起该组织，他能站出来对他本人和家人来说都是做出了巨大的个人牺牲。

272. Jones 表示，他之前没有跟威廉姆斯或记者谈过他这些经历。如果他说的真的是，这意味着匿名来源对威廉姆斯所作的陈述(他声称他以前是海研所成员，并谈到海研所和/或 Maxwell 的某些类似属性)与 Jones 的陈述相一致。我将在下面讨论关于 Jones 访谈的结论。

273. 海研所似乎与加丹加有关联。例如，海研所 1980 年代后来的文件中提到过雇佣兵“疯狂的”Mike Hoare。有说法称，海研所还是南非和/或英国特种部队的一部分或与之有联系，其人员包括前罗德西亚士兵。

274. 《哈马舍尔德悬案》电影团队从之前未分析的 Maxwell 回忆录版本中又找到了关于海研所的其他新资料。独立小组 2015 年审查了记者 De Wet Potgieter 提供给威廉姆斯的 Maxwell 回忆录的打印版，Potgieter 从 Maxwell 本人那里拿到了这些回忆录。这些回忆录题为《我的人生故事》，始于 1964 年。一个新进展是，2019 年，我从《哈马舍尔德悬案》电影团队收到了 Maxwell 回忆录手写版摘录，与打印版不同的是，这份手写版回忆录专门提到了哈马舍尔德。我获悉，《哈马舍尔德悬案》电影团队从海研所一名被谋杀的前成员家人那里拿到了这些手写版回忆录。这篇题为《1961 年的约翰内斯堡》的摘录旨在用以下言语讨论杀害哈马舍尔德的阴谋。

275. 《1961 年的约翰内斯堡》提供了关于 1961 年加丹加局势的某些历史资料，并指出哈马舍尔德来加丹加有双重目的，一是为了安排刚果和加丹加的和平谈判，二是就扩大联合国空军的可能力量与罗德西亚和/或南非领导人谈判。“南非海洋研究所”“三角洲部队”的高级军官齐聚一堂，“代理准将 Wagman”表示，将“干掉”哈马舍尔德、Conor Cruise O'Brien 和 Sean McKeown 这三个大人物，不会出现“卢蒙巴事件重演”的问题。Wagman 建议军官们，“9 月中旬至 9 月底”，当哈马舍尔德在刚果时，他们的部队将对(联刚行动)Rumpunch 行动发起反击，同时，“刚果红”将“对付这三个人”。然后场景变成了一个被雇来在泛航 DC-6 上放置炸弹物资的人。该男子在轮舱边缘和襟翼盖上钻孔并放置电触点，然后在轮舱本身放置其他螺钉，以固定含有爆炸材料、电池和雷管的橡胶带。电线用腻子粘住，用螺丝拧到电触点上。技术人员后来看着飞机起飞，但设备出现故障，未对飞机造成损坏。

276. 然后场景又转到军官们讨论破坏行动失败。Wagman 表示担忧的是，炸弹可能会在晚些时候与飞机上的平民乘客一起爆炸，并对军官们说：“先生们，现在是凌晨 2 点半了，大家回去睡觉吧，我们将在早上，或者更确切地说，在今天上午晚些时候再想想办法。”这时，有人递给 Wagman 一张纸，上面写着设备在即

将抵达恩多拉时爆炸，并且“刚果红已完成任务”。没有迹象表明放置装置的“技术员”是海研所刚果红成员；相反，前面叙述中提到的这名技术人员为该行为得到了一笔具体款项。因此，从文本中无法看出刚果红是如何“完成任务”的。

277. 关于威廉姆斯分析的海研所文件，内部存在一些不一致之处。例如，日期为“1960年7月12日”的函件说，“我们得到可靠的权威信息，联合国组织想把它贪婪的爪子伸向[加丹加省]”，加丹加当局“同意让你使用一些私人飞机，包括两架军用‘Fouga’喷气式飞机”。但1960年7月12日，Fouga喷气式飞机距离交付加丹加还有六个多月的时间。另一份1961年7月15日的文件说，分裂发生在1960年7月11日，海研所特工应做好准备，既与巴鲁巴人作战，又与联刚行动部队作战。

278. 威廉姆斯分析的所谓“Celeste行动”文件与后来的海研所行动文件，包括那些与1981年塞舌尔所谓的“铁砧行动”未遂政变有关的文件有相似之处，据称Maxwell和Dalglish、Jerry Puren、Mike Hoare(1961年曾在刚果的前雇佣兵)以及其他人都参与了政变。使用相同的信头并提及同样的单位和人员名称，包括“刚果红”。从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记录来看，该委员会本身对海研所组织的存在感到满意，至少在1990年代是这样。

279. 《哈马舍尔德悬案》电影中的多个消息来源声称核证某些“Celeste行动”文件是Maxwell手写的。从未经培训的分析来看，字迹似乎与《哈马舍尔德悬案》电影团队提供给我的手写回忆录相似。如果这是Maxwell在“Celeste行动”文件中的笔迹，并且这些文件真的在1961年写下的(内容不一定属实)，那么Maxwell肯定在1961年就加入了海研所，根据各种资料进行估算，那么当时他肯定还不到20岁。另一种明显的可能性，如果笔迹是Maxwell的，那就是他亲手伪造的，可能是为了以后的“宣传”或营销目的，比如他自己作为雇佣兵的经历以及在海研所的经历。

280.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英国广播公司1998年8月20日的一篇文章，联合王国外交和联邦事务部在回应英国参与海研所的指控时表示，“联合王国的情报人员不会到处撞人。在冷战期间的这个时候，苏联的错误信息相当猖獗，所以[这些信件]可能是他们发出的。”威廉姆斯指出，中央情报局同一天也否认参与其中。但目前尚不清楚这两个国家是否就这些文件、海研所、Keith Maxwell以及更广泛的针对SE-BDY航班的破坏阴谋进行了内部调查。重要的是，联合王国和美国在调查过程中还应搜寻有关Maxwell、海研所的记录以及在这一说法公布后可能在1998年就已经进行的内部调查结果。

281. 2018/19年度收到的有关海研所的新资料很重要。我读了Jones与瑞典独立任用人员2019年面谈记录，并收到了瑞典独立任用人员的评估报告。我还无法核实Jones所陈述内容的所有方面，但他提供的信息详细，而且显然前后一致，因此根据目前的资料，似乎有理由相信1980年代和1990年代确实存在海研所组织。但由于我没有看到向Jones展示的据称的照片，事实上Jones三十年前也只是看到过一次这些照片，而且缺少有关这些照片的细节，我无法评估这些照片的内容是否属实。关于Maxwell回忆录手写版，我无法核实其中所包含内容的真实

性，但其中的内容、风格、得到该回忆录的方式以及文件来源似乎都表明这些回忆录可能是 Maxwell 写的。要证实这一点，还需要进一步的证据和专家分析。

282. 收到了新资料并未提高关于所谓的“Celeste 行动”这一信息的证明价值。然而，在确定海研所作为一个组织可能实际存在时，强调仍然有必要核实或排除与“Celeste 行动”有关的假设。为此需要南非配合以拿到原始文件，以便对它们进行法证分析。即使只有复印件，也可以对它们进行分析——包括对照 Maxwell 的手写回忆录——以了解字体、笔迹和其他事项。除了“Celeste 行动”文件之外，南非以及可能还包括联合王国和/或美国的情报信息很可能有助于确定 1961 年是否存在海研所以及其是否开展了任何行动。这些都是必须跟进的事项，以确定有关破坏活动的说法是否可予支持或排除。

四. 其他新资料

283. 本节分析会员国和个人提供的与坠机背景有关的新资料，但这些资料与坠机原因并无直接关系。这是这节资料与上一节资料的直接区别。将根据资料的性质和类型评估其证明价值，或讨论在可能进行的进一步调查范围中将其放在何处。

284. 如下文分析所示，了解了更多有关这一次主题的情况，最显著的是在有关时间活跃在该地区的外国情报人员人数以及与 1961 年的背景和前后事件有关的其他资料。这一点对于后续行动非常重要，因为它确定了可以在哪里找到其他关键资料，并往往能够确定会员国是否尚未充分披露重要记录。

285. 作为一个编辑问题，我注意到，在 2015 年独立小组报告中，在“官员和地方当局活动的新资料”一节下列入了“外国情报机构的报告”小节，2017 年，相关的小节讨论的是“地方官员和当局的行为”。本报告在以下标题下合并了对这些问题的讨论。

A. 地方当局和外国当局的行为

1. 外国情报机构

286. 1961 年外国情报机构和人员在该区域的存在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潜在信息来源，因为这些机构和人员的核心任务就是收集情报。2017 年报告指出，早期调查没有提及相关时间外国情报机构在刚果境内和周边地区的存在。然而，自 1961 年以来发表的官方和个人陈述表明，除了国内和国外的政治活动外，当时该地区还有大量外国情报、准军事和其他机构以及人员。它们没有作为潜在的信息库加以开发这一事实导致关键信息来源没有被利用。因此，必须从这个角度来看待近年来对这些机构和人员的审议，并以搜寻与达格·哈马舍尔德调查特别相关信息为目的。

287. 从 2015 年以来审查的信息并结合历史背景来看，比利时、法国、南非、俄罗斯联邦、联合王国和美国政府似乎都有可能掌握着 1961 年刚果境内和周围情报、准军事和其他机构和人员产生或交流的最相关、未披露的信息。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比利时和法国提供了机制，允许独立的高级别官员查阅这些档案，以

便在 2018/19 年度进行审查，从而生成了本报告中讨论的新资料。下文介绍了可能会在哪些其他类似档案中找到更多资料。

(a)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288. 由于历史原因，英国在 1961 年在刚果周围的非洲地区派驻了大量人员。作为找到相关信息的第一步，威廉姆斯 2011 年的工作分析了埃塞克斯大学保存的 Alport 勋爵的文件档案，其中有一份文件题为“Secret Report by Neil Ritchie, Appendix A to Alport to Sandys, Despatch No. 8, 25 September 1961”。Neil Ritchie 被证实是英国秘密情报局(军情六处)的特工，他在索尔兹伯里秘密工作，担任英国高级专员署一等秘书。Ritchie 是最终导致飞机坠毁的一系列事件的关键参与者，因为正是他与包括英国驻加丹加领事丹齐尔·邓内特和英国驻索尔兹伯里高级专员 Alport 勋爵在内的其他人一起，安排了哈马舍尔德于 1961 年 9 月在恩多拉与冲伯的会晤，SE-BDY 坠毁时哈马舍尔德及其随行人员正是在赶往恩多拉会晤的路上。

289. 在筹备会议的过程中，Ritchie 乘坐两架小型飞机去加丹加的基普西接冲伯和邓内特，他们在基普西与伊丽莎白维尔的矿业联盟助理总监 Henry Fortemps 碰面，将他们一起越过国界带到了恩多拉。正如下面所进一步讨论的，Ritchie 与矿业联盟官员密切协调，利用其设施、设备和员工。他还与英国和罗德西亚其他官员以及个人进行协调。早期的调查不知道英国外交和情报官员在多大范围内参与制定了哈马舍尔德/冲伯的会议安排，据我所知，也没有官方详细说明这些官员是如何与自封的加丹加国家元首和矿业联盟协调的，矿业联盟资助加丹加分裂并支付与联合国发生激烈冲突的雇佣兵的工资。

290. 2017 年，联合王国外交档案提供的新资料似乎间接提到了 Ritchie。2017 年的报告提到，1961 年 9 月 17 日 Alport 勋爵给英联邦关系事务部的至少三封信中都提到了 Neil Ritchie。研究人员 Simensen 提请我注意 1961 年 10 月 16 日 Duncan Sandys 给 Alport 勋爵的信，要求勋爵“特别感谢 Ritchie 先生在艰难的停火谈判中表现出的主动性和良好的判断力”。2017 年审查的其他文件提到了军情五处在中部非洲的安全联络官 David Driver，他也驻扎在索尔兹伯里。

291. 许多私人消息来源也提到 Ritchie 当时在该地区。邓内特本人在其回忆录《前往加丹加等地》中提到了 Ritchie。Brian Unwin 在 2017 年接受 Picard 的采访中也提到了 Ritchie，也证实 Ritchie 是军情六处的特工，称他在安排冲伯和哈马舍尔德会面方面的工作做得“非常出色”。

292. 1961 年 9 月，Gordon Hunt 在罗德西亚精选信托基金工作，同时担任该地区各种利益的中间人。他在回忆录《加丹加热线》中提到的“我们在加丹加的人”据说是 Ritchie。这些回忆录是 1969 年根据当时的信件和他的回忆写成的，独立小组 2015 年看过这些回忆录。根据 Hunt 自己的说法，他“在英国情报局接受过战争与和平方面的培训”，在英国政府驻加丹加的代表、商业利益集团、比利时政府、加丹加的外国雇佣兵、矿业联盟和罗德西亚政府的罗伊·韦伦斯基爵士之间

担任中间人。Picard 2017 年采访 Gordon Hunt 的儿子时，他儿子表示知道父亲曾是军情五处的特工。

293. Hunt 在回忆录中提到一条通讯线路“热线”，这条线路由矿业联盟和罗德西亚精选信托基金在加丹加和北罗德西亚之间运营，“为英国外交部、领事馆、红十字会和罗德西亚和尼亚萨兰联邦政府服务”，并且“在某一阶段是从加丹加获得信息的唯一手段”。Hunt 提到他自己在安排哈马舍尔德来恩多拉会见冲伯方面的作用，但他说，“一切都必须详细组织起来，责任落在‘我们在加丹加的人’的肩上。”根据 Ritchie 的报告和其他信息，这些提到“我们在加丹加的人”的作用，几乎可以肯定是对 Ritchie 身份的进一步确认。

294. 审议了 Picard 在 2018 年提供的矿业联盟档案材料后发现，在 1961 年 9 月 17 日至 19 日期间，英国外交、情报和商务人员都通过使用矿业联盟设施跨境相互沟通，与比利时和加丹加当局以及与联合国进行沟通。这些电报还指出，SEBDY 坠毁后，Ritchie 将于 9 月 19 日再次乘飞机返回(前一天离开)，从恩多拉接冲伯，并乘飞机将他带回基普西。

295. Picard 还采访了 Manfred “Freddy” Loeb, Loeb 是一名工程师，曾供职于 Traction et Électricité 和矿业联盟，他也证实了 Ritchie 的存在和发挥关键作用以及矿业联盟协助的通信的性质。Loeb 向 Picard 提供了一本他的回忆录《世纪旅者时光掠影》。在这本书中，Loeb 除其他外讨论了他 1961 年 9 月在加丹加的时光。关于他当时是如何来到加丹加的，他说联合国部队：

孤立了矿业联盟的通信，并试图颠覆冲伯。[所以]我打电话给 Traction Électricité 的董事总经理 Georges Landsberg 帮我，四小时后，我发现自己坐上了从巴黎飞往约翰内斯堡的航班。在英国外交代表 Neil Ritchie 的陪同下，我跳上一架小飞机前往基特韦，前往位于靠近加丹加边界北罗德西亚的一个村庄，那里是源自雅多维尔的电线(220 千伏安)的终点。我被安排住在电力公司董事、[Gordon] Hunt 上校的家里，他直接来到 Burma，是一个真正的人物。

.....

当时，最常用的通讯工具是电传。伊丽莎白维尔和比利时之间的通讯中断了，所以我必须得想办法恢复与伊丽莎白维尔的矿业联盟总部的通讯。

296. Loeb 接着说：

我们能够通过电话和电传与位于伊丽莎白维尔的矿业联盟的领导进行沟通，然后通过使用北罗德西亚的公共网络将信息传送给布鲁塞尔的领导。这个通讯渠道被用来将来自冲伯加丹加政府(没有任何其他通讯手段)的电传传送到位于利奥波德维尔的联合国总部。

因此，我有可能跟踪联合国达格·哈马舍尔德和莫伊塞·冲伯之间谈判的进展情况，几天后谈判结束，决定暂时结束武装冲突。所有这些电传都是经我手传递的，但我在冲伯的要求下把这些电传交给了他。这样就不会留下这些电传的踪迹了。

Neil Ritchie 和我一起关注这些事件的演变，他很可能向他的伦敦当局汇报情况。我们一起得知，哈马舍尔德计划前往恩多拉，与加丹加总统敲定停火协议。9月17日晚上，我们坐在基特韦分部，一直坐到深夜，等待他到来的消息。哈马舍尔德本来打算下榻皇后大厦，但第二天早上，一份电传告诉我们他的飞机“出事了”。

Ritchie 和我离开基特韦前往伊丽莎白维尔，去找英国领事丹齐尔·邓内特评估局势，并将哈马舍尔德的最新文件交给他。冲伯接受了停火，我回到科卢韦齐完成我在 Luilu 的任务。

.....

[后来]矿业联盟在科卢韦齐执行部门代表 Fontainas 要求我返回基特韦，重新启动9月投入使用的通信系统。

297. 根据 Loeb 的回忆录和 Picard 的访谈，除其他外，他表示他意识到这起“事故”不是偶然事件，他的回忆让人有理由相信，Ritchie 与英国当局之间建立了额外通信，哈马舍尔德最后通信的一些记录交给了邓内特。

298. 显然，美国也知道有 Loeb 这个人以及他与联合王国和矿业联盟的互动。Picard 注意到，美国国务院 1961 年 9 月 29 日驻布鲁塞尔大使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一份文件(2017 年解密)证实 Freddy Loeb 是一个在德国出生的比利时人，居住在基特韦，是韦伦斯基和 Munongo 的中间人，进一步指出“Loeb 是支持[矿业联盟]的英国利益代理人，据报他有 500 万英镑可支配，用于资助武器采购等，以支持加丹加的分裂活动。我的消息来源称 Loeb 做事非常有效。”

299. Ritchie 和 Driver 并不是相关时间在该地区的仅有的两位英国情报官员。Daphne Park，在相关期间是为军情六处工作的最资深女性，被秘密派驻利奥波德维尔担任一等秘书。Park 女士和其他人一样，在 1959 年至 1962 年间以这一身份在刚果开展工作，这是有案可查的。在利奥波德维尔，Park 得到了 John de St Jorre 和 Hugo Herbert-Jones 等军情六处其他官员的支助。Park 女士本人以及那些官员和其他人也公开提到过她与中央情报局官员进行协调。

300. 根据其他人的叙述，根据威廉姆斯对联刚行动负责人 Sture Linner 的采访，中央情报局和军情六处的官员都在飞机坠毁前一周在利奥波德维尔 Linner 别墅的一个活动上见过哈马舍尔德。在相关时间被公开提到一直是驻扎在北罗德西亚或南罗德西亚或刚果的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其他特工包括后来担任罗德西亚联邦情报和安全局局长的 Basil (Bob) de Quehen，据报，他积极促成罗德西亚联邦情报和安全局与加丹加和南非的情报和安全部门之间建立联系。

301. 在 2019 年加拿大独立任用人员提供的新资料中，1961 年 9 月 25 日加拿大外部事务驻伦敦代表与 Boothby(据悉是指时任外交部非洲司司长 Basil Boothby)之间的信件往来中，据说 Boothby 在会议期间认同英国在加丹加的政策“不断受到犹豫不决的影响。与矿业联盟有关联利益的 Waterhouse 上校和坦噶尼喀特有限公司的压力可能是被秘密施加的”。虽然联合王国坚决否认与哈马舍尔德之死

有关的任何说法，但显然承认英国商业利益对加丹加政策的影响是值得进一步调查的一个重要领域，特别是考虑到矿业联盟等其他相关商业利益在加丹加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302. 1961年9月20日新西兰驻伦敦高级专员在给惠灵顿外交部长的电报中指出，英联邦关系事务部向高级专员出示了一份“9月18日 Landsdowne 会见哈马舍尔德的报告”。鉴于哈马舍尔德在9月18日已经不在人世，这个日期肯定是错的，或者指的是 Landsdowne 勋爵报告本身的日期。无论如何，调查人员似乎没有看到这份报告，而报告肯定提到的是哈马舍尔德在世时与他举行的最后几次会议之一。邓内特在他的回忆录中(如上所述)以一种相关的方式说，他“接到指示，要前往基普西，护送冲伯去恩多拉，冲伯将在恩多拉与哈马舍尔德会面”。但谁给他下的指示尚不明确；鉴于 Ritchie 的报告载于 Alport 的文件中，而且这两名英国人以及邓内特和 Landsdowne 在哈马舍尔德去世前后会过面，因此，应向联合国王国索要 1961年9月18日左右的 Landsdowne 报告及任何相关报告。

(b) 美利坚合众国

303. 关于与美国有关的信息，如上所述，Southall、Abram、Doyle 和其他人提供的信息表明，1961年相关地区的美国安全、情报和国防事务很活跃。哈马舍尔德委员会和独立小组注意到，研究与情报活动有关政府活动的美国参议院特别委员会(丘奇委员会)1975/76年度关于涉嫌暗杀外国领导人阴谋的中期报告(为方便起见，同一委员会下的该报告和相关报告研究将统称为丘奇委员会报告)可能具有相关性。2018/19年度，我已注意到这些报告的调查结果和相关信息的各个方面。结果显示，1961年，刚果及其周边地区有大量美国情报人员。

304. 根据丘奇委员会关于涉嫌暗杀外国领导人阴谋报告的引言，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告诉“一名在刚果共和国利奥波德维尔的中央情报局站长，‘在高层’，‘干掉’卢蒙巴‘是中央情报局秘密行动的’一个紧迫的首要目标”。报告继续说，“不久之后，中央情报局的秘密部门策划了暗杀卢蒙巴的阴谋。该阴谋进展到了中央情报局向刚果运送了专门用于暗杀的致命物质和工具”。但这一阴谋最终没有实施。

305. 时任中央情报局刚果站站长的 Larry Devlin 在自传中证实了丘奇委员会报告中的信息，包括他受命暗杀帕特里斯·卢蒙巴。其他中央情报局官员向 Devlin 提供支助；从丘奇委员会报告、他的自传、官方记录和其他来源的资料可以看出，这一时期他在刚果管理着大量的特工和敌方的合作者。中央情报局官员特别提到的人员包括：Bill Jeffers、Howard Imbrey、Sydney Gottlieb(中央情报局科学家，化名“Joseph Braun”，把用来暗杀卢蒙巴的毒药带给了 Devlin)；David W. Doyle(上文提到的中央情报局在伊丽莎白维尔基地的领导，在他的回忆录《真正的男人和叛徒》中也是如此披露的)、Justin O'Donnell(他被派往刚果，化名为“Michael Mulroney”)、代号为“QJWIN”的第三国特工(1960年11月在秘密掩护下被派往刚果，由“Mulroney”管理)、“WIROGUE”(也是在秘密掩护下于1960年12月被派往刚果的第三国特工)以及其他多个被招募来的特工和线人。Devlin 还表示，他直接与加丹加的外国雇佣兵合作，包括 Mike Hoare 和 Bob Denard，中央情报

局(1961年后)为这些雇佣兵的地面行动提供空中支持。使用的名字还包括上面没有提到的代号和假名;例如,Devlin本人在丘奇委员会被称为“Victor Hedgman”,在中央情报局许多跟刚果有关的记录中被叫作“Guthman”。

306. 丘奇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就与卢蒙巴有关而言)没有超出1961年1月暗杀卢蒙巴的范围;因此,1961年以后几个月提及QJWIN和WIROGUE的次数有限。但随着2017和2018年根据《约翰·肯尼迪总统暗杀事件记录集法》(1992年)解密的记录,进一步的相关资料浮出了水面。我对于威廉姆斯提请我注意这一信息表示感谢。新发布的记录包括以前未公开的与QJWIN和WIROGUE相关的文件。他们说,QJWIN在完成一个“一次性任务”后于1960年12月离开了刚果,但WIROGUE留在利奥波德维尔并在刚果站稳脚跟,他曾接受小武器、拆毁和“医疗免疫”方面的培训,为他的“新行动任务”做准备(为此他接受了整容手术)。文件显示,他和QJWIN最初住在同一家酒店,WIROGUE不知道QJWIN也是中央情报局特工,还曾试图招募QJWIN加入他的“执行队”。

307. 根据这些记录,1961年1月下旬,位于利奥波德维尔(Devlin)的中央情报局站接到授权,负责安排WIROGUE参加飞行课程,并驾驶中央情报局站的飞机,该飞机的注册名为“YQCLAM”。到了3月份,WIROGUE被任命为刚果空军的顾问,到了4月份,他开始教刚果飞行员飞行。奉华盛顿特区的指示,Devlin要求WIROGUE建立一个空中情报单位。WIROGUE于1961年7月初离开布拉柴维尔,被带到华盛顿特区与中央情报局非洲司司长Bronson Tweedy会面。WIROGUE拿到了新文件和资金;随后,他乘坐军用飞机飞往西德的法兰克福,他的合同于9月8日终止,但他再次返回刚果。他从法兰克福飞往布拉柴维尔,于1961年9月22日抵达,就在哈马舍尔德死后几天,与加丹加空军的Dornier DO-28飞机和Jan Van Risseghem同时抵达。然后,他于当天进入刚果,抵达利奥波德维尔。后来他继续参与中央情报局的工作。

308. 中央情报局文件中也有关于其他国家情报官员的信息。例如,1961年11月12日,一个在刚果活动的西德人驾驶一架DO-27飞机在恩多洛降落,这是供军方使用的利奥波德维尔第二大机场,这个西德人的中央情报局代号是STAHL,真名是Wolf Meister。STAHL被捕,但WIROGUE把他救了出来。

309. 根据《约翰·肯尼迪总统暗杀事件记录集法》最近解密的文件中有大量关于WIROGUE和QJWIN的资料,这些信息尚未在其他地方发布;其中还有与刚果有关的新信息,里面谈到中央情报局情报人员、合同任务的招募人员和其他代码项目(包括一个专注于飞行员和飞机,代码为“WICLAM”的项目)。其中一些材料涉及“ZRRIFLE”,ZRRIFLE是中央情报局对包括暗杀在内的各种行动的隐语(在委婉语“执行行动能力”下提及)。但许多发布的文档都经过了大量的编辑。有时近200页的文件被大量编辑,以至于几乎所有的页面都是空白的,这使得它们的发布效用极其有限(例如,第104-10182-10003号记录的186页中只有3页没有被完全编辑,第104-10182-10004号记录的176页中只有8页没有被完全编辑,第104-10182-10002号记录的144页中只有8页没有被完全编辑)。在中央情报局

的所谓“杂项文件”中还有关于 WIROGUE、ZRRIFLE 和卢蒙巴的更多记录，这些文件已被确认与肯尼迪遇刺事件有关，但尚未公布，网上也没有介绍。

310. 关于 Devlin 对当时在此地的其他外国人员的观察，他说，“美国内部人士[认为]，法国人希望取代加丹加省的比利时人，以控制该省的巨大矿产财富”，据他说，(这也与法国独立任用人员的某些调查结果相一致)，加丹加省一些更有能力的雇佣兵军官来自法国。Devlin 还建议，“巴黎爱丽舍宫的法国非洲情报部门负责人 Jacques Foccart 向一些(雇佣兵)表示，如果他们愿意在加丹加为冲伯而战，就最终赦免他们”。

311. 此外，Devlin 还在 2004 年的一次会议上(“1960 年至 1961 年的刚果危机：关键口述历史会议”)中表示，“[美国]空军武官早在[SE-BDY]飞行员离开利奥波德维尔之前就与[SE-BDY]飞行员有联系”。如果情况属实，那么进一步搜寻该空军武官的记录可能会发现更多相关资料，可能还能找到飞行期间的通信。

312. 如上所述，Gülstorff 在 2019 年提供了最新解密的中央情报局记录，显示美国在 1961 年年中意识到 Cassart、Loeb 和 Dornier 之间的联系，这也暗示了加丹加和矿业联盟之间的联系。1961 年 11 月 23 日的另一份《Caravel 联系报告》证实，中央情报局工作人员在办公室与一个名为“Caravel”的中央情报局特工“会面了一个小时，并讨论了以下内容：……d. CARAVEL 仍然没有收到‘我们在 Dornier 的人’的消息，但他指出(正如我们在阅读 ODACID 流量后得出的结论)，除了飞机合同的签字人，可能还有参与交付第一架飞机的德国技术人员的名字，可了解的信息少之又少。但 Caravel 并没有放弃这件事”。这表明中央情报局和国务院 1961 年在积极寻找与这次调查有关的信息，可能涉及向加丹加空军供应 Dornier 飞机。

(c) 德国

313. Gülstorff 还在 2019 年 7 月提供了有关 1961 年 9 月在刚果及其周边地区的德国情报人员的信息。根据中央情报局 1961 年 12 月初的一份报告，中央情报局从奥地利安全警察那里得到信息，一名 Hans Germani 是西德情报机构特工。同一份报告还引用了第二个消息来源，即美国陆军反情报部队，该机构也知道 Germani 是德国联邦情报局的人。此前，1961 年 1 月 10 日，美国中央情报局慕尼黑联络处局长向 EE 区和 NE 区的主管发出了一份电报，援引各种消息来源证实，1927 年 4 月 11 日出生在里雅斯特，居住在维也纳的 Hans Germani 是一名德国情报特工(中央情报局代码为“Uphill”)，秘密为《明镜周刊》工作。

314. 根据 1961 年 9 月 20 日西德驻索尔兹伯里大使馆给外交部的一份报告，Hans Germani 在记者身份的掩护下访问了伊丽莎白维尔，拍摄了联刚行动的干预和战斗情况。该报告指出，“刚刚从伊丽莎白维尔回来的 Germani 博士等电影摄制组一行人遇到了德国人 Bachmann(一个车库所有者)和 Lönne(来自杜塞尔多夫?)以及两名德国记者，一切进展得都很顺利，谁都不想离开。一个德国人[也]在利奥波德二号酒店工作。骚乱未造成德国人伤亡”。根据 Gülstorff 在后来 Lönne

采访基础上所做的进一步研究，1962年初之前，Germani 一直是在 Faulques 领导的雇佣军组织中作战的两名德国人之一。

315. 如果中央情报局 1961 年关于 Germani 的信息是正确的，那么这意味着西德情报机构在 SE-BDY 坠毁时在加丹加有一名特工。这表明，与 Germani 相关的记录，以及更广泛的记录，肯定是由西德当局创建的。如上所述，鉴于这一信息是在德国独立任用人员写完报告后于 2019 年 7 月收到的，因此没有机会向他提问。但我把此事标为一个潜在的后续问题。

316. “外国情报机构”主题领域仍有大量信息未公开。正如 2018/19 年度审查的新信息所显示的那样，这是某些会员国一直不愿披露记录的一个领域。我在结论部分还会谈到这一问题。

2. 搜寻与救援

317. 应该回顾的是，早期调查以来获得的信息已经确定，SE-BDY 的残骸可能早于罗德西亚当局 1961 年 9 月 18 日 15:00 左右正式宣布的时间前已被发现，当时据其失踪已经过去了大约 15 个小时。在 SE-BDY 航班本应降落近 10 小时后开始的搜寻工作将皇家罗德西亚空军部队 Canberras 从恩多拉派往南北两个方向，尽管已知 SE-BDY 航班是从西向东飞行，而且尽管有多个搜寻队，而且飞机残骸距预定目的地仅有约 10 英里的距离，但据称残骸在大约 5 个小时内都没有被发现。

318. 据称，找到飞机残骸花了 15 个小时部分原因是搜寻程序的延误，其中包括尽管 Marius van Wyk 在凌晨 3 点 30 分告诉机场主管 John “Red” Williams 本人该架飞机失踪时天空中有一道闪光，尽管索尔兹伯里的空中交通管制部门在凌晨 4 点 30 分表达了关切，但白天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开始搜寻，尽管一架由挪威机组人员组成的联合国飞机试图在早上 7 点 00 分协助搜寻，但他们被逮捕了。

319. 2017 年，联合王国提供了新资料，支持坠机地点在官方报告的时间 15 时 10 分之前被发现的结论。新资料包括 Alport 勋爵，Derek Riches 和 Unwin 提供的资料，声称飞机残骸在几小时前已被发现。

320. 在 2018/19 年度收到的新资料中，Rosez 在陈述中讨论了他对 1961 年 9 月 18 日事件的回忆。他说，当天 10 时 00 分左右，他听说 Fouga Magister 飞机用炸弹和机枪袭击了位于伊丽莎白维尔 Clair Manoir 的联刚行动总部(Conor Cruise O'Brien 当时待在那)。就在那时过后，所有加丹加人的射击突然停止。加丹加宪兵开始谈论在罗德西亚发生的什么事情，他听说哈马舍尔德的飞机在恩多拉附近坠毁了，他说他是通过“非洲塔姆”听过这一消息的，他说“非洲塔姆”的意思是长距离口口相传。下午，广播学院的电台和新加丹加电台播放了更多新闻，来自罗德西亚的个人传达了 SE-BDY 被击落的消息；很快新闻里又说，SE-BDY 是被一架加丹加空军飞机击落的。他说，很难确定各个广播电台在不同时区广播的确切时间。

321. 在 2018/19 年度审议的进一步新资料中(在 2017 年报告发表后于 2017 年 10 月收到), 联合王国的 Kenneth Wright 提供了一份签名陈述, 证明他和他的家人在 1961 年 9 月 18 日上午从恩多拉前往钦戈拉途中遇到了一起大型飞机坠毁事件。

322. Wright 说, 他在英国武装部队(皇家海军陆战队)服役, 当时正在休假探望他在赞比亚的父母, 他父亲在恩昌加铜矿工作。在恩多拉的一家酒店过夜后, 他们沿着一条通往基特韦的主干道出发, 他们原本打算在那里吃午饭。途中, 他们看到黑烟, 表明附近的灌木丛起火, 他们看到路边有许多人, 其中包括一名身穿非洲制服警察。他的父亲会讲流利的本巴语, 他和在场的其他人讨论了此事, 之后他们一起向起火地点走去。到达现场后, 明显看出是一架大型飞机坠毁起火, 但没有任何幸存者的迹象, 也看不到任何完好无损的人体。Wright 表示, 这显然不是灌木丛起火, 因为火势仅限在一个小范围内, 还能闻到人肉被烧焦的味道。在场的人表示, 飞机是在前一天晚上坠毁的, Wright 的家人认为当地的紧急服务人员已经到场, 所以他们离开了现场。

323. 与近年来收到的其他信息一样, 2018/19 年度 Rosez 和 Wright 提供的新信息为以下假设提供了进一步佐证: 即坠机是在官方公布的 1961 年 9 月 18 日大约 15 时 00 分的时间之前被发现的。虽然这并不直接涉及坠机的原因, 但这一点很重要, 因为它对坠机后各国政府马上行为提出了质疑, 并让人们不禁要问: 为什么没有报告更早的坠机发现时间。

B. 其他事项

1. 所谓的机械故障: 气体泄漏

324. 美国的独立任用人员说, 在其国家档案馆发现了一份单一的回应文件。这是海军情报局 1961 年 9 月 18 日的一份资料报告, 题目是“刚果: 哈马舍尔德飞机失事的可能原因”(麦克唐纳报告)。其中载有驻利奥波德维尔的美国海军武官的意见, 认为故障维修可能在秘书长的飞机失事中发挥了作用。海军武官相应指出, “回到利奥波德维尔后, 进行了修理, 包括更换了发动机。进行这种特殊修理时, 必须小心确保没有溢流, 或者在取出发动机后清理溢流。看来这并不是在利奥工作的联合国机组人员所做的, 结果是, 当接近恩多拉放下起落架时, 产生的火花导致起落架舱擦火, 产生烟雾”, 而且“据机组组长称, 这种类型的事故对于 DC-6 飞机来说并不少见”。

325. 1961 年联合国委员会的报告在第 91 段总结说, 委员会“对收到的证据表示满意, 即在伊丽莎白维尔发生的枪击对 SE-BDY 造成的损坏很小, 飞机于[1961 年]9 月 17 日从利奥波德维尔起飞之前已经得到适当修复”。就这一发现, 我征求了 Sven Hammarberg 的专家意见, 他是事故调查员和前战斗机飞行员, 以前曾向哈马舍尔德委员会、独立小组和知名人士提供过协助。

326. Hammarberg 表示, 他“没有发现任何信息支持《麦克唐纳报告》中描述的理论。所有现有报告……都一致认为: 9 月 17 日上午, DC-6B ‘Albertina’ 被一颗小口径子弹射中, 轻微受损; 当天下午在利奥波德维尔对发动机进行了彻底检查和修理, 更换了凹陷的排气管; 飞机在最后起飞前处于正常使用状态”。他注意

到瑞典民航局报告中有一段具体写到：“飞行结束后在利奥波德维尔降落后，Wilhelmsson 立即向地面工作人员报告说，飞机在从伊丽莎白维尔起飞时遭到了射击。因此，泛航的斯堪的纳维亚地勤人员对飞机进行了仔细的外部检查，查看飞机是否被击中。6 到 8 个机械师和助理机械师参与了这项工作。检查发现左翼内侧发动机(第二台发动机)右部被子弹击中，子弹在发动机壳体上留下一个直径约 8-10 毫米的洞。子弹继续穿过扰流板，击中了一根排气管，导致排气管变形。更换了排气管。但未对发动机壳体和机翼上的弹孔采取任何行动。未发现飞机有其他损坏”。

327. Hammarberg 审查了瑞典民航局采访机械师情况，他本人还咨询了 DC-6B 飞机的另外两名专家，机长 Lars Gibson(DC-6 飞机飞行员)和 Lennart Johansson(DC-6/6B 飞机飞行工程师)。这两位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士都表示，在 SE-BDY 启程前往恩多拉之前肯定没有更换过发动机，这与《麦克唐纳报告》中的建议相左。Johansson 指出，更换受损的排气管这项修复工作可以很快完成，不会影响燃油系统，也不会造成任何燃油泄漏，这也与《麦克唐纳报告》中的建议相左。

328. 《麦克唐纳报告》中信息的可能来源尚不清楚。瑞典民航局报告和访谈中详细说明了谁进行了相关维修工作，Hammarberg 审查了这些内容以及其他资料后指出，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美国人员在利奥波德维尔机场向联合国或泛航地勤人员提供了支助。除了上面提到的机械师之外，也没有提到任何其他机械师。

329. 关于《麦克唐纳报告》提出的“这类事故对于 DC-6 飞机来说并不少见”的建议，在审查了航空安全网数据库后，Hammarberg 得出结论，“DC-6、DC-6A、DC-6B、R6D-1(美国海军版)或 C-118(美国空军版)没有一起事故已知是由发动机着火或起落架外壳着火引起的”。

330. 我审议了《麦克唐纳报告》，Hammarberg 认为的不可能像《麦克唐纳报告》中所说的那样更换了 SE-BDY 航班 DC-6 飞机所使用的发动机的专家意见，以前显然没有提出过关于这种“气体泄漏”问题的信息以及美国的独立任用人员提出“我们没有找到任何与这些意见相关的额外信息”的事实。因此，我认为《麦克唐纳报告》中的新信息无证据价值。

2. 有待进一步查证的其他信息

331. 2018/19 年度收到的其他信息表明，还有多条线索可能需要继续进行调查。本标题下的信息可能与坠机的背景或各种假设之一有关；之所以列入本报告，是因为这些信息是在 2019 年 7 月本报告马上就要定稿前收到的，因此没有足够的时间采取进一步的后续行动，或是更早收到的，但没有资源进行额外查证。

332. 瑞典独立任用人员指出，瑞典军事档案中有一份来自加丹加总统总理府的文件，由一名瑞典前联刚行动情报官员存放在此。这份文件指出，文件由总统令的笔记组成，载有 1961 年 12 月 5 日至 21 日期间军事和政治事件的日常报告。由于它是为“第二蓝皮书”而创建的，这表明可能存在更早的这样一本书，其中可能包含 1961 年 9 月或 10 月的记录。我注意到，在我检查过的记录中，还没有

出现加丹加对 SE-BDY 坠机反应的记录，但如果有这样的记录，显然里面可能会有重要信息。

333. 在同一份瑞典军事档案中，还有一份似乎是 1961 年 12 月比利时驻伊丽莎白维尔领事馆的官方日记，其中载有这段时期在伊丽莎白维尔和加丹加发生的军事和其他事件。出于同样的原因，如果 1961 年 9 月或 10 月比利时档案馆中有类似的文件，其中就可能有更多相关信息。

334. 大家可能还记得，2017 年报告分析了英国当局试图影响早期调查结果的说法。在 2019 年 7 月编写本报告期间收到的相关信息中，津巴布韦独立任用人员提供了关于这一主题的信息，因为这涉及到罗德西亚当局。其中包括 1961 年 9 月 20 日罗德西亚总理办公室(Black)给内政部(Marsh)的信函，提交人在信函中讨论了一个 Steadman 先生的责任，他发表了一份声明，称“哈罗德·朱利安中士是坠机事件的唯一幸存者，当据报飞机在恩多拉机场上空飞行时，哈马舍尔德先生已发出某些指示”。Steadman 说，他去了坠机现场，然后去了朱利安正在接受治疗的医院，朱利安向 Glyn 医生和 Gibson 医生做了如下陈述：“他说，在飞机飞越恩多拉时，哈马舍尔德先生改变了主意，决定去加丹加。他说，离开恩多拉后不久，飞机上发生了一次大爆炸，随后是一系列小爆炸，飞机被迫着陆。幸存者通过安全舱门逃脱”。随后，Archer 上校打电话“警告 Glyn 医生[哈罗德·朱利安的主治医生]，他们医院的工作人员任何人都不能谈论”与朱利安的陈述有关内容，即他说他看到了天空中的火花，而且提交人“找到 Glyn 医生和 Gibson 医生，警告他们从安全角度考虑，并要求他们确保医院工作人员不要谈论此事”。这一信息表明，不仅北罗德西亚当局试图不让公众了解可能出现了哪些外部干扰，而且最初向朱利安询问时，他可能就 SE-BDY 航班最后时刻的情况说了更多的话，这显然是一个需要进一步考虑的问题。

335. 在另一封暗示罗德西亚当局试图施加影响的信件中，总理兼外交事务办公室(Parry)1962 年 3 月 8 日给罗德西亚和尼日利亚尼亚萨兰事务高级专员(Bowles)的信中说，“我对联合国的报告持适度乐观态度。我们已竭力与联合国专员发展关系，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给我的印象都是通情达理的”。Parry 给总理的一份相同日期的类似备忘录也讨论了向 1961 年委员会隐瞒证据的问题。此外，法律部长(Greenfield)1961 年 11 月 29 日致韦伦斯基总理的一份备忘录中说，罗德西亚人希望通过寻求让一名联合国人员加入罗德西亚调查委员会来避免成立一个联合国委员会。同一日期的手写便条上写着“总理同意”。

336. 此外，1961 年 11 月 29 日北罗德西亚运输部长 Kenneth Towsey 给 Cox 少校的一封信中指出，罗德西亚当局应该“在不放弃任何重要立场的情况下，尽可能多地表现出我们通情达理，愿意合作”。1961 年 12 月 14 日 Cox 少校给交通部长长的答复指出，从罗德西亚的角度来看，“调查委员会……当然是那些参与事故的人所拥有的最佳保障”。尚不清楚对罗德西亚人而言“参与事故”是什么意思。

337. 此外，1961 年 12 月 14 日英联邦关系事务部给英国驻索尔兹伯里高级专员的电报称，被任命为 1961 年委员会五名成员之一的是塞拉利昂法官 S.B. Jones，他“非常英国化，是英国的好朋友”。

338. 2018/19 年度, (退役的)Vervoort Karel 少将向我发送了信息和一份“案例分析”, 他说他有丰富的飞行经验(包括驾驶 Fouga 飞机的经验), (退役的)Marc Hallemans 也说, 他有丰富的飞行经验, 而且跟 Van Risseghem 很熟。他们表示, 他们认为坠机是由瑞典机组人员经验不足、疲劳驾驶导致的飞行员失误造成的事故, 从技术上讲, Fouga 飞机是不可能击落 SE-BDY 的。Karel 和 Hallemans 在信中讨论了早期调查所考虑的证据, 重新提出了混淆恩多洛/恩多拉问题(之前讨论过), 讨论了他们所知道的其他飞行事故, 并对决定准备和执行 SE-BDY 飞行任务提出了批评。他们的结论是, 此次坠机事件是“可控飞行撞地”坠机事件的典型例子。Karel 和 Hallemans 称, 他们的意见符合“三份官方事故报告、后来 1993 年 Bengt Rosio 的补充报告和联合国自己聘请的飞机事故专家[Sven] Hammarberg 的报告”的结论, 而与此相反的分析是“更没有经验的法学家和在非洲没有飞行经验的门外汉提交毫无根据的报告”的结果。

339. 这些材料我是在较晚的时候收到的, 严格说来似乎并不包含新的信息。该材料中提到的基本事实不准确——例如, 机组人员缺乏经验, 早期调查结论都认为坠机是由飞行员失误造成的(当时三个调查中的两个未能得出结论), 而且未能解释与飞行员失误结果不符的关键证据。该材料认为当前调查倾向于发现任何特定假设已被证实这一观点也是不正确的。尽管如此, 但我依然认为必须承认该材料丰富了调查资料。正如本报告和 2017 年报告所讨论的那样, 有必要继续将飞行员失误这一可能假设作为积极考虑的假设之一, 直到我们能够确定所有相关信息都已找到为止。与其他提交材料一样, 我建议可以将其放入联合国档案方便公开查阅, 以便可以独立审议。

340. 另一个信息是 2018 年发表并提供给我的一篇文章, 作者是 Matthew Stevenson 和 Joseph Majerle, Majerle 也是一名飞行员。这篇文章指出, SE-BDY 可能是故意下降到较低的高度, 以避免遭到另一架飞机的攻击, 或者是由于飞机当时已经着火。他们提出这一假设依据的是 Majerle 与驾驶坠机飞机同类飞机的飞行员在研究和讨论此类飞机坠毁过程中获得的经验, 他们得出的结论是, 如果 SE-BDY 的飞行员无意中将飞机降落到地面上, 而不是被迫降落, 那么飞机将会在所有碎片落下之前飞行距离远远超过 150 码。他们还认为, 尽管 SE-BDY 当时距离恩多拉机场几乎只有 10 英里(以估计速度飞行大约需要 3 分钟), 但在早期的调查中没有解释为什么襟翼放出, 起落架落下, 并认为这表明飞机试图在抵达恩多拉机场之前降落。同样, 为了完整起见, 我把这篇文章所进行的讨论列入了本文; 这篇文件关于早期调查所考虑的与残骸跨度和速度有关的计算是否是错误的论点需要进一步分析核证。

341. 其他的更多信息还包括, 2019 年 6 月和 7 月, 一个要求匿名的消息来源向我提供了关于地面攻击假设的信息。该消息来源根据大量辅助材料提交了一份实质性材料。材料提交人称, 早期调查没有通过对照可用地面武器范围评估考虑可能的攻击地点, 没能充分评估地面攻击的可能性。他假设, 一个地面攻击小组部署在仪表进近路线上, 配备装有曳光弹的车载机枪, 就可能从他确定的两个可能的地面位置向 SE-BDY 飞机射击。他假设这导致飞行员分心, 并可能迫使他们进

行规避操作，使他们下降到低位并坠毁。他进一步指出，鉴于泛航的政策是通过杰普森手册得出的仪表进近方法，SE-BDY 也是如此，地面攻击小组应该能够估算出 SE-BDY 的进近。他指出，虽然按照本手册，飞行员可以自行决定最后转弯的直径，但地面攻击只要标出两点位置便能覆盖整个射击区域。关于武器，他说，当时在该地区可获得的勃朗宁 M2 机枪、M1919 机枪或类似机枪能够覆盖飞机在离地面约 1 750 英尺的高度飞行的必要范围，并提供了这些数字的计算结果。

342. 这一匿名消息来源还指出，地面攻击小组可能使用了无线电干扰来掩盖其活动，并指出 Mufulira 警察局的日志记录了坠机当晚的无线电问题。Mufulira 的同一警察还记录了“一名哨兵在凌晨 02 时 20 分左右听到一架轻型双引擎飞机在 Makombo 上空飞行”，这是这样一架飞机存在但未经解释的证据。如果当天晚上有无线电干扰问题，那么预计恩多拉的美国空军飞机有一些这方面的记录，这是一个可以核实的问题。匿名消息来源进一步指出，支持他的理论的现有证据包括：朱利安中士关于“天空中有火花”的讨论和哈马舍尔德提出飞机应返航的明显指示；雷达天线罩、窗框、座椅和领航舱上的洞(由 Bo Virving 发现)。关于雷达天线罩和窗框上可能的弹孔，他说，证人 Els 上尉在罗德西亚调查委员会作证时陈述，并未说明飞机这些部件的损坏可能是由接近其有效射程的炮弹击中飞机造成的；但这需要军事弹道学专家进行核证。

343. 早期调查将地面攻击列为一种假设，部分原因是已经确定联刚行动飞机在 1961 年遭到过地面炮火袭击；事实上，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哈马舍尔德的 DC-6 飞机在最后一次飞行之前肯定在利奥波德维尔修理过。2019 年 6 月和 7 月收到的来文概述了提交人的理论，但我没有时间或资源对其进行深入分析。我认为这是一个可以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344. 2019 年 6 月，我在撰写本报告时收到了 Anna Roosevelt 提交的最后一份材料，其中讨论了她在相关时间刚果境内和周边地区参与杀害非洲领导人个人的研究情况。这些材料的主旨是，比利时官员正在实施一项杀害非洲领导人并解散他们的政治运动的计划，目的是维持比利时对刚果至少部分地区的控制。在此过程中，她说，他们攻打联合国并暗杀了哈马舍尔德，这是在面对联刚行动军事对抗的情况下，试图维护加丹加矿业分裂及其在刚果其他地方的军事和行政控制所做努力的一部分。

345. Roosevelt 概述了比利时与加丹加分裂以及与其军事结构的形成和支持密切相关，并为她所说的这一情况提供了大量参考研究。这些关联包括 Vandewalle、Brassine、Clemens、Huyghe、Crevecoeur、Weber 和 Van Risseghem 等比利时人员，她说这些人都是根据比利时政府的指示行事，不是雇佣兵。Roosevelt 的论点是，多起谋杀案案例(包括个人和群体案例)在机制上都是相关联的，目的都是为了维持比利时的控制这一核心目标。所提供的某些信息涉及比利时对刚果境内的某些行为或运动(如针对卢巴族的行为)的被指称责任，而这一责任与本调查没有直接关系，但类似行为人和装备可能涉嫌与本调查有关。

346. Roosevelt 称，Huyghe 可能参与了哈马舍尔德遇难一事，根据 Puren 的说法，1961 年 9 月 17 日午夜至 18 日凌晨，他与另一名比利时高级军官和他所管理

的分裂分子航空作战中队的几名成员在恩多拉。由于 Huyghe 曾与英国白人至上殖民地、南非和北罗德西亚的军事安全部门和外交官密切合作，因此，在哈马舍尔德的飞机坠毁当天，他和他的飞行员被允许自由进入恩多拉机场，包括其塔楼。她还说，鉴于除掉哈马舍尔德对于分裂的重要性，Vandewalle 很可能是当天也在恩多拉的未具名高级别军官之一。我注意到，没有证据独立证实 Huyghe 在那一天是否在恩多拉，但也没有证据证实他当天不在。

347. Roosevelt 表示，联合国相关文件受到控制，尚未解密。正如我上面所提到的，我可以不受限制地查阅所有联合国档案，还得到了联合国公正专业且乐于助人的工作人员的协助。关于联刚行动档案的解密问题，本报告也对此进行了讨论。正如我也指出的那样，我得到了比利时独立任用人员的通力合作，他似乎可以广泛查阅安全、情报和国防档案。Roosevelt 的论点是，在加丹加效力的比利时籍人员的行为归因于比利时政府。在目前的调查过程中，这一材料的相关性仅体现在这一信息可能与坠机原因有直接关系，但坠机原因仍有待确定。尽管如此，我还是提请比利时考虑这个问题。

五. 结果和结论

348. 大会第 72/252 号决议授权我在可能情况下，从已经进行的调查中得出结论。虽然可以得出某些结论，但没有证据表明，这些结论本身就可以确定造成这一灾难事件的一个或多个原因。与此同时，一些会员国似乎尚未披露相关的重要信息，这些会员国尚未充分参与大会概述的进程。因此，本报告，包括其结论，只是寻求全面真相过程的一部分。我认为相关材料仍未披露；因此，应根据进一步的资料可能揭示的信息，对本报告所载结论加以调整。

349. 2017 年报告讨论了为什么可以说早期调查没有对所有证据进行公正合理的评估。早期调查在没有全面重申这些理由的情况下，过度依赖最初罗德西亚调查的某些方面，所谓“非洲”证人的证词几乎没有考虑，只是为了得出“飞行员失误”这一调查结果这个明显属于预先设定的目标，以及试图影响 1961 年委员会。由于这些问题，早期调查没有充分考虑到：在 SE-BDY 接近恩多拉时可能有人看到空中不止一架飞机；飞机触地之前已着火；飞机可能受到了攻击或外部干扰。本报告正文酌情提到了早期调查的缺点可能如何影响了某些信息的分析方式，或者在哪些地方需要重新考虑任何此类信息。

350. 自 2017 年报告以来大约两年时间里，出现的新资料主要集中在与这一死难事件有关的三个领域，即：(a) 空中或地面袭击或其他外来威胁；(b) 人为破坏；(c) 地方当局和外国当局的行为(2017 年还收到了关于“人为因素”的资料，但在本授权任务下没有审查关于这一主题的实质性信息)。在下述类别下审议了关于这些主题的结论性意见。

A. 导致坠机的一个或多个原因

351. 要了解坠机原因，或许最好将坠机原因分为两大类：一类涉及某种形式的干扰（“外部干扰”系指空中或地面袭击，或其他外部威胁；“内部干扰”指人为破坏），一类不涉及干扰。

1. 外部干扰：依然有理由认为外来袭击或威胁是坠机的原因

352. 在 2017 年报告中，我注意到，1961 年委员会没有排除 SE-BDY 受到空袭或干扰的可能性，独立小组指出，不能完全排除存在“未知飞机”的可能性。2017 年报告根据现有资料、新信息和专家意见得出的结论是，似乎有理由认为，来自飞机外部的敌对行动是导致飞机坠毁的一个原因，无论是直接袭击导致坠机，还是飞行员感觉受到威胁而瞬间分散注意力，飞行过低导致坠机。我在 2019 年保留这一结论，原因如下。

353. 当时的情况可能是飞机受到了攻击。哈马舍尔德将于当晚前往恩多拉的事实事先已广为人知。许多目击者称，他们看到空中有不止一架飞机，另一架可能是喷气式飞机，SE-BDY 坠毁前已着火，SE-BDY 遭到枪击或被另一架飞机以其他方式进犯。此外，有资源和飞行员能够对 SE-BDY 发动这样的行动。事实上，调查的每个持续阶段都发现了更多早期调查所掩盖或以其他方式没有考虑到的此类问题的更多证据。近年来开展的工作也更加清楚地表明，事件的背景是当时此地正在发生激烈武装冲突，多方卷入了冲突，包括联合国。由于存在各种限制，包括夜间飞行没有雷达，以前认为对 SE-BDY 发动袭击很难，但就现有材料来看，发动袭击还是有可能的。

354. 此外，现在可以明显看出，试图影响早期调查，使其得出预先设定的“飞行员失误”结论的国家政府不止一个，而在随后这些年，某些会员国表示不愿提供完整的记录和档案。这些问题似乎已经确定并具有相关性。

355. 关于外部干扰是否是坠机原因的问题，以下几类信息仍在积极考虑之中。

(a) 目击者提供的信息

356. 为了回顾目击者在这一问题上提供的证据，罗德西亚调查局听取了 7 名目击者看到第二或第三架飞机的证据，罗德西亚侦查委员会听取了至少 6 名这类目击者的证词。各方普遍批评这些证人的证词不客观，这可能与其预先设定的偏见有关。1961 年委员会也听到至少 6 名目击者谈到有不止一架飞机，至少 12 名目击者谈到空中有火花(或类似光亮)的东西。

357. 自 1961 年委员会工作结束以来，共采访了 12 名新目击者。2015 年，独立小组听到 5 名新目击者说看到不止一架飞机，还有 7 名目击者称“大飞机”坠毁前着火。独立小组列出了其评估目击者证词所依据的相关客观因素，评估发现，其中一些证词具有证明价值，有一些则没有。这些因素包括在不利的夜间情况下视觉识别的可靠性和正确性、是否有机会进行观察、人的记忆随时间减退、不一致和矛盾之处等等。坠机事件唯一的一个短暂生还者，哈罗德·朱利安提供的证词也显示飞机在靠近恩多拉时遇到威胁或袭击，可能涉及突然爆炸。这一证据在

2018/19 年度间得到了加强，津巴布韦提供的信息显示，北罗德西亚当局试图扼杀朱利安的这些言论，使其不被公之于众。

358. 1961 年 9 月 18 日美国大使 Gullion 的至少两份实地报告也指出，飞机“可能已被击落”，并讨论了“空中有火花”的报告。这些信件被立即传给了白宫、国防部长、陆军部长、海军部长、空军部长和中央情报局。

359. 正如 2017 年报告所指出的，有大量目击者证据倾向于证明，在 SE-BDY 接近恩多拉时空中有不止一架飞机，在 SE-BDY 以外出现的飞机是一架喷气式飞机，SE-BDY 触地前起火，SE-BDY 可能被一架或多架飞机枪击或以其他方式进犯。2018/19 年度从会员国情报、安全和国防档案中收到的信息并没有减损这一证据，但也没有确切地支持这一假设。然而，正如上文和下文进一步讨论的那样，并非所有会员国都全面审查了其档案。

(b) 声称无意中听到了有关袭击的通信

360. 独立小组认定 Charles Southall 和 Paul Abram 的说的证明价值为“中”；这两人都说，他们在 1961 年 9 月 17 日午夜至 18 日凌晨听到了截获的无线电通话或看到了通话记录，据他们认为，内容涉及对 SE-BDY 的袭击导致其坠机。继 2018/19 年度取得的进展之后，我评估了他们的部分说法，我现在认为他们的说法具有很强的证明价值，即美国当时正在监控无线电通信，并且美国很可能创建了相关记录。

361. Abram 的说法，如果是真的，显然在这件事上是最重要的信息。多年来一直在要求美国提供排除或支持这些说法的信息。美国的答复在 2015 至 2017 年间发生了变化，2017 年，美国最终确认了 Abram 关于他作为拦截专家在克里特岛工作的服役记录的说法，但表示他 1961 年 9 月不在克里特岛。当 Abram 的说法与美国相左的地方 2017 至 2019 年期间要求美国进一步澄清时，美国又没有做出任何答复。2019 年，我获悉 Abram 已经去世。如前所述，相关事项包括，Abram 的说法前后一致，并且长期以来一直都是这样说的；他在 2017 年 7 月的最后重申是他在相关日期确实是在克里特岛；他是拥有美国空军接触机密文件许可的语音侦听协议专家的这一专长和职责得到了确认；在他在世期间，这些信息没有受到进一步质疑。

362. Southall 的说法在这件事上同样具有重要意义。跟 Abram 一样，在 Southall 2016 年去世前，美国也有很多机会反驳或澄清他的说法。2019 年收到的新信息与他以前的陈述以及哈马舍尔德委员会审查的书面函件历史前后一致并提供了进一步佐证。再一次正如瑞典独立任用人员指出的那样，“Southall 实际上几十年来一直在试图传递这一信息”。相关情况还包括 Southall 在美国海军中的职位无可争议，作为海军预备役指挥官退休；他的专长是“处理和报告”军官；1961 年，他被派往尼科西亚附近的一个海军通信设施；他的说法前后一致，至少在 1967 年至 2013 年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如此。

363. 关于截获的其他通信，2017 年报告中分析的信息显示，1961 年，联合王国和美国当时确实是从罗德西亚当局获得截获的联刚行动的敏感通信。根据 2019

年从津巴布韦收到的关于这类活动的新信息，加强了 2017 年报告在这方面达成的结论。

364. SE-BDY 航班可能在最后时刻以相关但不同的方式进行了沟通，如果这一沟通记录存在也将会非常重要。2019 年分析的信息突显出恩多拉空中交通管制在飞机最后时刻所做的记录不全，使人不禁要问，为什么 Martin 销毁了他在 SE-BDY 飞机未能着陆约 36 小时后所做的简短而不完整的声明所依据的笔记，当时他知道飞机已经坠毁。

365. 包括 Martin 本人在内的多名证人提到，美国飞机可能一直在监控无线电通信，并可能从恩多拉与 SE-BDY 进行了通信。拦截无线电通信本身并不会导致飞机坠毁。然而，拦截的这些通信可能会显示关键时刻发生了什么。如果部署在不同地点的各方参与了空中或地面袭击或进行了其他外部干扰，那么他们很可能通过无线电或类似手段进行了沟通。

366. 最后，关于这一主题还想说的是，多个信息来源均提到通信遭偷听问题，此前这一问题一直未被曝光。这些信息来源既包括私人个人，也包括为政府安全、情报和国防来源工作的人。考虑到多个会员国当时正在监控和拦截联合国通信，而且当晚恩多拉有先进的通信设备，注意到恩多拉空中交通管制记录竟离奇得不完整等其他情况，因此，找出在那个死难之夜发生的任何其他通信痕迹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会员国在这一特定领域的不合作随时间推移可能会让人做出掩盖事情全部真相的决定。

(c) 发动外部袭击的能力

367. 如上所述，早期调查基本上只将 Fouga Magister 喷气式飞机视为攻击 SE-BDY 的候选飞机，并根据加丹加空军少校 Delin 的证词和操作限制有效地排除了这一可能性。罗德西亚侦查委员会发现“他自愿提供证据……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他的证据”，但 Delin 是加丹加雇佣兵，涉嫌共谋参与了这一死难事件。Delin 的叙述也有不一致的地方，包括加丹加空军当时有多少飞行员，而且后来发现他本人实际上并不是一名飞行员。

368. 2017 和 2019 年的新资料使得评估认为，可用于发动袭击的机场或跑道、飞行员和飞机有很多。证人证词和分析的文件表明，曾用沙子和煤油为道路照明从而使飞机能在夜间降落，而且当时联合国在刚果的大多数飞行以及空对空袭击都是夜间进行的。这些证词和文件还显示，加丹加当时有多架飞机，包括 Fouga Magister 喷气式飞机、De Havilland Dove 或 Dornier DO-27 或 DO-28 飞机等具有进攻能力的飞机，1961 年 9 月，加丹加空军将这些飞机用于了发动袭击。

369. 2018/19 年度获得了有关这一主题的重要新信息。新信息进一步加强了 2017 年达成的结论，使得对证据进行权衡后发现，1961 年 9 月加丹加空军只有一架 Fouga Magister 飞机仍可使用。新信息证实加丹加有一些雇佣兵，包括法国雇佣兵军官，他们在此可能得到了法国政府的暗中或明确授权。多名独立任用人员和个人提供的信息还证实，加丹加空军在 1961 年 9 月使用了配备武器的 Dornier

DO-28 和 Dove 飞机，并在加丹加、刚果共和国、安哥拉和北罗德西亚使用了多个国际机场。

370. Rosez 提供的目击者信息称，矿业联盟在其工厂制造武器供加丹加空军使用，这是之前指称事件的一个肯定证据。

371. 关于 Van Risseghem，他的飞行日志摘录(仍有待进一步分析)显示，1961 年 6 月至 9 月期间，他与多名副驾驶一起为加丹加空军驾驶 Dove、Piper、DC-3、Fouga Magister 和 Dornier DO-28 飞机在整个加丹加、刚果共和国和北罗德西亚各地飞行。Coppens 称 Van Risseghem 承认击落了 SE-BDY；他向其他人否认这一点，并表示他不想因他在刚果所做的事情而遇到麻烦。注意到分析的信息(包括在会员国安全和情报档案中找到的信息)有相互矛盾之处，因此，尚不能最终确定 Van Risseghem 1961 年 9 月 17 日午夜至 18 日凌晨所在地。然而，他在 SE-BDY 坠毁后的几天内与包括中央情报局特工在内的一些相关人员同时出现在布拉柴维尔，也是需要进一步调查的问题。注意到他的血统、家族关系和在英国武装部队的服役记录，以及有信息显示美国认为他可能袭击了 SE-BDY，因此仍有必要继续研究这一问题。

372. 关于 Beukels 假设，2018 年德凯穆拉里亚提供的新信息介绍了他 1993 年与 Bob Denard 会面情况。这证实了该假设的某些方面，但是，到了这个时候，不再提到“Beukels”本人了。此外，《哈马舍尔德悬案》电影团队所做的分析也表明，Beukels(或 Beuckels)不是加丹加空军的飞行员。

373. 2019 年对从会员国情报、安全和国防档案中找到的信息进行分析还发现，北罗德西亚部队在加丹加边界沿线集结，有时在加丹加境内集结，处于备战和随时战斗状态。在此方面，我再次指出，不能完全排除，也不能说，1961 年当晚空中没有另一架非加丹加飞机，这些飞机可能是皇家罗德西亚空军 18 架堪培拉喷气式战斗轰炸机、30 架吸血鬼喷气式战斗机轰炸机和 12 架轻型攻击轰炸机中的一架或多架。

374. 如上所述，关于 Fouga、De Havilland、Dornier 或其他飞机可能袭击了 SE-BDY 的资料单独看来被评估为证明价值为“弱”，但可能需将其与其他证据，包括证人证据一并加以考虑。此外，虽然实施攻击存在操作困难，但不一定要一击即中。第二架飞机对 SE-BDY 实施骚扰行动就可能足以导致坠机。但我重申，对外部攻击的任何分析都仍需谨慎。上述信息表明，另一架飞机或地面袭击有可能威胁或攻击了 SE-BDY，这意味着不能排除此类攻击或威胁的可能性。但在现阶段，这些信息不能为任何此类攻击的具体细节提供佐证。正如下面进一步讨论的，这就是为什么全面审议所有潜在可用信息仍然至关重要。

2. 内部干扰：目前无法断定人为破坏是否是坠机的原因

375. 自从早期调查以来对各种形式的人为破坏在坠机事件中可能发挥的作用做了审查。1961 年委员会注意到，SE-BDY 在利奥波德维尔地面停留时为其安排驻守的一名特别警卫不在位，这意味着不能排除有人未经许可接近飞机以达到破坏目的的可能性。

376. 独立小组认为，2015 年提供的以下两个说法的证明价值为“无”：一是 SE-BDY 在利奥波德维尔机场停机坪停留期间，驻利奥波德维尔的一个外国使馆(罗马尼亚)的工作人员参与在飞机上安放了一个爆炸装置；二是一名劫持者或“额外”乘客被偷运上了 SE-BDY。但独立小组和 2017 年报告都无法充分评估介绍“Celeste 行动”的海研所文件中概述的破坏说法，因为这些文件南非不允许查阅。

377. 在 2018/19 年度，我进一步寻求核实有关“Celeste 行动”的说法。在《哈马舍尔德悬案》电影团队的协助下，对据称是海研所的一名前成员进行了采访，此人声称海研所是一个运作正常的组织，而且他看到过与“Celeste 行动”有关的宣传材料。还分析了似乎是 Keith Maxwell 回忆录的进一步手写版本的文件。收到的新资料没有证明或反驳所谓的“Celeste 行动”，但强调仍然有必要核实或排除与“Celeste 行动”有关的假设。这需要南非的配合。此外，南非以及可能还包括联合王国和/或美国的情报信息可能有助于确定 1961 年是否存在海研所以及是否开展了任何行动。英国和美国的搜寻还必须包括搜寻有关 Maxwell、海研所的记录，以及在该说法 1998 年公布后可能就已经开展的内部调查结果。

378. 还需会员国进一步配合才能就人为破坏在坠机事件中的可能作用得出明确结论。需要分析“Celeste 行动”的原始文件，可能也需要询问证人，并协调一致地审查会员国的情报、安全和国防档案，以确定是否提到南非海洋研究所或“Celeste 行动”(除其他外，据称中央情报局牵涉其中)。令人感到遗憾的是，这一假设 2018/19 年度我无法排除或进一步验证。

3. 坠机仍有可能是飞行员失误造成的，不存在任何干扰

379. 正如 2017 年报告中指出的那样，必须注意到，坠机有可能是简单的飞行员失误造成的。尽管机组人员有在正常飞行条件范围内工作的经验，但此类事故仍会发生。

380. 此前断言，可能出现了机械或其他重大故障，包括高度表出问题，空中交通管制向飞行员发送了错误的高度设定，或者使用了错误的着陆图。这些断言在 2013-2017 年期间均已被完全否定。因此，如果飞行未受到干扰，那么几乎可以肯定坠机完全是飞行员失误造成的，例如误读了高度表再加上出现视觉错误。

381. 虽然飞行员失误假设似乎是一个简单的解释，但在显然所有相关证据都没有披露的情况下做出没有干扰的结论在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在知道没有看到所有潜在物证的情况下得出任何结论性结果，既不明智也不负责任。事实上，许多未得到回答的证据，包括许多目击者的证据，都与飞行员失误这一结果相抵触。当然，并不是所有曾经存在过的证据都能够被审查，例如，飞机坠毁后机身约 80% 被烧毁。然而，会员国可能掌握的信息——例如指称侦听到的通话是否存在，是真是假，或者是否有任何安全或情报实体记录出现第二架飞机——对于回答目击者的看法仍然很有必要。如果对现有的所有证据进行了审查，结果是没有任何证据支持其他假设，那么就有理由推测，不管出于何种意图和目的，除了飞行员失误外，不可能有任何其他解释。但我们目前还没有到可以合理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的阶段。

B. 其他事项

1. 会员国的配合

382. 总得来说，2018/19 年度各会员国出色地参与了大会第 72/252 号决议概述的进程。这一点使人受到鼓舞，表明联合国会员国认为这一事项极其重要，因此，为了透明起见，在事实发生六十年后，可以重新考虑适用通常的信息保密和敏感性原则。

383. 收到请求的 14 个会员国中的大多数会员国遵守了这一要求的规定和精神，对其情报、安全和国防档案进行了专门的内部审查。我认为已经开展的工作可以说是圆满完成，是在探究这一死难事件真相方面迈出了建设性一步，使得在以下等方面发现和披露了新的相关信息：会员国可能截获相关通信；武装部队对秘书长的飞机发动可能攻击的能力；该地区有外国准军事人员和情报人员以及与 1961 年的背景和前后事件有关的其他信息。

384. 必须特别感谢任命了真正可以说是独立的高级别官员，并为他们有条不紊地全面搜寻资料，包括在保密资料中进行搜寻提供必要许可和合作的那些会员国。我向所有会员国表示感谢，但尤其要感谢比利时、法国、瑞典和津巴布韦的独立任用人员开展了大量深入的工作。这些会员国审查并提供了信息，披露的这些信息一度可能被视为不利于这些国家的利益，特别是考虑到相关时期包括非殖民化在内的历史背景。我还要特别感谢加拿大、德国、葡萄牙和赞比亚的独立任用人员所做的工作。尽管总体上要求它们搜寻的内容涉及的潜在材料更少，但这些会员国也以同样的方式参与了要求它们进行的进程，并在其高级别独立官员进行专门搜寻之后又提供了重要信息。

385. 尽管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但还不能说在所有会员国都已进行了彻底搜寻。某些会员国没有对问询作出实质性答复，或者似乎推断其情报、安全和国防档案中没有“相关”信息，因为这些不是其法律框架允许查阅或披露的普通档案。正如我在我在定义哪些信息可被视为“相关”时指出的那样，这个问题必须从广义的、非排他性的意义上来解释，而不是从技术或法律角度来解释。因此，一条信息不会因为比如现行法律或其他框架不要求或不允许披露，就认为这是一条不“相关”信息。

386. 关于我谨建议与之进一步接触的会员国，我注意到以下几点。南非于 2019 年 5 月任命了独立人员，这比我最初提出请求晚了大约 15 个月，也比其他独立任用人员提交报告的截止日期晚。但这是积极的一步，我对此表示感谢。尽管我一直认为南非很可能掌握相关信息，但南非未提供任何信息。

387. 联合国也于 2019 年 5 月任命了独立任用人员，这比我最初提出请求晚了约 15 个月，也比其他独立任用人员提交报告的截止日期晚了约 15 个月。但这是一个积极的步骤，对此我表示感谢。2019 年 6 月收到联合国独立任用人员的一封信，其中确认，他坚信英国政府掌握的所有载有与这次调查有关信息的文件都已按照之前收到的请求被完全找到并已提交。我认为，期望一个月时间足以完成对所要求性质的广泛性内容进行全面审查是不公平的，而且承认内部审查是在

可用时间范围内查阅了尽可能多的范围。我认为，调查向独立任用人员提出的详细要求和问题以及我的报告中概述的要求和问题可作为今后审议的沃土。尽管联合王国被认定很有可能掌握着相关信息，尽管我指出了可能在哪些领域找到这些信息，但英国没有提供任何新的文件或其他信息，也没有对我提出的详细问题作出答复。但截至 2019 年，联合王国似乎愿意进一步参与这一过程，这一点值得表扬。

388. 关于美国，我很高兴美国 2018 年任命了独立任用人员。2019 年 4 月，我获悉，前几年在国防部、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等一些政府机构中进行了全面搜寻；其他的搜寻请求据说正在进行中，并且事实上已经扩大到涵盖更多的美国情报机构。虽然这代表继续参与这一过程，但也应指出，对于一些具体的问题和请求，美国没有提供任何材料或做进一步澄清。尽管美国被认定极有可能掌握着相关信息，尽管我在通信中指出了可能在哪些具体领域会发现此类信息，但除了本报告所述的一份报告外，美国没有提供任何其他信息。令人备受鼓舞的是，2019 年，美国将搜寻范围扩大到了涵盖美国更多的情报机构，这一努力值得肯定。

389. 2019 年，联合王国和美国都再次表明立场，即它们各自都在前几年进行了全面搜寻。但通过已经提到的几个具体例子可以看出，情况未必如此。这些例子包括联合王国说它没有与军情六处特工 Ritchie 有关的资料，或美国称它没有参与 1961 年向加丹加供应 Fouga Magister 喷气式飞机的记录，没有配备精密通信设备的美国飞机 1961 年 9 月 17 日在恩多拉的任何记录，也没有任何 Abram 的服役记录。当向这些会员国提交独立核实这些事项的文件时，2017 年，它们的进一步搜寻导致承认存在相关记录。这些例子强化了我们所获得的经验，即在有足够的知识、权限和资源以定向方式进行搜寻时，重要的信息还是能够被挖掘出来。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再次分别敦促两国进一步更深入地进行搜寻。

390. 关于俄罗斯联邦，我很感激地获悉，该国在情报、安全和国防档案中进行了搜寻，但没有任命独立任用人员，搜寻信息的细节也没有具体说明。虽然我面前没有确切的资料表明前苏联作为当时该地区的一个重要角色具体了解所涉事件，但为了完整性和一致性，根据所要求的框架与俄罗斯联邦一道进行全面彻底的审查将非常有用。

2. 肯定存在更多相关资料

391. 在审查相关资料和显示在具体和有限条件下哪些地方极有可能存在额外资料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现有记录显示，几乎可以肯定，某些会员国的情报、安全和国防档案中仍有关于这一死难事件的未披露资料。鉴于多年来潜在新资料的出现方式，今后仍有可能找到更多资料。2017 年，我注意到，有些可能存在的相关资料早就应该无条件、无保留地披露，但会员国的情报、安全和国防机构或部门迄今一直不予披露。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并不是所有会员国——特别是那些最有可能掌握相关资料的会员国——都进行了无条件、无保留的披露，还不能说各国已完全履行 2017 年报告中所述的举证责任。

392. 过去两年也对会员国掌握的情报、安全和国防资料有了更多了解。例如，正如本报告所分析的那样，中央情报局的记录显示，中央情报局知道并可能参与了向加丹加提供武器，包括知道向加丹加空军提供飞机的 Cassart 和协调与英国情报部门、矿业联盟和罗德西亚官员沟通的 Loeb。中央情报局也知道一名特工参与或知晓 Dornier 飞机的供应情况并与他有联系。例如，分析的其他文件显示，中央情报局特工试图为刚果的“执行队”留住特工，并为那里的行动安排了一架中央情报局飞机和飞行课程。我注意到这些资料都不是美国的独立任用人员提供给我的。相反，这些资料是私人研究人员在不相关的事情(例如，有关约翰·肯尼迪总统记录的解密)之后因这些资料解密发现的。这有助于强调为什么独立任用人员必须是独立且高级别，他们应以全面方式履行任务，回应本调查提出的请求，使搜寻可以指向相关的主题领域。他们还必须有足够的资源，因为搜寻通常是在分散的大量纸质档案中手动查找。

393. 丘奇委员会的报告、Devlin 的自传和其他信息来源均指出，在 1960 至 1961 年期间，中央情报局多次在刚果境内及其周边地区，在未经美国政府授权或违反美国政府政策的情况下行事。这使得核实情报档案中的资料变得更加重要，因为其中很可能有与外交和政治档案中披露的不同的内容。需要进一步核实此类信息是因为 2000 年成立的比利时议会调查卢蒙巴遇刺事件委员会在其 2001 年的报告中表示，中央情报局已将自己在这一事件中的作用降至最低，丘奇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因依赖中央情报局官员的证词而被弱化。1960 年代初中央情报局在刚果的行动记录中可能存在哪些相关信息的问题，可能要等到能够审查与上述事项以及由此产生的任何相关线索有关的档案后才能解决。虽然丘奇委员会的报告提到了大量中央情报局电报，涵盖了相关期间刚果境内和周边地区的活动，但美国在本次调查中没有提交或提及此类中央情报局电报。我还注意到，2017 年报告的调查结果涉及与美国有关的事项，美国若能答复便有可能会发现更多相关资料，但美国没有做出答复。

394. 联合国王国方面的类似例子包括，尽管 2017 年承认有 Neil Ritchie 这个人，但没有披露与 Neil Ritchie 报告有关的信息，尽管肯定有这份报告，而且尽管有证据表明，他和其他英国情报官员在将哈马舍尔德及其随行带到恩多拉的事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Park 和 Ritchie 等英国情报人员的行踪是有记录可查的。英国也承认他们的行踪与英国外交部内部在同样的 12 个月期间审议和讨论“干掉”卢蒙巴一事相吻合(例如，1960 年 9 月 28 日外交部非洲司 Ross 和 Smith 之间的信件往来)。当时这类事件正在发生，但英国情报、安全和国防档案中没有发现任何可向本次调查披露的材料，这表明可能存在重要的其他资料。我还注意到，联合国王国未对 2017 年报告中有关联合国收到了截获的联合国通信或英国试图影响早期调查以得出“飞行员失误”这一结论做出回应；这些问题如果深究下去，肯定会发现更多重要资料。

395. 关于南非，其独立任用人员 2019 年没有报告其开展的实质性工作。与“Celeste 行动”有关问题的文件显然需要核查。其他各种问题也是如此，例如从

南非向加丹加运送人员和设备,关于南非雇佣兵和情报人员的资料,加丹加人员、比利时雇佣兵和南非实体(安全部门和准军事)之间的联系以及其他事项。

396. 德国的独立任用人员证实在情报、安全和国防档案中进行了不受限制的搜寻。德国的独立任用人员完成报告后,收到了关于所谓的德国联邦情报局特工 Hans Germani 和 Dornier 飞机飞行员 Heinrich Schäfer 的进一步信息,这可能是一个有待进一步调查的领域。

397. 可以明确指出,上述事项和其他事项需要某些会员国积极合作,以便充分搜寻其情报、安全和国防档案。此类调查的主要领域依然是截获的无线电通讯和有关记录(包括磁带、录音抄录、二级/三级信息及其他材料),尤其是 SE-BDY 航班发出的或 SE-BDY 与任何其他飞机、地面部队和空中交通控制部门之间可能有的通信。SE-BDY 最后几分钟的动态仍有待核证,这最后几分钟的动态很可能能够证明或排除某些假设。某些会员国,包括美国和联合王国,可能还有其他国家,在相关夜间在恩多拉部署了具有拦截能力的设备,在刚果和北罗德西亚派驻了情报人员,而且他们似乎已经截获了联合国的通信(似乎甚至包括秘书长本人的通信)的事实要求全面审查这些信息。任何这样的记录都是特别重要的,因为这些记录可能会补齐 SE-BDY 航班最后时刻记录显示不完整的空中交通管制日志。

398. 2017 年报告的结论是,似乎有理由认为外部攻击或威胁是造成坠机的原因,举证责任已转到会员国,以表明它们对其保管或掌握的记录和档案进行了全面审查。鉴于上述分析,2018/19 年度开展的工作没有提供推翻任何一项调查结果的理由,因为所述举证责任尚未完全履行。我谦卑地认为,各国应继续履行举证责任,直到大会满意地认为,涉及这一死难事件的一个或多个可能原因的相关资料已充分披露为止。

六. 建议和结论

A. 建议的依据

399. 2015 和 2017 年的工作是在其他人以前完成的不朽工作的基础上进行的,本授权任务是在联合国 2015 和 2017 年主持下开展的重要工作的延续。正如大会历次决议所表示的,大会的决定一直是继续寻找这一死难事件的真相。近年来约谈了新证人,审查了数万页原始记录,进行了法证检验,咨询了专家,并与会员国进行了接触。由于没有证明任何特定假设的议程,我们试图驱散阴谋论,抛弃未经证实的说法,专注可能真正发生的事情。

400. 从一开始,该事件就一直被阴谋论和混淆视听的说法包围。虽然许多主要会员国审查了其外交和政治领域的记录,但除了有限的例外情况,直到 2017 年,几乎没有一个国家提供情报、安全和国防部门的资料,尽管这些部门的档案有可能存在最相关信息。第 72/252 号决议要求会员国审查其档案中是否有这类信息,并建立了一个机制,让会员国审查自己的档案,但没有义务披露搜寻结果。该机制还提供了在认为适当的情况下达成保密安排的能力,以尊重各国的国内法律义务。事实上,各会员国已作出了临时适当安排,例如瑞典通过了内阁级决定,允

许其独立任用人员可不受限制地查阅机密材料，赞比亚和津巴布韦则通过各自的总统办公室作出了此类决定。

401. 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事实证明，大会指导的做法大体上是成功的，大多数会员国有意义地参与了一个在许多方面都属前所未有的进程。鉴于导致达格·哈马舍尔德秘书长及其一行遇难的飞机失事的情况也很独特，并且发生在一个早已改变的世界背景下，这一过程的确是可以预料的。因此，应当指出，当前进程并不为开创先例。相反，该进程旨在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一方面平衡会员国的合法安全利益，另一方面又能真正寻求便利披露那些几乎是 60 年前的、涉及年代久远事件和往昔世界的资料。

402. 尽管大会大多数会员国明确表示希望揭开不透明的面纱，但那些最有可能掌握重要信息的会员国却还没有披露信息。如果说有什么资料能向我们更多地揭示坠机原因，这些资料可能就在少数会员国的情报、安全和国防档案中。这些会员国仍有必要准确确认是否存在任何相关材料，或者如果不存在此类相关材料，则全面回答向其提出的问题，并明确无误地说明其搜寻的性质和效果。

403.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会员国在许多情况下对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几十年在中部非洲开展的活动进行了不同形式的内部调查，其中很多调查的结果很久以前就公开了，披露了曾经高度机密的事情，比如外国参与策划和实施暗杀外国领导人的活动。因此，这次调查并未开拓任何新领域，也未讨论可能属于机密的主题。

404. 如果现阶段可以说已找到并审查了所有可能的信息，那么才有可能以公正和冷静的方式给最有可能的假设下结论。但已经曝光的信息——既有通过坚定的个人的工作获得的信息，也有通过会员国的合作获得的这些信息——表明哪些地方肯定还有更多信息。此外，正如本报告所详述的，多个会员国对于它们以前表示不了解的某些问题改变了立场。某些会员国不愿意提供更多信息已经成为这个问题上的一个重要事实，但我认为，我们还未到可将不合作说成是有意隐瞒的地步。

B. 建议

405. 综上所述，我为今后工作提出四点建议。这些建议相互兼容，而且可以同时落实。

406. 首先我建议联合国任命一名独立人士继续按照知名人士的当前授权任务开展工作。通过独立任用人员所开展的工作使得 2018 和 2019 年发现了大量新信息。但并不是所有独立任用人员都能在规定的时间内或以要求他们的方式完成搜寻工作。此外，即使对于能够充分按照请求开展工作的独立任用人员来说，本报告中的有些信息可能也需要他们进一步交流、交叉核实或开展额外工作，其中可能包括根据新信息重新考虑已经开展的搜寻工作，独立任用人员之间的合作或推进其他调查线索。

407. 如果能够任命一名独立人士继续工作，我已标出需要采取后续行动的具体初步事项，包括：对瑞典独立任用人员提供的照片进行弹道检查，这些照片似乎

显示看起来属于 DC-6 飞机残骸上有弹孔；搜寻任何现存的 1961 年 9 月布拉柴维尔及其周围机场的飞机出入境记录；分析与 Van Risseghem 有关的材料，包括飞行日志；要求美国和联合王国在其情报档案中寻找具体信息；要求南非查阅海研所的材料；寻找关于 Germani 和 Schäfer 的资料以及我在报告正文中提到的其他事项。

408. 其次，我建议再次敦促关键会员国任命或再次任命独立高级别官员(独立任用人员)，以确定他们的安全、情报和国防档案中是否存在相关信息。特别是俄罗斯联邦、南非、联合王国和美国等会员国，但不仅限于这些国家，可鼓励这些会员国视情况任命或重新任命拥有所有必要许可和资源能够以所要求的方式进行搜寻的任用人员。

409. 我注意到，美国独立任用人员在 2019 年 3 月给我的最后一封信中写道：“我已将我们的搜寻工作扩大到了包括更多的美国情报机构。虽然在您提交最后报告时这些搜寻工作还无法及时完成，但我们期待着今后与您合作”。鼓励所有相关会员国都采取这种做法。

410. 鉴于所涉及的时间限制，会员国独立任用人员最好参考本报告附件中所载信函在联合国任命独立人士之前继续开展工作。正如 2017 年报告所通过的提议所概述的，独立任用人员需全面审查相关情报、安全和国防档案，以确定其中是否载有可揭示 SE-BDY 坠毁原因和情况的信息，之后在严格保密条件下提交结果摘要。提交这些信息后，会员国可要求在向大会报告调查结果前对具体资料进行校订。如果找到了相关记录，但出于安全或其他原因不能披露，那么，承认存在此类记录仍是对历史记录的一项重大贡献。

411. 在某些会员国不对称地分担举证责任以及某些具体且重要的信息似乎极有可能存在却尚未披露的情况下，鼓励所有各方确保透明就显得极为重要。尽管这一死难事件已经过去了 58 年，但如果不确保已披露或看到与得出结论有关的所有信息，我们就无法得出定论。

412. 第三，我建议任何进一步的授权任务都建议就会员国是否遵守了大会概述的进程达成结论。如果将这一要素写入今后的任何授权任务中，那么有利于独立人士判定是否由于不合作或部分合作而得出任何推论。这一要求可能有助于确保这项调查在有关会员国的合作程度方面有一个明确的结论。

413. 第四，我建议联合国继续努力，旨在通过专门的在线资料集，公开达格·哈马舍尔德调查的关键文件。关于这一主题，我注意到，应当感谢和赞扬联合国已经主动就这一专题建立了专门的在线资料集，收集了许多重要信息。尽管任何进一步的此类工作最终都得秘书长决定，但我认为，这是一种有益的透明做法。理想状态是，可以考虑将联合国所有可能的与调查有关的记录和档案都纳入一个可供公众查阅的资料集，其中可以包括独立小组和知名人士的原始材料，2015、2017 和本报告就是依据这些材料编写的。关于哈马舍尔德委员会的记录，据我了解，该机构完成工作后将其记录转交给了联合国，并有一项明确谅解，即它不反对将这些材料公开。

414. 最后，我再次强调我们继续合作寻找真相的重要性。这些问题不仅关系到联合国在世界上的作用及其与会员国关系的核心，还涉及到我们有责任面对受害者家属以及真实叙述历史。在了解导致 SE-BDY 航班坠毁的原因和情况的全部真相方面再次取得了重大进展。必须鼓励会员国加倍积极参与，这对于最终找到信息，使这一死难事件调查能够完结依然很有必要。

附件*

独立任用人员(截至 2019 年 7 月)

	<i>Name and Title</i>	<i>Appointed</i>	<i>Archives reviewed</i>	<i>Reports</i>
Angola	–	–	Angola advised in April 2019 that colonial-era records were transferred to Portugal. See Report.	–
Belgium	Mr. Guy Rapaille (May–Oct 2018), Mr. Serge Lipszyc (from March 2019), President of the Standing Comm. of Control of Int. and Sec. Services (Committee R) and Dr. Kris Quanten, Lieut-Colonel, Military Instructor and Head of the Chair of Military History (Royal Military School)	May 2018; March 2019	Full and unrestricted access, including classified files and archives of both the military and civil intelligence agencies of Belgium, the General Intelligence and Security Service (GISS) and the State Security (VSSE), files and archives of the Ministry of Defence. Does not include a review of private archives.	Oct 2018 (interim) June 2019 (final)
Canada	Mr. Jeffrey Marder, Director, UN Division, Global Affairs	Oct 2018	Full access to the central archives and records depository of the Government of Canada, Library and Archives Canada (LAC)(including also External Affairs (EA) (predecessor to Global Affairs Canada), Department of National Defence (DND) and the Privy Council Office (PCO)), military archives managed by the Department of National Defence; private archives.	May 2019 (final)
DRC	Mr. Daniel Felix Thabizé Yengolas Elemani, Political and Strategic Advisor to the Military Intelligence Staff	Oct 2018	Full access to classified and unclassified archives, including intelligence, security and defence (not further particularised)	July 2019 (interim)
France	Emeritus Professor Maurice Vaïsse, (Sciences Po), Editor of the French Diplomatic Documents	May 2018	Full access to searches in the following archives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La Courneuve (Seine Saint-Denis) and Nantes (Loire atlantic)), Ministry of Culture, the National Archives (Pierrefitte (Seine Saint-Denis)) Ministry of Defense (or Armed Forces; Vincennes), the General Secretariat of Defense and National Security (SGDSN), Foreign Documentation and Counter-Espionage (SDECE; Paris) as well as private archives including Sciences Po History Centre (Paris), General Directorate for Aviation Civil Aviation Authority (DGCA)	Oct 2018 (interim) May 2019 (final)

* 附件仅以来件所用语文分发，未经过正式编辑。

	<i>Name and Title</i>	<i>Appointed</i>	<i>Archives reviewed</i>	<i>Reports</i>
Germany	Ambassador Dr. Thomas Fitschen, Special Rep. for Cyber Foreign Policy and Cybersecurity, Federal Foreign Office	Aug 2018	Full access confirmed. Archives not particularised.	Oct 2018 (interim) June 2019 (final)
Portugal	Ambassador José Júlio Pereira Gomes	Feb 2019	Full and unrestricted access to all records and archives, regardless of level of classification, including Diplomatic Archive, including Political Affairs Office of the Overseas Ministry, Historical Military Archive, National Defense Archive, Air Force Historical Archive, National Archive of “Torre do Tombo”, Intelligence Services (PIDE/DGS), Historical Overseas Archive.	May 2019 (final)
Russia	–	–	–	–
South Africa	Ambassador Mxolisi Nkosi, Deputy Director-General, Global Governance and Constitutional Agenda, DIRC	May 2019	–	–
Sweden	Ambassador Mathias Mossberg	Apr 2018	All archives and records, including of the Ministry for Foreign Affairs (including migrated Foreign Office records), Swedish National Archives (including Swedish Royal Board of Civil Aviation, and Swedish Criminal State Police), Dag Hammarskjöld Archives (Collection – National Library of Sweden), Royal Board of Swedish Civil Aviation, Military Archives, Swedish Military Intelligence, National Defense Radio Establishment, Swedish Security Service, private archives (including Wallenberg, Atlas Copco, Transair, Virving, Hellstrom).	Oct 2018 (interim) May 2019 (final)
UK	Graham Hand, Senior Sensitivity Reviewer, FCO	May 2019	Holds “necessary security clearances”. Archives and searches not particularised. Response by letter of June 2019 – see Report.	No report – see letter
US	Eric Gaudiosi (Apr–Sep 2018), Joseph Manso (from Oct 2018), acting Principal 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Bureau of	Apr 2018; Oct 2018	Confirmed previous searches of Department of State, Department of Defence, CIA, NSA. Requested CIA and NSA renew searches. Stated searches ongoing. Response by letter of April 2019 – see Report.	No report – see letter

	<i>Name and Title</i>	<i>Appointed</i>	<i>Archives reviewed</i>	<i>Reports</i>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Department of State			
Zambia	John Zulu, Director,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Feb 2019	Full and unrestricted access to all records and archives, including intelligence, defence and security archives and regardless of level of classification, including Civil Aviation Authority; Directorate of Defence Intelligence under the Ministry of Defence; National Archives of Zambia; Zambia Army; Zambia Air Force; Zambia National Service (an auxiliary wing of the Zambia Defence Force; Zambia Police Service; and Zambia Security Intelligence Service	June 2019
Zimbabwe	Senator Dr. Sydney Sekeramayi, former Minister of Def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 and State Secretary	Oct 2018	Full and unrestricted access to all archives and records of the Zimbabwe Defence Forces (ZDF, successor to the Royal Rhodesian Army (RRA)), Zimbabwe National Army (ZNA), Air Force of Zimbabwe (AFZ, successor to the Royal Rhodesian Air Force (RRAF)), Central Intelligence Organisation (CIO, successor to the Rhodesian Special Branch), Zimbabwe Republic Police (ZRP, successor to former Rhodesian police organisations and British South Africa Police), Civil Aviation Authority of Zimbabwe (CAAZ, successor to Rhodesian Department of Civil Aviation), Zimbabwe National Archives.	May 2019 (interim) June 2019 (final)

United Nations Nations Unies

EMINENT PERSON

APPOINTED BY THE SECRETARY-GENERAL PURSUANT TO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72/252
(DAG HAMMARSKJÖLD INVESTIGATION)

REFERENCE:

Le 20 mars 2019

Cher Mr. Ikouébé,

J'ai l'honneur de me référer à la résolution 72/252 adoptée par l'Assemblée Générale le 24 décembre 2017 relative à l'enquête sur les conditions et les circonstances de la mort tragique de Dag Hammarskjöld et des personnes qui l'accompagnaient (l'enquête Dag Hammarskjöld).

En tant qu'Éminente Personnalité, mon mandat actuel comprend l'examen et l'évaluation de la valeur probante de toute nouvelle information, et, dans la mesure du possible, l'aboutissement à des conclusions concernant les enquêtes déjà menées. A cet effet, je compte faire un rapport au Secrétaire Général dans le courant de l'été. Le Secrétaire Général en ensuite informera l'Assemblée Générale plus tard dans l'année.

Un domaine d'étude potentielle concerne l'avion « Dornier Do 28 » qui aurait pu être utilisé par les forces armées du Katanga en 1961. Il est possible que cet avion se soit rendu à Brazzaville au moment de la chute de l'avion du Secrétaire Général. Par conséquent, je vous écris afin de vous demander si les archives de la République du Congo peuvent être examinées dans le but de déterminer s'elle contiennent des informations sur:

- Si un avion Dornier Do-28A (possiblement avec le code d'enregistrement du vol « KA-3016, KA-0016, KA-0019 ou KA-19 ») était enregistré comme étant arrivé à l'aéroport de Brazzaville à tout moment en août 1961, ou entre 15 et 25 septembre 1961;
- S'il existe des traces d'un pilote belge, M. Jan van Risseghem, d'un pilote ouest-allemand, M. Heinrich Schäfer, ou d'un homme d'affaires belge, M. Jean Cassart, entré ou passant par Brazzaville entre le 15 et le 25 septembre 1961; et
- S'il existe des traces d'un avion Dornier Do-28A (possiblement avec le code d'enregistrement du vol « KA-3016, KA-0016, KA-0019 ou KA-19 »), M. Jan van Risseghem, M. Heinrich Schäfer, M. Jean Cassart ou le société belgo-congolaise « MITRACO » sont mentionnées dans des rapports de police ou de renseignement de août à octobre 1961.

His Excellency
Mr. Basile Ikouébé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of the Republic of the Congo
to the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NY

Je ne sais pas précisément où la recherche des informations indiquées ci-dessus pourraient être effectuées. Toutefois, les sources potentielles peuvent être les archives nationales, les archives de l'aéroport de Brazzaville, les archives de la police, les archives du ministère de l'Intérieur ou d'autres archives de renseignements, de sécurité et de défense.

Je vous remercie par avance de l'attention que vous porterez à ma requête et j'attends votre réponse par email à l'adresse suivante dh.investigation@un.org.

Je vous prie d'accepter l'expression de mes sentiments distingués.



Mohamed Chande Othman
Eminent Person

United Nations  Nations Unies

EMINENT PERSON

APPOINTED BY THE SECRETARY-GENERAL PURSUANT TO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72/252
(DAG HAMMARSKJÖLD INVESTIGATION)

19 March 2019

Dear Mr. Kuzmin,

I have the honour to refer to note verbale no. 1853 of 15 May 2018 from Mr. Dmitry Polyanskiy, Chargé d'Affaires, Permanent Mission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to the United Nations. I have the further honour to refer to note verbale 3620/n of 5 October 2018 from Mr. Gennady Kuzmin, Deputy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Permanent Mission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to the United Nations.

In note verbale No. 1853, it was stated that the competent authoritie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continue to review their intelligence, security, and defence archives to determine whether information relevant to the Dag Hammarskjöld Investigation exists. Further, in note verbale 3620/n it was stated that “no information relevant to the investigation has been discovered in the archives so far”.

I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reiterate that it would be of immense assistance to the Dag Hammarskjöld Investigation i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were to appoint a specific Independent Appointee, in line with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72/252. Further, I would at all events be grateful for confirmation that a summary of the searches undertaken by the Russian Federation will include the following items, as listed under the topic of “Content of Reports” of my correspondence to the Russian Federation of 15 June 2018:

1. A statement regarding whether the Independent Appointee [or person conducting the searches] has received from his or her Government an explicit statement or declaration confirming full access to all records and archives, regardless of level of classification.
2. A description of the methodology applied.
3. A description of the searches carried out, including confirmation of the categories of records and archives that have been included in the searches, noting which, if any, have been partially or wholly unavailable, and the reasons therefor.
4. A summary in index form of relevant information identified, including a description of the type of information, its location, what it is relevant to, and its retained classification, if any.
5. Subject to retention or classification of specific documents, full copies (print or electronic) of all relevant materials identified.
6. Any further relevant summary of activities, or other comments.

Mr. Gennady Kuzmin
Deputy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to the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NY

7.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preceding, if a review does not identify relevant information, I will request an explicit and unequivocal statement to that effect.

Most importantly, with reference to item (7), I am requesting an explicit statement confirming that searches have encompassed all records and archives, without limitation and regardless of level of classification, including within intelligence, security, and defence archives. As I noted in my 2018 Interim Report, “without an explicit statement confirming the precise nature of the searches, particularly into the intelligence, security and military archives and records, an identification of whether relevant information exists, and an indication of the reasons for non-disclosure, the non-cooperation of any Member State may be seen as a failing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s collective and ongoing effort in the search for the full truth of the tragic event”.

Given that I am required to consolidate my reporting to the Secretary-General within the coming months, the Russian Federation’s agreement to appoint an Independent Appointee would need to be confirmed by the end of March 2019, to allow at least two months in which to conduct the work. Although there is only a short amount of available time remaining within my current mandate, I am hopeful that we can work together during it to make constructive progress in support of this collective effort. I will await your response.

Please accept, Sir, the assurances of my highest consideration.



Mohamed Chande Othman
Eminent Person

United Nations Nations Unies

EMINENT PERSON

APPOINTED BY THE SECRETARY-GENERAL PURSUANT TO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72/252
(DAG HAMMARSKJÖLD INVESTIGATION)

REFERENCE:

19 March 2019

Excellency,

I have the honour to refer to my letter to you of 20 March 2018, confirming my reappointment as Eminent Person in 2018, and requesting confirmation by 20 April 2018 of the appointment by the Republic of South Africa of an independent and high-ranking official to conduct a dedicated internal review of its intelligence, security and defence archives. I have the further honour to refer to subsequent correspondence of 30 April, 15 June, and 17 August 2018, in which my request was restated.

As is evident from correspondence sent to South Africa in 2015, 2016, 2017, and 2018, it seems likely that unreleased and relevant information is available in the intelligence, security, and defence archives of South Africa, as well as political and diplomatic archives. Apart from the general historical context suggesting this, specific information on the record indicates that relevant information is likely to exist. It was for this reason that in 2018 South Africa, as well as 12 other Member States, was requested to appoint an independent and high-ranking official to conduct dedicated reviews of its own intelligence, security, and defence archives. Of those Member States requested, 9 have responded constructively, and from the work already done by a majority of Independent Appointees, significant new information has been identified. Although I have not received a response from Angola or the United Kingdom, I hope that progress may be made in respect of their engagement.

My requests for the appointment of an independent and high ranking official in 2018 followed from conversations held in April and June 2017 with you, various other Government Representatives, Advocate George Bizos, and a former researcher within South Africa's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TRC). Following these discussions, it appeared to be the case that your Ministry of Justice and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had located documents referring to a purported "Operation Celeste", allegedly conducted by "the South African Institute for Maritime Research" (SAIMR), which were handed over to it by the former Chairperson of the TRC in 1998. I requested that these documents be non-

His Excellency
Mr. Jerry Matthews Matjila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of the Republic of South Africa
to the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NY

invasively tested; although I was informed that such permission would hopefully be forthcoming, no access to the documents has been granted.

Additional information obtained recently would also, if correct, confirm the existence of SAIMR and its operations in South Africa during the relevant period.

On the basis of the above and other information I have reviewed, I assess that it would remain essential for the comprehensiveness of the Dag Hammarskjöld Investigation that South Africa appoint an independent and high-ranking official to conduct a dedicated internal review of its archives, including intelligence, security and defence archives, in accordance with resolution 72/252. This would include, without limitation,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e archives of Republican Intelligence, the Defence Forces, Bureau of State Security, National Intelligence Service, Police (including Security Branch), State Security Agency, the TRC, and any destruction certificates or other information concerning archives that once existed. Further, it remains crucial to fulfilling my mandate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purported SAIMR documents are authentic and reliable.

Accordingly, I renew the request made one year ago in March 2018 that South Africa appoint an independent and high-ranking official to conduct the necessary review. I also renew my request as a matter of urgency and utmost importance that South Africa make appropriate arrangements with me for the forensic testing of the SAIMR documents. Given that I am required to consolidate my reporting to the Secretary-General within the coming months, South Africa's agreement to take these steps would need to be confirmed by the end of March 2019, to allow at least two months in which to conduct the work. I am hopeful that these requests do not seem novel, noting that they are based on the same fundamental requests for information and assistance that were made under the United Nations led processes in 2015, 2016, 2017, 2018, and again this year.

As I noted in my 2018 Interim Report, "without an explicit statement confirming the precise nature of the searches, particularly into the intelligence, security and military archives and records, an identification of whether relevant information exists, and an indication of the reasons for non-disclosure, the non-cooperation of any Member State may be seen as a failing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s collective and ongoing effort in the search for the full truth of the tragic event". Although there is only a short amount of available time remaining within my current mandate, I am hopeful that we can work together during it to make constructive progress in support of this collective effort.

Please accept, Excellency, the assurances of my highest consideration.



Mohamed Chande Othman
Eminent Person

United Nations Nations Unies

EMINENT PERSON

APPOINTED BY THE SECRETARY-GENERAL PURSUANT TO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72/252
(DAG HAMMARSKJÖLD INVESTIGATION)

REFERENCE:

15 March 2019

Excellency,

I have the honour to refer to my letter to His Excellency Mr. Matthew Rycroft of 20 March 2018 confirming my reappointment as Eminent Person in 2018, and requesting confirmation by 20 April 2018 of the appointment by the United Kingdom of an independent and high-ranking official to conduct a dedicated internal review of its intelligence, security and defence archives. I have the further honour to refer to subsequent correspondence to you, including that of 30 April 2018 and 15 June 2018, in which my request was restated.

On 6 November 2018 Sir Alan Duncan responded to my letter of March 2018. In that response, he stated that the United Kingdom would not appoint an independent and high-ranking official. The reason given was that all information of direct value to the Investigation was said to have been made available by the United Kingdom in previous years, or had been released and was available publicly.

It is noted that a similar position to that stated on 6 November 2018 had been communicated on 10 June 2015¹. However, that position was reconsidered in 2017, which led to beneficial results by way of additional new information being located in the United Kingdom's diplomatic archives. Based on the matters elucidated further below, it is my respectful submission that it would appear to be highly likely that additional relevant information is available in other archives of the United Kingdom; specifically, intelligence, security, and defence archives. As I noted in my Interim Report of November 2018, which was adopted by the Secretary-General with approval and presented to the General Assembly in December 2018, the deeper we have gone into the searches, the more relevant information has been found. Among other possibilities, the intelligence, security and defence archives of Member States have now been identified as probable sources for the generation of new and relevant information. Moreover, as the body of knowledge has expanded, further potentially relevant areas have been revealed.

¹“The vast majority of UK material relating to these events has already been released to the National Archives at Kew and is available to the public there. The FCO has coordinated a search across all relevant UK departments. None of these departments have identified any pertinent material”.

Her Excellency
Ms. Karen Pierc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of the United Kingdom
to the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NY

As previously noted, both the general historical context as well as specific information on the record indicates that further information exists. This includes a report from a Secret Intelligence Service (MI6) officer operative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Rhodesia and the Congo, including in Katanga, in 1961; Federal Intelligence and Security Bureau (FISB) reports; statements made both on and off record by British officials; information received from other Member States; and other information. As an annexure to this correspondence, I include selected details of this information, and outline thematic areas for potential future searches.

It is moreover noted that previous official correspondence stated that the “total amount of information withheld [in diplomatic records] is very small and most of the redactions only consist of a few words”². However, a review of information in British archives in 2017 indicated that there are still significant redactions, even within diplomatic records. I would be prepared to provide further particulars of this, should it assist.

On the basis of the foregoing, I would make the respectful observation that the record suggests that British intelligence, security and defence archives may not have been fully included in searches to date.³ This may also have been the case with certain other Member States as well. It is for these reasons, and with a view to ensuring that information available to the Dag Hammarskjöld Investigation is comprehensive, that in 2018 the United Kingdom, as well as 12 other Member States, was requested to appoint an independent and high-ranking official to conduct dedicated reviews of its own intelligence, security, and defence archives. Of those Member States requested, 9 have responded constructively, and from the work already done by a majority of Independent Appointees, significant new information has been identified, including within archives that were once classified, closed or not subject to access. Although I have not received a response from Angola or South Africa (in addition to the United Kingdom), I hope that progress may be made in respect of their engagement.

On the basis of the above and other information I have reviewed, I assess that it would remain essential for the comprehensiveness of the Dag Hammarskjöld Investigation that the United Kingdom appoint an independent and high-ranking official to conduct a dedicated internal review of intelligence, security and defence archives, in accordance with resolution 72/252. This would include, without limitation, information held (including by the FCO) that is not yet due for

² See response of 10 June 2015.


³ By way of official response, the United Kingdom was requested in November 2015 to confirm that its search of “all relevant UK departments” included a search of “all security and intelligence agencies”. A response was received from the Permanent Mission of the United Kingdom on 23 June 2016, in which it was indicated that “the United Kingdom’s position on release of information has not changed since [its letter to the Panel of 10 June 2015]”. On the topic of whether “all relevant UK departments” included a search of “all security and intelligence agencies” the response merely repeated the question itself, stating “the 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Office (FCO) coordinated a search across all relevant UK departments”. This is understood to mean that searches did not include intelligence, security, and defence archives.

declassification, is closed, or has been retained, as well as that within the records and archives of the Security Service (MI5), the Secret Intelligence Service (MI6), Government Communications Headquarters (GCHQ), the armed services (and related intelligence services such as Defence Intelligence), as well as the Federal Intelligence and Security Bureau (FISB), the intelligence and security arm of the colonial Federation of Rhodesia and Nyasaland. In addition to these archives, it would be beneficial if it could also be confirmed that searches have included within the Special Collections at Hanslope Park (and in particular, those archives relating to Rhodesia), related files at Whitehall, the Permanent USG's department, documents covered by individual, blanket, Lord Chancellor's Instruments and/or other Instruments (including freedom of information exemptions), the "Top Secret Independent Records" (1953–1963, including the inventory thereto), Ministry of Defence archives, including at Portsmouth and Swadlincote, and any destruction certificates for archives that once existed.

Accordingly, I renew the request made one year ago in March 2018 that the United Kingdom appoint an independent and high-ranking official to conduct a dedicated internal review of its intelligence, security and defence archives in respect of this matter. At the same time, I request a meeting with the head of the Secret Intelligence Service, given that the Report of Neil Ritchie remains a highly relevant document and a starting point for further enquiry. (So do the specific thematic areas I have summarised in the annexure, and which also invite searches.) Given that I am required to consolidate my reporting to the Secretary-General within the coming months, the United Kingdom's agreement to take these steps would need to be confirmed by the end of March 2019, to allow at least two months in which to conduct the work. I am hopeful that these requests do not seem novel, noting that they are based on the same fundamental requests for information and assistance that were made under the United Nations led processes in 2015, 2016, 2017, 2018, and again this year.

As I noted in my 2018 Interim Report, "without an explicit statement confirming the precise nature of the searches, particularly into the intelligence, security and military archives and records, an identification of whether relevant information exists, and an indication of the reasons for non-disclosure, the non-cooperation of any Member State may be seen as a failing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s collective and ongoing effort in the search for the full truth of the tragic event". Although there is only a short amount of available time remaining within my current mandate, I am hopeful that we can work together during it to make constructive progress in support of this collective effort by the United Nations community.

Please accept, Excellency, the assurances of my highest consideration.


Mohamed Chande Othman
Eminent Person

Annexure: Thematic areas for potential searches

It seems highly probable that unreleased and relevant information is likely to be available in intelligence, security, and defence archives, including in relation to the following matters:

Existence of the “Secret: Report by Neil Ritchie” (First Secretary at the British High Commission in Salisbury and MI6 officer)

Neil Ritchie was an MI6 officer and first secretary at the High Commission in Salisbury, who was in and around Ndola on an assignment relating to Hammarskjöld’s visit for six days before and after the time of the crash. He was in frequent communication with Lord Alport and the British consul in Katanga, Denzil Dunnett, throughout this period. The “Neil Ritchie Report” was not disclosed by the Government to any of the official enquiries, despite the important information it contained. Its existence and content confirm the presence of the British secret intelligence services in the area, and MI5/MI6 key involvement in and reporting about circumstances related to the activities of Hammarskjöld leading up to the night of 17-18 September 1961. To recall a summary of the relevant background, in September 1961 Tshombe, the leader of Katanga, agreed to meet with Hammarskjöld to discuss a ceasefire. Preparations for the meeting and reconnaissance of the venue were facilitated through Ritchie and Dunnett. On the day of the proposed meeting, 17 September 1961, Ritchie went himself with two small aircraft to collect Tshombe and Dunnett to travel to Ndola. He liaised with local and international diplomatic and corporate figures including Sir Ronald Prain, head of the Rhodesian Selection Trust, and Henry Fortemps, the assistant director general of Union Minière in Elisabethville.

British officials’ own communications refer to Neil Ritchie, including at least three communications of 17 September 1961 from Lord Alport to the Commonwealth Relations Office. Despite the pivotal role played by MI5/MI6 personnel (in addition to other British and other personnel) in arranging the meeting between Hammarskjöld and Tshombe, no relevant records have been disclosed, even in redacted format. It would appear to be highly unlikely that no further records were created by Ritchie, Dunnett, or others, including Lady Daphne Park, stationed at the British Embassy in Leopoldville whose presence in the relevant area with MI6 is a matter of record.

Van Risseghem

In 2015 information was received that a Belgian pilot named Jan van Risseghem (also identified as “Van Reisseghem”, “Van Rysseghem”, “Van Reisenghan”, “Van Rissesghel” and other variations) may have piloted a Fouga Magister, which was said to have shot down Hammarskjöld’s plane. Van Risseghem was in the service of the armed forces of Katanga, and was a person of interest cited

by the US Ambassador Leopoldville, as well as the United Nations. Recent research and information indicates that van Risseghem was a pilot with the British Royal Air Force during World War II, and that he was both the son of and married to British citizens. Allegations from Mr Pierre Coppens in 2018 confirm this alleged background, and state that van Risseghem admitted his involvement in an attack on Hammarskjöld's plane. Van Risseghem allegedly stated "in life, sometimes you have to do things that you don't want to do, but they are an order". If correct, van Risseghem's military service i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citizenship of his mother and wife, among other things, may make it likely that British intelligence, security, and defence archives contain potentially important information on van Risseghem. Of key interest to the Hammarskjöld Investigation is the conclusive establishment of his whereabouts on 17 and 18 September 1961.

Rhodesian archives

During the course of 2013 a release of some of the 'migrated archives' of the Northern Rhodesian files was made to the British National Archives. It is unclear to what extent, if any, certain of these archives remained inaccessible at the time of previous searches, or whether they have been included in searches at all. Northern Rhodesian archives have never been conclusively searched, and remain important for many reasons, including that the recent Investigations have been able to rule out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re was another non-Katanga aircraft in the air that night, or what activity occurred within Northern Rhodesian airspace. If migrated Northern Rhodesian intelligence, security and defence archives exist i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have not been fully searched, they are likely to hold relevant new information.

Information on intercepted communications

Various diplomatic records refer to the interception of United Nations communications, which the Rhodesian and British authorities were apparently able to decode. As one example, correspondence of 13 October 1961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to the Permanent Mission of the United Kingdom to the United Nations forwards the details of military movements of United Nations forces obtained by means of "wireless intercepts" and "signals intercepts". The intercepts include communications from United Nations Headquarters Katanga Command to its air operations in Leopoldville. Further, in documents received from the United States, the United States Consul in Elisabethville also reported by cable of 5 January 1961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hat the British Consul in Elisabethville had "read [him] the text of intercepted cable from [the] UN Commander at Albertville, reporting to [United Nations representative] Dayal". Further to this, the findings of the 2015 and 2017 Reports that US and British services monitored and decrypted Secretary-General Hammarskjöld's official code cables have not been challenged.

Authorities including Rhodesian and British appear to have intercepted United Nations communications in a systemic manner in the Congo in 1961. It is feasible that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extent of interception capabilities may clarify

whether there is a likelihood that there was a true absence of further communications on 17 September 1961 from flight SE-BDY, other than those already known. Either the presence of additional communications, or the absence of them despite ongoing interception monitoring, would greatly assist our knowledge of events.

Communications transmitted from Hammarskjöld's plane

In a telegram from Lord Alport of 18 September 1961, he reported that the "Plane from Leopoldville assumed to be carry Hammarskjöld passed without landing or making contact". Dunnett however stated that on the night of 17-18 September he overheard a radio call between Hammarskjöld's flight ("SE-BDY") and the Ndola Control Tower in which SE-BDY reported that it would be landing at Ndola within a quarter of an hour. Although Dunnett's account has not been denied, no such records have apparently been searched for officially in British archives. If there were such radio communications overheard by Dunnett, it is most likely that their existence (as well as the existence or absence of other similar communications) was recorded, and may hold important new information. This is a significant possibility, noting the matters referred to in the preceding paragraphs regarding interception of communications.

Time of discovery of crash

British diplomat Sir Brian Unwin, the assistant to Lord Alport at the time of the crash, has stated that he and Lord Alport were informed by Lord Landsdowne between 1330 and 1500 hours (local time) that "there had been a crash and they'd found it and Hammarskjöld was dead". These comments indicate that he and Lord Alport were informed about the discovery of the crash site before the official account of the site having been discovered by the authorities at 1510 hours (Lord Alport has stated that the time was 1400 hours). If high ranking British officials had been made aware of the crash before the official discovery time, it is likely that there is documentation that has not been disclosed regarding initial reports upon which these notifications were based.

Paul Abram – statement regarding GCHQ

US citizen and former US Air Force Security Service Officer Paul Abram has stated that he recorded information on a tape regarding an interception of an attack on Hammarskjöld's plane. He stated that the tape would have been shared with the US National Security Agency (NSA) location in Fort Meade, Maryland, and with GCHQ, in original and by fax. GCHQ records may be able to confirm or deny the existence of the transmission Abram states that he heard on the night of 17-18 September 1961.

British influence on initial enquiries

In a letter of 24 April 1962 from Alan Campbell, Counsellor of the Permanent Mission of the United Kingdom to the United Nations, addressed to Michael Wilford, of the Foreign Office, Campbell makes various references to the United Kingdom having been provided with the 1961 Commission's report in draft before its issuance — a fact of which he acknowledged there was “a certain delicacy about revealing” — and to the United Kingdom having negotiated changes to its text. The letter states, “I think the Secretariat have now produced a satisfactory revision of the draft”. It mentions specific changes in the draft that the United Kingdom sought from the Secretary of the 1961 Commission, and it appears that at least one of the revisions sought by the United Kingdom made its way into the text of the final report. In the same letter from Campbell to Wilford, Campbell noted that it was “regrettable” that the “Commission ha[d] decided to stick to their own draft” instead of altering their conclusions to agree with the suggestion of ruling out sabotage or external attack.

Further, an attempt to influence the 1961 Commission was apparently exerted by a British member of the Rhodesian Commission of Inquiry. In a letter of 19 February 1962 from Justice Lloyd-Jacob to the United Kingdom Secretary of State, Earl Home, Justice Lloyd-Jacob stated, “I hope you are not too apprehensive of the possible conclusions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mmittee. The members of it will I think (and in private discussion with two of them I have so urged them) concentrate upon the preflight position in the Congo...”. Justice Lloyd-Jacob also advised Earl Home that “on the issue of causation of the crash I should expect them [i.e. the 1961 Commission] to concur in our findings”. If it is the case that an attempt was made to influence the 1961 Commission to rule out sabotage or other malicious action as a probable cause or causes of the air crash, further information may exist to confirm or explain why this outcome was sought.

Commercial records

Further to the preceding, it may be possible for the United Kingdom to facilitate queries in areas additional to intelligence, security, and defence archives, in a manner that has not yet been fully explored. As one example, British companies including Tanganyika Concessions, the Rhodesian Selection Trust and the British South Africa Company operated in the area at the relevant time, and had links to the British Government, as well as to US and South African mining interests. Union Minière also shared directors and had close relations with Tanganyika Concessions. Given the role of British officials in cooperating with Union Minière to facilitate the meeting that Hammarskjöld was travelling to when his plane crashed, it is possible that relevant information may be identified that refers to or is within the archives of these or other British companies.

United Nations Nations Unies

EMINENT PERSON

APPOINTED BY THE SECRETARY-GENERAL PURSUANT TO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72/252
(DAG HAMMARSKJÖLD INVESTIGATION)

24 March 2019

Dear Mr. Manso,

I have the honour to refer to correspondenc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ated 12 April 2018 confirming Mr. Eric Gaudiosi's appointment as independent and high-ranking appointee (the Independent Appointee), mandated by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conduct a dedicated internal review of its records and archives, including intelligence, security and defence archives, to determine whether information relevant to the Dag Hammarskjöld Investigation exists. On 3 October 2018 I was advised that you would replace Mr. Gaudiosi as Independent Appointee; this change in your role notwithstanding, I note that you had previously been included on communications with Mr. Gaudiosi since shortly after his appointment.

By letter of 13 June 2018 I outlined the general methodology requested of Independent Appointees. As part of this, I requested that a brief interim written report be provided to me in October 2018, identifying, inter alia, whether full access had been granted to all records and archives, regardless of level of classification (including intelligence, security, and defence archives); a description of searches carried out; and an identification of relevant information that had been identified. Despite following up on the matter on multiple occasions, I did not receive an interim report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n 2018. I was however advised that searches remained ongoing. On 6 December 2018, I provided you with a copy of my Interim Report to the Secretary-General.

The record suggests that searches for relevant information in this matter that were conducted before 2018 may have been limited to diplomatic and/or political archives in various Member States. Indeed, documents received from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in previous years appear to have been entirely from such sources, notwithstanding that both the general historical context as well as specific information of record suggest that it is highly likely that additional relevant information is available in other archives of the United States. For example, the existing record includes: statements and documentation from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 National Security Agency (NSA), and armed services personnel who were stationed to or worked thematically on the area within and surrounding the Congo during the 1950s-1960s; information received from other Member States; and other information such as that in private archives, as well as, for example, the summary records of the Church and Pike Committees, which indicate that their complete records (which remain inaccessible publicly) may contain further relevant information. Moreover, sources have shown what may be a possible conflict or difference between official US Government policy vs. CIA activities over the period in question, which, if true, makes it even more important that archives beyond those in the diplomatic and/or political spheres are examined.

Mr. Joseph Manso
By email

With a view to ensuring that information available to the Dag Hammarskjöld Investigation is comprehensive, in 2018 the United States, as well as 12 other Member States, was requested to appoint an independent and high-ranking official to conduct dedicated reviews of its own intelligence, security, and defence archives. As I noted in my Interim Report, which was adopted by the Secretary-General with approval and presented to the General Assembly in December 2018, the deeper we have gone into the searches, the more relevant information has been found. Moreover, as the body of knowledge has expanded, further potentially relevant areas have been revealed.

Indeed, the responses given by the United States in previous years have themselves continued to evolve. By way of example, in 2015 and 2016 the United States stated that it did not have any responsive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 following matters, all of which have been assessed as having probative value to the Investigation: the presence of US aircraft in and around Ndola in September 1961; the supply of Fouga aircraft to Katanga in 1960-61; and the service record of Mr. Paul Abram. However, in 2017, when presented with information that show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as involved in and had relevant information on these matters, documents were provided to me confirming that was in fact the case. As an annexure to this correspondence, I include selected details of this information, and outline thematic areas for your ongoing searches.

On the basis of the above and other information I have reviewed, I assess that it would remain essential for the comprehensiveness of the Dag Hammarskjöld Investigation that the United States confirm the exhaustive nature of its dedicated internal review of intelligence, security and defence archives, in accordance with resolution 72/252. This would include that searches have also been conducted of, without limitation, information held (including by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hat is not yet due for declassification, is closed, or has been retained, as well as that within the records and archives of: the CIA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any records held by the Department of Plans; the Directorate of Operations; the Directorate of Intelligence for the Africa Division, the Congo / Elizabethville station, the Congo / Katanga base, the Johannesburg station, and British Rhodesia liaison office; Project ZR/RIFLE; and Office of Current Intelligence); the NSA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any records held by the Office of Signals Intelligence Operations (SIGINT)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in “G Group” for Africa (formerly ALLO of ‘all other countries’), and the Office of Research and Engineering in its Intercept Equipment Division for Africa); the Defense Intelligence Agency (DIA, established 1 August 1961)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any records held by the Directorate for Management & Operations and its sub-directorates for Collection Management, Attachés and Training, and Plans and Policy); the Air Force Intelligence Service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any records held by the Directorate of Operational Intelligence and Directorate of Attaché Affairs); the US Navy and the US Army Intelligence and Security Command (INSCOM); th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any records held by the Bureau of Intelligence Research (INR)’s Office of Analysis for Africa, and the Central Foreign Policy Files, and Bureau of African Affairs); the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FBI); and the complete records of any relevant congressional, senatorial, judicial, or executive bodi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Church and Pike Committees, and the Rockefeller Commission). Searches should of course include among any indexes or

reference material referring to archives that once existed (such as destruction certificates or equivalent).

As will be recalled, in the coming months I am required to address my final report to the Secretary-General. Although I initially requested final reports from Independent Appointees by 30 March 2019, other Independent Appointees have requested additional time to conduct deeper searches, on which basis I have extended the deadline until 30 April 2019. This would, however, represent the latest date on which I could receive the final reports and still have time to meaningfully review and convey their results. I would therefore again reiterate my request that your final report be received in a timely manner, addressing in full the methodology conveyed in my letter of 13 June 2018. Should you have any queries, I would hope that the additional time available will allow you to raise them immediately, in order that we may address them constructively together. I am hopeful that these requests do not seem novel, noting that they are based on the same fundamental requests for information and assistance that were made under the United Nations led processes in 2015, 2016, 2017, 2018, and again this year.

As I noted in my 2018 Interim Report, “without an explicit statement confirming the precise nature of the searches, particularly into the intelligence, security and military archives and records, an identification of whether relevant information exists, and an indication of the reasons for any non-disclosure, the non-cooperation of any Member State may be seen as a failing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s collective and ongoing effort in the search for the full truth of the tragic event”. Although there is only a short amount of available time remaining within my current mandate, I am confident that we can work together during it to make constructive progress in support of this collective effort by the United Nations community.

With my sincere regards,



Mohamed Chande Othman
Eminent Person

Annexure: Thematic areas for potential searches

It seems highly probable that unreleased and relevant information is likely to be available in intelligence, security, and defence archives, including in relation to the following matters:

Intercepts or other evidence of communications transmitted from Hammarskjöld's plane, or other planes, equipment, and facilities.

One of the primary areas of interest for potentially relevant information relates to what occurred during the actual flight; this may include radio intercepts and related records (including, for example, tapes, transcripts, secondary/tertiary information and other material), or other potential communications between aircraft, ground forces and air traffic control. The historical record strongly suggests that Governments, including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had a presence in and around the Congo region at the time, may hold such evidence. Any such information, if verifiable, will be likely to either prove or disprove one or more of the existing hypotheses of the tragic event, bringing us more proximate to closure.

In respect of the United States, it has been noted that from the specific evidence of US radio monitoring activities at Ndola airport, as well as from the broader evidence of the NSA's worldwide monitoring activities around 1961, it is highly likely that all local and regional Ndola radio traffic on the night of 17-18 September 1961 was tracked and recorded by the NSA, and possibly also by the CIA. In this regard, of primary importance would be any recording, transcription, or any other record of such radio traffic intercepted, received, or relayed by the NSA at any station worldwide, on the night of 17-18 September 1961, concerning: the Secretary-General's plane; the landing or approach of any aircraft at Ndola, Northern Rhodesia; and/or an attack on any aircraft.

Information on intercepted communications – Paul Abram

Paul Abram, former United States Air Force Security Services Officer has described hearing transmissions related to the shooting down of an aircraft in or near the Congo on the night of 17 to 18 September 1961 while stationed at a United States National Security Agency (NSA) listening post in Irakleio, Greece. As previously reported, Abram stated specifically that on the night of 17 to 18 September he heard someone say over the radio: "Here comes the plane ... the plane is well lit", followed by someone on another frequency stating in non-American accented English, "the Americans just shot down a UN plane", which was followed by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radio chatter". Abram stated that he recorded the information on a tape and that the tape would have been shared with the NSA location in Fort Meade, Maryland, and with Government Communications Headquarters (GCHQ), the British intelligence and security organization, in original and by fax. He stated that his NSA supervisors were in Irakleio and at the United

States Air Force Security Service Headquarters at Kelly Air Base in San Antonio, Texas.

The United States did not respond to requests for information regarding Abram's service in 2015. In June 2016, the United States stated that it did not have information on Abram. When I provided further information received from Abram concerning his service record in 2017 (including his including his Force number and service record, education record, and identifier/code of "AbelBaker"), the United States again stated in June 2017 that "[w]e have been unable to locate any further information about Mr. Abram. We are unable to authenticate the documents you provided purporting to show Mr. Abram's service. We are not aware of any information or documentation in the possession of the US Government which would support or lend credence to Mr. Abram's claims." However, a mere number of days prior to finalizing my 2017 Report, I received information from the United States confirming that Abram had been a "voice intercept protocol specialist", but that "United States Air Force records ... provide that Paul Abram's tour in Crete began on October 24, 1959. The records further provide that the date Paul Abram returned to the United States was April 7, 1961. Thus, it appears that Paul Abram was not in Crete in September of 1961". In response, Abram stated that the dates listed on the form could not have been correct (he based his recollection on other important life events that had occurred at or near October 1959), that he had definitely been in Crete in September 1961, and that he believed the record (including both the duration and the start/end dates of service in Crete) to have been misrepresented.

During 2013-2017, the United States had advised that it did not have information regarding Abram, notwithstanding the fact that significant details including his service location, role and service record number had been conveyed for verification. No explanation was given in 2017 regarding why a service record was suddenly able to be located. If comprehensive searches were not conducted before 2017, then it may be the case that all matters considered and searches conducted by the United States before then would need to be reviewed. In any event, in 2018, I requested the United States to follow up on the information that confirmed Abram to have been an intercept specialist operating in Crete. Specifically, matters that need to be ascertained include: why Abram's service record was not located until 2017; full details of Abram's service,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his attachment to the NSA; Abram's claim to have been stationed in Crete in September 1961; an explanation of the new documentation received in 2017 (which appears to be an internal military form with many abbreviated words, including in military vocabulary); whether, regardless of Abram's presence, the records of the NSA listening station in Crete (and other such relevant facilities) have been exhaustively reviewed for records of communications on 17-18 September 1961; whether it is correct that tapes or other records of such communications were shared with other US entities (including the CIA) and/or GCHQ, or other foreign intelligence, security, and defence entities; whether other service personnel at the facility in question, or similar facilities, who were working at the relevant time, have been contacted to confirm whether they recall hearing or reading a transmission, recording, or transcript, as described.

Information on intercepted communications – Charles Southall

Charles Southall was a “processing and reporting” officer stationed at a naval communications facility of NSA near Nicosia in 1961. He has consistently stated that on 17-18 September 1961 he overheard a CIA intercept that was shared with the NSA, describing an attack on what was understood to be Hammarskjöld’s plane. Southall stated that four or five other staff also heard the recording or read the transcript. Southall also stated that he was informed by his Communications Watch Officer or another officer present at the relevant time that a Belgian pilot known as the “Lone Ranger”, flying a Fouga Magister aircraft used by Katangan forces, made the transmission and that the pilot “must be waiting for Hammarskjöld’s plane”. It will be recalled that the references to the “Lone Ranger” and the Fouga Magister were also made by the United States Ambassador in Leopoldville, Edmund Gullion.

The United States confirmed in 2016 that Southall had joined the Navy in 1955, was released from active duty in 1969 and retired as a commander from the Naval Reserve in 1978. However, the United States did not respond to queries whether Southall was stationed in Greece or whether he worked in support of NSA, as he had stated. In 2018, I requested the United States to follow up on the information regarding Southall’s service record and claims. Although in 2018 it was stat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as not aware of any information which would support or lend credence to Southall’s claims, specific matters remain to be ascertained, including: full details of Southall’s service,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his attachment to the NSA; whether the limited nature of searches regarding Abram (described above) that led to relevant information not being discovered in 2013-2017 may also have affected searches regarding Southall; Southall’s claim to have been stationed in Greece in September 1961; whether, regardless of Southall’s presence, the records of the listening station in Greece (and other such relevant facilities) have been exhaustively reviewed for records of communications on 17-18 September 1961; whether it is correct that tapes or other records of such communications were shared with other US entities (including the CIA) and/or GCHQ, or other foreign intelligence, security, and defence entities; whether other service personnel at the facility in question, or similar facilities, who were working at the relevant time, have been contacted to confirm whether they recall hearing or reading a transmission, recording, or transcript, as described; and the full details of any internal US investigations into the allegations made by Mr. Southall, during the 1990s or since.

Information on intercepted communications – UN communications

Various diplomatic records refer to the interception of United Nations communications, which the Rhodesian and British authorities were apparently able to decode. As one example, correspondence of 13 October 1961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to the Permanent Mission of the United Kingdom to the United Nations forwards the details of military movements of United Nations forces obtained by means of “wireless intercepts” and “signals intercepts”. The intercepts include

communications from United Nations Headquarters Katanga Command to its air operations in Leopoldville. Further, in documents received from the United States, the United States Consul in Elisabethville also reported by cable of 5 January 1961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hat the British Consul in Elisabethville had “read [him] the text of intercepted cable from [the] UN Commander at Albertville, reporting to [United Nations representative] Dayal”. Further to this, the findings of the 2015 and 2017 Reports that US and British services intercepted, monitored and decrypted Secretary-General Hammarskjöld’s official code cables have not been challenged; indeed, in 2017 the United States advised that it did not have any comment to make on this issue.

It is feasible that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extent of interception capabilities in general may clarify whether there is a likelihood that there was a true absence of further communications on 17 September 1961 from flight SE-BDY, other than those already known. Either the presence of additional communications, or the absence of them despite ongoing interception monitoring, would greatly assist our knowledge of events.

Information on intercepted communications – US facilities

It has been established since the initial enquiries in 1961-62 that at least three United States Air Force Dakota aircraft were in Elisabethville or Ndola on 17 September 1961, and that all three were in Ndola by 18 September 1961. A communication from the United States of 10 June 2016 stated however that US Air Force searches on this issue had not found any documents or information. Despite this statement, in response to contradictory information I provided in 2017, the United States confirmed that in fact a US Army and Navy Attachés’ aircraft had been in Ndola between 15 and 18 September 1961, that two planes (a US Air Attaché plane and a US Pretoria Attaché plane) were in Elisabethville from 15 to 17 September before moving to Ndola on 18 September, and that there were therefore on 18 September 1961 at least three US aircraft in the Ndola area.

Other information establishes that the US equipment and facilities were transmitting communications from Ndola to Elisabethville, Leopoldville and Washington, D.C, by the “single sideband” radio on at least one of the planes. Rhodesian and United Kingdom authorities had also previously reported that US Air Attachés’ aircraft in Leopoldville and Pretoria had been parked for some days on the apron at Ndola airport, in continuous contact with Leopoldville, Elisabethville, New York and Washington, and from time to time with UN aircraft in the air. Lord Alport, then UK High Commissioner, had also stated that “we thought it possible that this [Dakota] aircraft was in communication with [Hammarskjöld’s] plane”, and former British diplomat, Sir Brian Unwin, as well as Squadron Leader Mussell of the Royal Rhodesian Air Force, also confirmed their respective understanding that the US planes were turned on and transmitting messages. Accordingly, specific matters remain to be ascertained, including: whether US aircraft or other equipment may have sent a transmission on 17-18 September 1961, or whether any of three Dakota

aircraft discussed above may have received, intercepted or acted as a relay station for other radio communications; whether any US aircraft (including the Dakotas) were used as a recording and/or relay station (e.g. a field command post) for any VHF or other transmissions in the area; whether any other means of collecting information through signal and communications intelligence in and around the Ndola area was conducted or received by the US at the time in question.

Air forces of Katanga – equipment and personnel

In 2015 information was received that a Belgian pilot named Jan van Risseghem (also identified as “Van Reisseghem”, “Van Rysseghem”, “Van Reisenghan”, “Van Riesegehel” and other variations) may have piloted a Fouga Magister, which was said to have shot down Hammarskjöld’s plane. Van Risseghem was in the service of the armed forces of Katanga, and was a person of interest cited by the US Ambassador in Leopoldville, as well as the United Nations.

Communications between 15-18 September 1961 from US Ambassador Edmund Gullion claim that Hammarskjöld’s plane “may have been shot down”, and provide reports of a “flash in the air”. According to the communications, one or both of these pieces of information were also passed on immediately to the White House, the Secretary of Defence, the Army, the Navy, the Air Force and CIA. Ambassador Gullion had also reported in preceding days on aerial harassment of UN aircraft by, and the possible visual sighting of, Van Reisseghem [van Risseghem].

Recent research and information indicates that van Risseghem was a pilot with the British Royal Air Force during World War II, and that he was both the son of and married to British citizens. Allegations from Mr Pierre Coppens in 2018 confirm this alleged background, and state that van Risseghem admitted his involvement in an attack on Hammarskjöld’s plane. Van Risseghem allegedly stated ‘in life, sometimes you have to do things that you don’t want to do, but they are an order’. Various information in US diplomatic archives already reviewed may make it likely that US intelligence, security, and defence archives contain potentially important information on van Risseghem. Of key interest to the Hammarskjöld Investigation is the conclusive establishment of his whereabouts on 17 and 18 September 1961.

Gullion’s and others’ communications around the relevant time also describe night attacks by a Fouga, air-to-air attacks by Katangan forces (including on US aircraft), and the possible operational presence of more than one Fouga in September 1961. It would remain to be confirm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searches for information on van Risseghem (including spelling variations) and the aerial forces of Katanga have been conducted across all potentially relevant records and archival sources, including those referred to in this letter.

SAIMR

In 2017, the United States advised that it had “been unable to locate any information regarding a purported ‘Operation Celeste’ or the ‘South African Institute for Maritime Research [SAIMR]’”. Given that new information from other sources has been received in 2018 regarding the existence of SAIMR and its operations between the 1960s – 1980s, as well as the alleged involvement of the CIA in the purported ‘Operation Celeste’, it would be necessary to confirm that United States’ searches for this information have been conducted across all potentially relevant records and archival sources, including those referred to in this letter.

Other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 Joe Trento and Dave Roman in their August 1978 article in Penthouse Magazine titled the “KGB In New York: The United Nations Soviet Spy Base” mention (1) a secret 1962 CIA report given to President Kennedy that stated “[t]here is evidence collected by our technical field operatives that the explosive device aboard the aircraft was of standard KGB incendiary design”; and (2) a report about a Soviet KGB agent named S. A. Vinogradov being involved in the death of Hammarskjold. Please confirm whether references to such records exist within archives.
